

公益慈善周刊



2014年8月10日

2014年第29期(总第129期)

恳请读者为《公益慈善周刊》投票(仅需15秒时间)

各位公益同仁，您们好！

《公益慈善周刊》自2011年12月13日创办以来，旨在运用电子邮箱、NGOCN、新浪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为全国的公益人提供优质专业的资讯。截至到2014年8月10日，共发布了129期。近三年来，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除重大节假日外，我们保证每期周刊每周一准时出现在公益同仁的邮箱里，陪伴大家开始崭新的一周。

现在，我们参加“安平中国·2014北大公益传播奖——新媒体创新奖”的评选，恳请大家为我们投票(每日都可投一票,可连投十日)，支持《公益慈善周刊》入围，谢谢！您们的支持将鼓励我们继续前行！

投票请点击：<http://2014.appku.org/Home/Index/showProduction/id/137>

关于安平中国·2014北大公益传播奖

安平中国·2014北大公益传播奖(简称安平奖)由北京大学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北京北广传媒数字电视有限公司、完美(中国)有限公司共同主办，旨在通过评选优秀公益传播作品，倡导并推动客观、公正、深入、有创意、有担当的公益报道与传播实践，致力于“成为公益新闻传播领域价值引领的风向标”。

◎政策点击

民政部发布 2013 年全国性社会组织薪酬调查报告	4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	4
郑言：“治理现代化”与改革创新体制机制	10
高成运：尽快给行业协会应有的“名分”	13
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呼吁重新界定小额信贷	15

◎行业观点

人民网：灾后重建中党组织从管理向服务转型的雅安探索	17
南方日报：公益创投对社会组织吸引力强	20
南方都市报：中国“公益黄埔军”出珠海记	23
广州日报：枢纽型社会组织如何成为草根纽带？	29
广州日报：枢纽型社会组织 重在运营模式探索	32
河南日报：政府“买”服务 社会组织缘何难以“接棒”	33
公益时报：宋代“杨六斤”们与检校制度	35
公益时报：基金会传播现状堪忧？	38
公益时报：企业社工的东莞之路	41
【鸿芷】阿里公益基金会 Q&A 四部曲（四）互联网的本质就是帮助社会做公益的事情.....	45
【资助者说】第 15 回：理想中的资助者应具备的“资助者心态”	47
【DMEL 每周一问】第 42 问：美国基金会怎么做评估？	51
社会创业家：救灾 NGO 的坚持与探索	53
西藏自治区户外协会：当尊重不存“益”在何处 腾讯益行家藏地越野赛引发的反思	58
顾远：英国的公益“薪”问题	60

◎行业动态

开全国先河 成都建立全国首家社会组织学院	65
“中国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现代化”会议召开	66
红十字会：请大家忘记郭美美 称将把有限精力和资源投入抗震救灾	68
郭美美被抓是“掩耳盗铃”？“商红会”慈善真相！	71
民间环保呛声鄱阳湖建坝	78

◎国际观察

社区利益公司：英国独特的社企模式	83
------------------------	----

可穿戴技术将改变慈善机构与捐助人的关系	86
◎企业社会责任	
马蔚华：在中国做公益，比做招行要难很多倍	89
马蔚华对话布兰森等企业家：用商业模式管理慈善机构	92
如果那些很牛的企业们不止是做 CSR，会发生什么？	97
◎云南鲁甸地震专题报道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 有序做好支援鲁甸地震灾区抗震救灾工作	100
民政部关于云南鲁甸 6.5 级地震抗震救灾捐赠活动的公告	101
云南省民政厅设立云南鲁甸地震社会组织救援服务平台	102
云南鲁甸地震见证应急救援新变化	103
鲁甸地震 24 小时，17 家基金会积极投身抗震救灾	105
鲁甸 6.5 级地震：民间救援迅速展开 行动趋于理性	108
基金会中心网关于支持云南鲁甸地震社会组织救援服务平台的倡议书	110
基金会救灾协调会云南鲁甸地震社会组织协同救灾倡议书	111
冯永锋：NGO，你要不要救灾？	112
南都支持“民间公益组织鲁甸抗震救灾协作平台”大本营建设	115
鲁甸震区首个“公益组织灾区工作站”建成	116
南都基金会-鲁甸地震救灾策略	119
“公益同行·鲁甸地震社区陪伴计划”正式启动	120
正荣专项救灾基金开放申请	122

◎政策点击**民政部发布 2013 年全国性社会组织薪酬调查报告**

近日，民政部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关于发布《2013 年度全国性社会组织薪酬调查报告》的通知：

为帮助社会组织提供与其发展相适应的薪酬设计依据和决策参考，了解社会组织薪酬对外竞争力不足及对内激励较弱等问题，从而科学引导社会组织规划自身薪酬制度，民政部民间组织服务中心联合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历时一年，在全国性社会组织中开展了薪酬调查工作，同时形成了《2013 年度全国性社会组织薪酬调查报告》。

该《报告》通过对行业协会商会类、公益慈善类、科技类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情况进行采样，较为客观阐述了社会组织薪酬的现实状况、存在问题以及与其他行业相比较的结果，剖析了社会组织薪酬制度不合理的内在因素和外部制约，并提出了在现实条件下制定合理薪酬方案的建议。应有关社会组织要求，现将该报告发布。此报告为学术理论成果，不是政策依据，仅供参考。

该《报告》将免费与社会组织分享，只需登录中国社会组织人力资源管理服务平台（<http://www.npo.net.cn/hr>），在首页“其他信息”一栏，按照提示要求填表，提交相关数据，进入系统即可查看下载《2013 年度全国性社会组织薪酬调查报告》。您提交的数据将作为 2014 年度社会组织薪酬调查报告的重要依据，并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开展社会组织人力资源状况调查工作，以达到帮助社会组织建立合理薪酬制度的目的。

来源：人民网

地址：<http://gongyi.people.com.cn/n/2014/0806/c151132-25417104.html>

[【返回目录】](#)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省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为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96号），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公共服务改革，探索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模式，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现就推进我省政

府购买服务工作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基本原则

政府购买服务应突出公共性和公益性，进一步放开公共服务市场准入，把政府直接向社会提供的一部分服务，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承担，并由政府根据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向其支付费用。

政府购买服务的基本原则是：

——积极稳妥，先易后难。从各地实际出发，准确把握社会公共服务需求，稳步推进工作开展。条件成熟的购买项目先行先试，条件不够完备的项目要深入研究，条件成熟后再实施。

——公开择优，注重实效。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通过竞争择优等方式选择政府购买服务承接主体。坚持费随事转，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公共服务质量。

——改革创新，完善机制。坚持政府购买服务和培育承接主体并重，支持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提升社会组织公共服务能力。鼓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推动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逐步理清政府购买服务与事业单位财政经费安排的关系，禁止一边购买服务，一边养人办事。

二、目标任务

“十二五”时期，各地逐步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工作，初步形成统一有效的购买服务平台和制度机制。2014年要在社会救助、职业技能培训、学前教育、公共体育服务等领域开展政府购买服务试点，2015年覆盖到每一个事业类型。到2020年，在全省基本建立比较完善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形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高效合理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体系和供给体系，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显著提高。

三、规范实施

（一）确认购买主体

政府购买服务的主体是各级行政机关、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且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其他纳入行政编制管理且经费由财政负担的群团组织，根据实际需要实施购买服务。

（责任单位：各主管部门、省财政厅、省编办，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二）选择承接主体

政府购买服务的承接主体包括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成立或经国务院批准免于登记的社会组织，以及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或行业主管部门登记成立的企业、机构等。承担有公共服务职能的具备条件的公益二类事业单位和从事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可以成为承接主体。承接主体应符合国家有关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政企分开的要求，并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 依法设立，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
2. 治理结构健全，内部管理和监督制度完善；
3. 具有独立、健全的财务管理、会计核算和资产管理制度；
4. 具备提供公共服务所必需的设施、人员和专业技术能力；
5. 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险资金的良好记录；
6. 在参与政府购买服务前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纪行为，资质审查合格，社会信誉、商业信誉良好；
7. 符合登记管理部门依法认定的其他条件；
8. 法律法规规定以及购买服务项目要求的其他条件。

承接主体的具体条件由购买主体会同财政部门根据购买服务的内容确定。

政府购买服务的承接主体在履行政府购买服务合同过程中有违约行为的，应承担相应责任，并在信用体系中予以记录，在三年内不得再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等活动。

（责任单位：各主管部门、省财政厅、省民政厅、省工商局、省编办，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三）确定购买内容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以及涉及国家安全、保密事项、行政行为或应当由政府直接提供的事项外，下列事项全部或部分内容要逐步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

1. 一般性公共服务。公共教育服务、劳动就业服务、人才服务、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养老服务、优抚安置服务、医疗卫生、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等社会公用设施管理维护、住房保障、公共文化、公共体育、公共安全、残疾人服务、环境保护、交通运输、服务三农、战略物资储备等事项。

2. 社会管理性服务。社区建设、社会组织管理服务、社工服务、法律援助、慈善救济、人民调解、社区矫正、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安置帮教、公益宣传等事项。

3. 技术服务。科研、行业规划研究、行业规范、行业产品标准和服务标准研究、数据调查、数据处理、统计分析、资产评估、审计服务、检验检疫检测、监测服务等事项。

4. 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事项。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研究、经济形势分析宣传、法制宣传、法律服务、课题研究、政策（立法）调研草拟论证、会议经贸活动和展览服务、评估、绩效评价、工程服务、项目评审、咨询、专业技术审查、公共信息系统开发与软硬件维护、技术业务培训、公众档案整理、后勤保障等事项。

5. 其他适宜由社会力量承担的服务事项。

(责任单位:省财政厅、各主管部门、省编办,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四) 制定购买目录

省级及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财政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在把握公众需求的基础上,分别制定本级、本辖区购买服务目录,报同级人民政府审定后公布,明确政府购买服务的种类、性质和内容,并根据政府职能转变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时进行动态调整。

(责任单位:省财政厅、各主管部门、省编办,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五) 规范购买程序

各级各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机制,确保项目申报、项目审定、组织采购、资质审核、合同签订、履约监管、绩效评估等流程公开、公平、公正。

1. 项目申报。购买主体应在编制下一年度预算时,按照财政部门统一要求,参照公布的政府购买服务目录,结合同级党委、政府工作部署以及部门预算安排、本单位工作实际等因素,编制年度购买服务计划,报同级财政部门。财政部门按照有关政策规定,组织力量对购买主体报送的购买服务计划及具体项目统一审定。

2. 项目公示。政府购买服务计划审核确定后,购买主体及时按照政府采购要求在政府采购公共信息平台及部门的门户网站上向全社会公布购买服务项目的预算资金、主要内容、承接标准和目标要求等信息。

3. 购买方式。选择承接主体既要考虑项目费用,也要注重服务能力、专业素质和服务质量。购买主体将所需购买的服务事项及具体要求通过政府采购公共信息平台向全社会公布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74号令)的规定和项目的实际情况分类处置。根据服务项目的需求特点,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询价等方式确定承接主体。对于有服务区域范围要求、但本地区承接主体无法形成有效竞争的服务项目,可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和完善服务项目政府采购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37号)的规定,采取大额项目拆分采购等措施。

4. 合同签订。购买主体按照合同管理要求,根据采购文件的相关条款与承接主体签订合同,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合同中除应明确服务项目、范围、标的、要求、期限、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等内容外,还应按照资金支付与服务质量挂钩原则明确支付方式,严禁转包行为。根据购买服务项目的需求特点,购买合同可以采用购买、委托、租赁、雇佣等合同,财政部门在此基础上制定发布相应的合同范本。购买主体要及时将签订后的购买合同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

5. 执行管理。承接主体要认真履行合同规定,采取有效措施增强服务能力,提高服务水平,确保服务的数量、质量等达到预期目标。购买主体应当按照购买合同规定的服务标准组织履约验收,

验收完成后，购买主体应当将验收情况在部门的门户网站上向社会公开。政府购买服务所需资金由购买主体依据购买服务合同，按现行的政府采购资金支付程序支付。

（责任单位：各主管部门、省财政厅，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六）落实资金安排

政府购买服务所需资金按照以事定费的原则，在既有财政预算中统筹安排。随着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发展需增加资金的，应列入财政预算，严格资金管理。

购买主体应结合项目特点，综合物价水平、工资水平、社会保障缴费、税收等因素，合理测算并安排购买资金，既要节约财政资金，又要保证承接主体的运营成本及合理回报，还要确保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责任单位：各主管部门、省财政厅，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七）完善绩效评审

承接主体应当对购买服务的项目资金进行规范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接受并配合相关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按要求提供资金使用情况、项目执行情况报告以及成果总结等材料。

购买主体应会同财政部门，将政府购买服务资金纳入财政资金绩效管理体系，并围绕购买服务流程、需求评估、成本核算、专业方法、质量控制、招投标管理、监督管理、绩效评审、能力建设等环节，做好相关标准的研究制定，逐步建立科学合理、协调配套的购买服务标准体系。

推进建立由购买主体、服务对象及第三方组成的综合性评审机制工作，对购买服务项目的数量、质量和资金使用绩效等进行考核评审。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推进第三方评审。坚持过程评审与结果评审、短期效果评审与长远效果评审、社会效益评审与经济效益评审相结合，确保评审工作的全面性、客观性和科学性。评审结果向社会公布，并作为以后选择政府购买服务承接主体的重要依据。

（责任单位：各主管部门、省财政厅、省审计厅、省编办，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八）强化监督管理

购买主体、财政部门应切实加强过程监管，按照政府购买服务合同要求，对专业服务过程、任务完成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财政部门要加强对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的组织指导，严格资金监管。监察、审计等部门要加强监督，确保政府购买服务资金规范管理和合理使用。对任何截留、挪用和滞留资金以及其他违法违规行为，按规定予以处罚、处分或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民政、工商行政管理及行业主管等部门应按照职责分工将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行为纳入年检、评

估、执法等监管体系，联合财政部门、购买主体建立相应的信用记录和应用制度，不断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推进政府购买服务信息公开，购买主体及时将购买的服务项目、服务标准、服务内容、资金安排、绩效评价标准和结果等信息通过政府采购公共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开，提高透明度，主动回应社会关切，接受社会监督。

（责任单位：各主管部门、省财政厅、省民政厅、省工商局、省监察厅、省审计厅，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四、组织保障

政府购买服务由政府统一领导，财政部门牵头，民政、工商行政管理以及行业主管部门协同，职能部门履职，监督部门保障。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应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把政府购买服务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制定购买服务计划，先组织试点后推广，分步实施，稳步推进，认真制定并逐步完善政府购买服务的政策措施和实施办法，并抄送上一级政府财政部门。省财政厅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各地开展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总结推广成功经验，积极推动相关制度法规建设。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和省直有关部门要广泛宣传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的目的意义、目标任务和相关要求，做好政策解读，加强舆论引导，主动回应群众关切，充分调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14年7月29日

来源：福建政府网

地址：http://www.fujian.gov.cn/zfxxgkl/xxgkml/jgzz/fzggwjzc/201408/t20140804_763395.htm

[【返回目录】](#)

◎专家视野

郑言：“治理现代化”与改革创新体制机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改革与创新体制机制是重要的途径和方法。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国家均具有体现其本质的制度体系。由于特定的制度体系是由历史与国情特别是由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因此世界上有多少国家就有多少种制度模式。与此同时，一般也具有实现制度的体制机制。体制机制作为体现和实现特定制度体系的方法和途径，能动地为制度治理能力的充分发挥提供有力的支撑。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与建设过程中通过不断探索总结，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体制机制，为中国社会提供了基本的治理框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体系的基础上，改革一切不利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效能的体制机制，创造有利于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新的体制机制，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明确国家治理目标的根本性，全面改革创新体制机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由此可见，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服务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总目标。在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的当下，单刀直入的改革难以促动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进程。因此，必须全面深化各个领域的改革。

其一，进一步推动经济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为推动经济高速持续发展、解决金融危机等世界性经济难题方面虽然显现出自己的优势，但是政府与市场、投资与消费、稳增长与调结构、垄断与竞争等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深层次矛盾不断突出，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继续完善市场规则，而且要调整和优化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企业与员工等多元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通过经济领域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全面推动各种关系的协调与优化。

其二，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政治领域的体制机制创新为包括经济领域在内的其他领域的治理活动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政治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有利于人民群众充分享有管理国家、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的权利，从制度上保障治理过程的人民参与和治理成果的人民共享；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以及执政体制、执政方式的创新，有助于提升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与水平，有效地承担起国家治理过程中利益的协调者、方向的引导者以及资源的整合者的职责；行政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公务员队伍素质、增强国家机关活力，从而增强政府在调节经济发展、解决社会矛盾、协调利益关系、促进社会生产等方面的引导和调控能力。

其三，大胆推进社会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在利益多元、组织多样、观念分化以及矛盾凸显的中

国社会，国家治理事务空前复杂，急需继续推进社会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为社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政策、制度环境，通过税收优惠、资金扶持、人员培训等方式，为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社会治理职能的完善既有利于弥补政府能力有限性和市场逐利性等固有的缺陷，也有助于提升公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其四，大力启动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不可否认，由于在世界范围内，话语权仍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部分国家始终以冷战思维，对中国的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模式横加指责。由于西方利益和偏见被巧妙地包装在所谓民主、自由、正义等价值中，并通过多种媒介向中国传播，导致部分人对于中国道路产生怀疑。这种情形极大地干扰了中国国家治理正确的发展方向。为了从根本上防止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和民主制度的渗透与入侵，必须从观念和价值上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为此需要不断加强相关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渠道提升中国治理的“软实力”，彰显中国国家治理的独特魅力。

认识国家治理问题的复杂性，注重改革创新体制机制的协调性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面临着诸多的具体治理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进程的加快，资本、信息、人员等生产要素的高速流动，不断冲击着已经形成的各种关系，制造出纷繁复杂的问题与矛盾，在这种态势下，如果仅仅着眼于具体的治理方式改革创新，忽略相互之间的联系与作用，不仅可能造成治理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可能诱发问题性质的转变以及社会矛盾的恶化。因此，应关注不同领域、不同问题之间改革创新的协调性，防止因为改革措施的碎片化而削弱改革的效果。

其一，关注不同改革创新领域之间的协调。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领域之间的界限愈发模糊，任何针对特定领域的改革必定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必须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制定科学的改革创新规划；在明确不同领域改革间相互联系的基础上，建立完善改革创新治理体制机制的综合协调性机构，从而保障不同领域改革创新的目标、步骤、手段以及资源之间的协调一致。

其二，关注不同改革创新手段之间的协调。国家治理具有明显的务实特征，更加强调问题的解决和管理的实效。一切有利于特定治理问题解决或缓解的方式、方法、手段或者模式都可以用于国家治理过程。由于不同治理方式的应用条件、适用范围、价值内涵以及实际效果之间并不一致，很容易导致不同改革创新方式间的冲突与内耗，所以，改革创新治理体制机制必须对不同的方式、手段进行科学的评估，明确其适用范围与条件，避免东拼西凑或削足适履。

其三，关注改革创新所涉及利益关系之间的协调。从本质上讲，任何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都是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在改革逐步深入的情况下，利益关系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和失序化的趋势，

尤其是随着社会发展成果的积淀，一些系统性的不合理利益格局呈现固化的态势，成为改革创新过程中的障碍之一。因此，改革创新体制机制不能仅将注意力投入到新方法、新技术或者新制度的应用上，而且应该深入分析治理过程中可能触及的利益关系，通过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利益补偿机制等方式，尽可能扩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的范围，提升改革的程度，实现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有机结合。

把握国家治理方式的动态性，推动治理体制机制现代化

特定治理体制机制是历史的和动态的，过去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治理机制可能无法适应新时期国家治理的需求。随着中国的高速发展，国内与国际、传统与现代、单一与多元、封闭与开放、发展与稳定、生存与环境等多重矛盾交织在一起，导致新的治理问题层出不穷，因此也必须不断改革创新体制机制，运用现代化的手段和方法解决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努力做到治理体系、治理手段、治理方法的时代化。适应民主、法治、效率、责任对国家治理方式、方法提出的要求。革新国家治理思想，打破权力本位、部门思维、家长思维、官僚思维等不适应复杂多元社会的思维模式，真正确立服务本位、大局思维、民主思维、市场思维；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于微观经济和社会管理活动的过度干预，真正把改善民生、保障所有人享有公平的机会、民主法治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作为治理目标；认识改革的困难，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努力革除一切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为新问题的解决留出充足的创新空间。

此外，创新治理体制机制，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的是要通过创新切实提高国家治理的效能，切实解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复杂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站在整体的高度，结合当前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突出和急迫问题，保障创新的空间和创新的可持续性，鼓励直面社会问题的基层部门和组织的治理模式创新；借鉴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在治理国家过程中创造的有益和具有启发意义的治理机制，用以解决中国具体的治理问题，并建立完善的创新评估机制，对新型治理体制机制的实施效果进行总结评估与跟踪监督。

认知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性和差异性，渐进改革创新治理体制机制、建构本土化治理体制机制

国家治理体系构建不是一日之功，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也非一日之力，任何国家治理模式都是在长期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邓小平提出“恐怕再有30年时间，我们才会在这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到二〇二〇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不断改革创新就是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利用一切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制机制，包括中国共产党执政六十多年来逐步积累的经验 and 取得的丰硕成果统筹新旧体制机制之间的关系：在治理方式创新的过程中以实际效果，而非以“新旧”区分来对待体制机制

；基于对现有体制机制的深刻了解与把握，关注改革创新的渐进性和传承性；认识改革创新的多层次性，只要有利于治理实效的提升，任何层次的改革与创新都同等重要；充分认识改革的艰巨性，任何破旧立新不仅需要巨大的改革成本，而且可能会遭受到巨大的阻力，在特定情形下，采取继续拓展现有治理体制机制的发展空间，不失为一种稳妥有效的改革策略。

毫无疑问，国家治理体系服务于特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阶段性发展目标，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存在普遍适用或者唯一的治理模式。所以，各国家需要基于自身的国情，在长期的探索中构建自己的国家治理体系。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断地创新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并在维持经济增长、保持政治稳定、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等多个方面展现出西方治理模式无法比拟的优势。当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各式各样的新问题、新矛盾也不断出现。为此，应该树立制度自信，始终坚持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本土化。尤其必须明确的是中国改革和创新治理体制机制，绝不是用新的概念或者模式来评判中国现实和设计未来的模式。本土化也不意味着封闭化，而是要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大胆地汲取世界各国治理体制机制的有益经验和做法，为我所用。（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光明日报

地址：

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4-08/06/nw.D110000gmrb_20140806_1-13.htm?div=-1

[【返回目录】](#)

高成运：尽快给行业协会应有的“名分”

近一段时间，行业协会的境地有些“尴尬”，社会上一方面呼吁政府要简政放权，加快转移适合行业协会承担的职能，同时又有质疑行业协会承接能力不足的声音；中央明确要求探索一业多会，鼓励适度竞争，但社会上又有协会数量过多的担心；行业协会大都坚持自己的非营利属性，而社会上又对行业协会的赢利行为尤为关注。行业协会如何准确定位，值得认真思考。

近年来，我国行业协会在发生着“脱胎换骨”的变化，全国近7万家行业协会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作用令人刮目相看，行业协会普遍加强法人治理结构，制定行规行约，发挥行业自律作用，积极参与市场监管，参与行业规划、政策法规和国家标准制定，搭建各类服务平台，帮助企业开拓

国内国际市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据统计，仅700多家全国性行业协会2013年全年举办大型展览会和交易会407个，其中国际排名前三的有93个，参加国际组织403个，参与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202项，代表行业企业提出国际贸易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应诉、申诉173次，协调行业内外纠纷达2200多次，做了很多政府没精力去做、单个企业想做又做不到的事情，创造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难以估量。

由于我国至今并没有一部法律来保障行业协会的权利和义务，因此，行业协会做的很多事情不仅没有政府的资金支持，而且行业协会的贡献也没有被社会所广为人知，从某种程度上说，行业协会是在默默无闻地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像“无名英雄”一样没有得到应有的“名分”。

当前，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行业协会的承接作用和自治自律作用不可缺失，新的形势迫切需要对行业协会进行新的定位。

首先行业协会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虽然是非营利组织，但本身也要生存、要发展，应支持行业协会按市场化原则依法依规开展活动，允许其“取财有道”，同时行业协会又是互益性组织，对其收入和财产的管理，不能照搬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管理的做法，应尊重行业协会的特点属性，在政府依法监管的同时加强社会监督。

其次是政社分离，加快推进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工作。因为双重管理体制的原因，行业协会至今仍有一个“婆婆”，不仅社会经常诟病行业协会的“二政府”身份，而且行业协会有时也容易成为政府有关部门的“替罪羊”。脱钩不到位，行业协会难有独立法人地位，“二政府”的帽子也就永远摘不下来。

还要加大扶持发展的力度，通过加快政府向行业协会转移职能，真正拓展行业协会的发展空间，特别是要用好政府购买服务这个机制，对行业协会替政府做的事项要“按市场付费”，不能再靠行政的方式直接从行业协会那里“拿”，要通过制度保障让行业协会有钱做事、有事可做。

最关键的要将行业协会的单项立法工作提上日程，从法律层面赋予行业协会名正言顺的地位，这既是当务之急，也是解决行业协会发展问题的根本之道。

相信有了“名分”的行业协会一定能够成为政府的得力帮手，成为行业、企业发展的“助推器”！

（作者系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社团管理一处处长）

来源：中国社会报

地址：<http://www.chinanpo.gov.cn/1940/79125/index.html>

[【返回目录】](#)

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呼吁重新界定小额信贷

“中国的第一家小额信贷机构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主要为贫困弱势群体提供服务，最多时全国曾有300多家，而现在锐减到不足30家，当前中国小额信贷行业发展处于混沌状态，最需要扶持发展的是这类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8月5日，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应邀出席在上海举办的第四届亚洲微型金融论坛（2014 Asia Microfinance Forum），并致开幕词。

目前国内普遍认为，除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外，小额信贷机构还包括由纯商业资本发起成立的，以中、小、微企业或城市白领精英阶层为主要服务目标的小额信贷公司；开展小额信贷业务或小微金融业务的国内大型传统商业银行；甚至包括了最近几年势头很猛的互联网金融P2P平台。

“然而目前在中国关于小额信贷的定义与国际范畴的小额信贷定义有很大差别，国内小额信贷行业的定义不清，形态各异，导致政府部门对于小额信贷的扶持和监管政策不明朗，不统一。”段应碧在会上指出，“这是整个中国小额信贷行业正处于混沌发展状态的原因。”

据介绍，主要以NGO形式存在的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平均单笔贷款普遍不超过10万元；而小额贷款公司平均超过100万元，大型传统商业银行的小微金融业务最高单笔贷款可达到2000万元。受中国金融准入和监管政策的影响，低端的金融服务市场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各类形式的小额信贷机构都有存在的必要和很大的市场空间。但如果按照国际普遍采用的小额信贷的界定标准（平均贷款额度不超过国家人均GDP4倍的标准），国内大部分小额贷款机构可谓名不副实，却得到的政策支持力度最大，发展最快。

以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为例，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6月底，中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8394家，贷款余额8811亿元人民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的公益性小贷机构，数量已不超过30家，总贷款余额不足20亿元人民币，每年扶持的贫困人口也不足百万。“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日均收入一美元的标准，目前我国还有1.28亿贫困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中国现在最缺乏的是针对农村贫困群体的小额信贷机构！”段应碧在发言中强调。

中国扶贫基金会是中国最早开展小额信贷业务的机构之一，自1996年开始在农村贫困地区实施小额信贷业务。2008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将小额信贷业务独立转型成为中和农信公司，实现了从项目型小额信贷向机构型小额信贷的成功转型，目前已成为国内最大的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十八年来，累计在中国16个省112个县开展小额信贷业务，总放款超过70亿元，有效贷款客户20多万户，平均单笔贷款额度1万元，大于30天的风险贷款率仅为0.35%。

段应碧表示，中和农信的实践证明，在中国的贫困地区为贫困农户提供小额信贷服务是可行的，不仅机构自身能够可持续发展，更能有效的帮助贫困农户脱贫致富。但相对于中国一亿多贫困农户

来说，光有一个中和农信是不够的，我们应该研究如何鼓励和推动更多的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的出现和发展。这次论坛对正处于迷失、纠结和混沌状态的中国小额信贷行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2014 亚洲微型金融论坛”由亚太地区微型金融行业协会组织（Banking With The Poor，穷人银行网络）主办，是亚洲地区小额信贷领域最有影响力的盛会，将把亚洲及世界各地的实践者、决策者、投资者、学者以及倡导者们聚集在一起，共同交流经验，分享成就，迎接挑战，共同促进小额信贷和普惠金融的发展。“亚洲微型金融论坛”于 2006 在中国北京首次举办，时隔八年重返中国，聚集超过 500 位亚洲及世界各地的微型金融领域精英，探讨小额信贷与普惠金融发展最前沿的话题。除段应碧会长出席并致开幕词外，中和农信小额信贷还将承担本次大会“关于中国小额信贷现状、前景与未来”重要议题的讨论，并将参与“通过创新方法提升金融能力”等多个议题的讨论。

来源：中国发展简报

地址：<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view.php?id=9508>

[【返回目录】](#)

◎行业观点

人民网：灾后重建中党组织从管理向服务转型的雅安探索

“4.20”芦山强烈地震开启了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由地方党委政府全权负责的新救灾重建模式，雅安各级党组织成功实现了三次从管理向服务的转型。

过渡安置阶段，雅安打破原有建制实行帐篷党建工程，实现第一次转型，形成“党的组织建起来、党员作用发挥出来、群众组织起来”的格局。灾后重建阶段，又实现从变“单兵作战”向“多方协同”的第二次转型，党组织引领社会组织、群众组织、自治组织主动参与、服务重建；现在，雅安逐步改变基层党组织既是基层事务的领导者、又是实施者和裁判者的“全能型”现状，实现从“面上服务”为“重点服务”的第三次转型。

这“三次转型”，始终贯穿服务这一主题，推动了抗震救灾、灾后重建的中心工作，并为探索建立地震灾区基层组织体系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跨界”互补

党组织与社会组织合作更紧密

由省市共建的雅安抗震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搭建了党政部门、专家学者、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应对灾害的跨界平台，纵深式工作机构和扁平化的服务模式，实现了对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最广泛联系、服务。灾后重建近一年，雅安推动灾区社会治理工作常态化、长效化、科学化运行，探索建立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工作体系。

6月1日，名山区蒙阳镇社区留守儿童志愿服务中心的“六·一微心愿”活动正式举办后，服务中心负责人李文军着实松了一口气。

“这是我们中心成立后开展的第一个活动，意义重大。”李文军说。参与志愿服务有近20年的历史，他一直以来只是在社区党支部的引领下“小打小闹”，并没有形成规模。

这次的“六·一微心愿”活动，于李文军，于蒙阳镇社区，都是一次意义略显不同的活动。

5月10日，名山区蒙阳镇社区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正式挂牌成立，20个自愿申请入驻的社会组织，包括公益事业志愿服务和公共文艺志愿服务两大类，他们将开展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公益服务、便民服务等活动，共同推进文明、平安、和谐社区建设。

在抗震救灾中，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凸显，让地方各级党委政府进一步意识到，充分发挥其联系广泛和专业特长的优势，为党委政府填补空缺，完善救灾体系起到积极作用。雅安市委三届七次全会提出，要积极发挥社会组织管理社会事务、承担公共服务的作用。

今年3月，被定位为“大群团”格局的工作阵地、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重要平台、社会协同的服务窗口、服务群众的公益总部、爱心企业的公益伙伴的市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正式成立。

“它整合了工会、团委、妇联等群团组织的资源，可以避免因‘各搭各的台，各唱各的戏’，出现覆盖不够或效率不高的情况。”雅安市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资源的整合，主要体现在学生资助、困难群众帮扶、就业创业等群团组织共性项目的资源，或阵地资源方面的整合；另一方面，是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支持灾后重建，加大社会组织特别是基金会的协同力度。

按照先行先试的原则，雅安先后建立了64个乡镇街道、村社区服务中心（站）。今年年底前，将推动全市建立市县乡村四级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工作体系建设的全面完成。

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工作体系，探索新形势下聚合社会组织力量参与服务灾后恢复重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路子，让党组织与社会组织“跨界”互补合作更加紧密，推动灾区社会治理工作常态化、长效化、科学化运行。

依托服务中心，5月，雅安首次启动购买社会服务工作。

雅安市群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说，购买社会服务的范围主要包括灾区群众人文关怀、灾后特殊困难群众帮扶、灾区群众创业就业、灾后重建社会力量协同等项目，每个项目的经费标准原则上在20万元以内。“届时，我们还会对社会组织项目执行综合绩效进行评估。”

群众自治

党组织引领自治组织参与重建

抗震救灾、过渡安置到灾后重建，灾区基层党组织发挥了重要的引领性和保障性作用。从试行的基层民主议事制度，到圆梦“580”、自强互助合作社，再到自建委员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各级党组织有效引导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为灾后重建发挥群众主体、主责、主力作用进行了有益探索和重要铺垫。

6月20日，在芦山县太平镇祥和村龙坪上组，村民李怀清家的二层砖木结构新房已经装修完毕。

从去年10月动工开始，李怀清算了一笔账：除了装修请的师傅以外，木匠和泥工没花过一分钱工钱。

这样“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得益于当地建立的自强互助合作社。每一个村民小组成立以木工泥工为主、党员群众为辅的“土专家”施工队，按照木结构、砖混结构服务序列，互帮互助完成建房工程。

从抗震救灾、过渡安置到灾后重建，基层党组织具有重要的引领性和保障性作用。在地震灾区试行的党组织领导下的基层民主议事制度，在全市试点建立的村（居）民议事小组、村（居）民议事机构，对物资发放、房屋受损情况鉴定、过渡安置政策执行、选址重建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

项进行了民主讨论协商。而自强互助合作社最初的原型，就源于这样的议事机构。农房重建启动后，互助的基本模式不变，但工作主题由当地群众主动义务参与物资发放、拆除垮塌的危房等救灾工作，变成农房重建。

这种制度，不仅解决了散户重建独木难支的窘境和工匠紧张的问题，村民们辛苦几个月的成果，等于为每家每户节约了几万元的工钱。

党组织有效引导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是取得应急抢险、过渡安置重大胜利的重要经验之一，也为灾后农房重建发挥群众主体、主责、主力作用进行了有益探索和重要铺垫。这种自发成立群众自治组织，在灾后重建的雅安，如雨后春笋般壮大起来。

这点上，体现最明显的要数“自建委”模式。

去年雨城区上里镇庙坝村“水景家园”安置小区建设启动后，重建户业主召开大会，组建了由9人组成的自建委员会，69岁的杨洪全高票当选为“自建委”主任。

“自己看着修起来的房子，住起心里都踏实。”冯成说，每天在现场监督项目进度和质量，沟通协调业主、村民、施工方、监理方等方面的问题，在亲自参与工程施工的过程中，他对新村聚居点的工程质量有足够的信心，“如果哪里修得不合适，或者业主有疑问，我们要帮忙协调解决。”

像这样的“自建委”，在雅安的237个新村聚居点全面建立。由7-9人组成且不与村“两委”成员交叉的自建委，通过组织推荐、群众推荐、个人自荐、民主选举等办法，独立自主地开展价格谈判、项目实施、资金管理、质量监督、事务协调等工作。

在“自建委”逐步壮大后，雅安开始从制度层面保障其工作的规范运行。一方面实行“自建委”必建临时党支部、自治章程和工作台帐，及时公示重建政策、工作职责、个人承诺、资金使用、质量监督情况、群众疑问；另一方面，地方党组织召集住建、发改、国土、财政、审计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对“自建委”成员进行招投标、财务管理、房屋质量技术监督等知识培训。

群众自治组织无疑为灾区各级党组织加强群众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灾后重建开展近一年，雅安开始积极思考灾后重建后聚居点村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长效运行方式。

“我们届时将引导‘自建委’向新村管委员、小区管委会等平稳过渡，将群众自治机制进一步拓展延伸。”雅安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互惠共赢

党组织激发经济组织活力

灾后重建不仅仅把住房建好，更重要的是解决长远发展致富问题。专合组织是基层党员干部锻炼的“疆场”，雅安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执政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克服“公司+农户”模式中追求单向利益最大化的不足，充当群众谋利益、求发展、维权益的主心骨、贴心人和引路人，使党

组织成为农民合作组织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芦山县农工委的工作计划上，赫然列着灾后恢复重建三年的目标：发展 300 家专合组织，平均每个村至少有 3 到 4 家。

为了让受灾群众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雅安提出建设 35 个“业兴、家富、人和、村美”的幸福美丽新村的目標，力争到 2015 年，每个幸福美丽新村打造 1 至 2 个主导产业，新村聚居点农民人均收入达 10000 元以上。

“专合组织可以成为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党群联合致富链条，”芦山县农工委有关负责人说：“专合组织是基层党员干部锻炼的‘疆场’，农村基层党组织有它的特殊性，这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

按照这一思路，目前芦山县发展的专业合作社，已有 108 家，分布在种植业、牧业、林业、服务业、渔业。

灾后重建不仅仅把住房建好，更重要的是解决长远发展致富问题。雅安各级党组织把产业重建作为增强灾区“造血功能”、促进群众增收致富的民生事项来抓，着力为长远发展打基础、强后劲。鼓励灾区企业吸纳受灾群众就业，支持个体私营企业发展，落实好鼓励私营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积极引导个体私营企业加大投入，扩大规模，增加就业岗位，吸纳受灾群众就业。

名山区经信局副局长胡文勇介绍，目前名山区已经建立 30 个非公企业党组织、1 个茶商会。从生产自救到灾后重建，经济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

来源：人民网

地址：<http://sc.people.com.cn/n/2014/0801/c345167-21845960.html>

[【返回目录】](#)

南方日报：公益创投对社会组织吸引力强

7 月 25 日，随着广州市首届社会组织公益创投（以下简称“公益创投”）入选项目资助合同签订仪式的落幕，此次公益创投活动正式进入了具体实施阶段。7 月 22 日开始，由 NGO CN 等公益机构特别策划的“广州市首届公益创投参与情况与反馈意见”问卷调查，邀请广州市各社会组织就本次公益创投活动进行意见反馈。截至 8 月 2 日，调查共回收问卷 92 份，其中有效问卷 85 份，参与调查的社会组织从资金、门槛以及透明度等角度提出了建议。

本次调查的样本选择方式并非基于全广州市社会组织的随机抽样，但它仍可代表部分较活跃的

社会组织对于此次公益创投的评价及建议。有 48.24%（41 个）的受调查机构表示“一定还会参加下一次创投”，45.88%（39 个）的组织表示会“看情况”，仅有 3.53%（3 个）表示“不会参加”，足见公益创投对于社会组织的吸引力。

南方日报记者 赵新星

实习生 蔡青 通讯员 吴丽岚

建议一：资金量再大一些

据了解，此次公益创投活动共投入 1500 万元资金，每个入选项目将获得 3 万—30 万元的资助。通过审核的 100 个项目中，有 8 个项目获得了 30 万元的最高资助金额，其他 37 个项目获得的资助则在 10 万元以下。

在问卷调查结果中，88.64%（39 个样本）的社会组织提到“项目开展需要资金”是申报此次公益创投的主要原因之一。此次公益创投共征集到 238 个申报项目，申请资助资金和社会配套资金双双超过 5000 万元，但多个项目、多个社会组织分摊下来，有不少机构觉得能申请到的数额还是有些不够。

有人士建议，公益创投所投入的资金可以实行比例机制，即根据财政预算中民生支出部分的百分比投入资金。每一次公益创投可以制定一个主题，针对某一类服务对象开展，让资金的使用更加集中。

建议二：参选门槛放宽些

在参与此次调查的机构当中，约有一半并未参选此次公益创投，其中有 34.15%（14 个样本）的组织表示是由于“申请条件不符”。据《广州市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创投主体必须在本市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因此，未注册的社会组织都被拒在了门外。有部分参与调查的人士建议，应该给没有注册的社会组织和草根机构等更多的机会。

在此次公益创投的项目类别设置方面，也有参与调查的人士提出“规定的项目范围太狭隘”的问题。据了解，《办法》中指定的公益创投项目资助范围主要包括为老服务类、助残服务类、青少年服务类、救助帮困类和其他公益类五大类。调查显示，在未申报参选此次公益创投的社会组织中，有 29.27%（12 个）的社会组织就是因为“没有合适的申报项目”而放弃。调查结果也显示，在参与了本次创投的受访组织的申报项目类型上，“青少年服务类”的比例最大，为 34.09%（15 个），“其他公益类”的比例也达到 31.82%（14 个），涉及志愿者团队建设、协助社区事务、城市规划、外来人口服务以及环保等主题，但入围比例较低。在调查中有人士认为，“此次创投对公益的理解还是比较狭窄，希望未来能涵盖更多元的公益领域，如志愿者教育、文化保育、环境保护等”。

建议三：评选过程透明些

公益创投的承办方是如何确定的？评委会是如何选择的？评分标准谁说了算？参与调查的人士提出的这一连串问题，反映出此次公益创投的参与者对评选过程存在的不信任。

对此，本次问卷调查专门设计了一个量表以了解受访的社会组织对本次公益创投活动中各个环节的评价，包括项目申报的设计、活动宣传、评审过程等。结果显示，整体而言受调查机构对项目申报环节的评价高于项目评审环节。对于项目评审的“评审规则”和“评审专家”的评分分别仅为 0.26 和 0.21 分，对“评审过程”的评价甚至为负分。由此可见，创投活动的评审环节相对于此前的申报、宣传环节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在调查中，有人士建议，“从立项到评审，每个环节都应该清楚透明地公示”。即使在入围项目公示之后，也应公开入围项目的评分过程和各项得分情况，同时知会落选者其落选原因，以让大家互相学习，取得进步。

承办方回应

下一届将投入更多资金

作为此次公益创投活动的承办方，广州市创意经济促进会社会公益部部长刘杰雄针对大家提出的建议，一一做出回应。

他解释说，毕竟是首届公益创投，所以政府投入的资金量不会太大。同时，为了效果的展现，资助的社会组织比其他的公益创投活动更多。很多公益创投投入资金 1000 多万元，只资助 30 或者 50 多个机构，但是此次广州市公益创投资助了 100 个社会组织，因此分到每个社会组织的就少了。如果此次公益创投的效果良好，下一届一定会投入更多的资金。

而对于参选的门槛，他表示，《办法》由主办方制定，有效年限是 5 年，因此在 5 年内非注册的组织可能没有机会参与。他认为这样的决定主要是考虑到风险问题：未经注册或者机构内没有 3 个以上的专职人员，没有办法保证项目的实施和资金的落实。

同样，此次公益活动的评选过程也完全按照《办法》严格执行，评选细则等都依照主办方的要求执行，专家从民政局的专家库中抽选，独立评分，所有的评分过程都有监督人员参与。所有参选的项目在广州公益创投服务平台上也有公示，刘杰雄表示，之后也会把入选的 100 个项目的实施情况、照片都放到网上，让大家放心。

来源：南方日报

地址：http://epaper.southcn.com/nfdaily/html/2014-08/05/content_7335790.htm

[【返回目录】](#)

南方都市报：中国“公益黄埔军”出珠海记

7月暑假一到，珠海的大学园区里空荡起来，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学生张嘉琪也有些想回家，但在这之前，刚结束大二学习的她还需要完成一项对她而言极为重要的事——她正在争取成为北师大珠海分校公益慈善事业管理专业方向的新生。“立志从事公益事业”的她面临了一个难题：知道时报名已经结束了。

事实上这个专业并不是一个国家认可的大学本科“专业”，而是北师大珠海分校宋庆龄公益慈善教育中心内设的“专业方向”。教育中心由上海宋庆龄基金会联合北师大珠海分校和基金会中心网三家机构在2012年共同创办，学制两年，生源从北师大珠海分校大三学生中报名选拔产生。

这是中国首个针对本科生的公益慈善类专业教育中心，成立两年后，公益慈善业内也习惯将其称作中国公益“黄埔军校”，31名毕业生也被称作国内的首批“公益黄埔军”。教育中心主任金宝城介绍，成立“公益慈善教育中心”除了想弥补公益慈善行业人才稀缺外，也是希望通过专业人才素养的提升，促使公益行业向专业的职业化管理转变。

在金宝城办公室的外墙上，印着2013年《中国公益慈善行业专业人才现状调查报告》发布的新闻，这份由“宋庆龄公益慈善教育中心”、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等机构共同完成的权威报告显示，当前专业募捐人员占有基金会工作人员的比例仅为9.7%，不足总员工数的十分之一，且77.5%的人在岗时间不足3年，甚至有23%的人没有任何该方面从业经历。除了急缺募捐人才，如筹资、技术、财务等人才在基金会中均十分稀缺。

这份报告更加坚定了金宝城培养专业公益慈善人才的信念。两年前首批选拔的31名学生今年6月已经全部毕业，绝大部分选择了公益慈善组织就业。

他们打包行囊，离开珠海，奔赴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基金会或企业CSR（企业社会责任）部门，汇入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大江大河之中。

毕业遭“抢”

尚未毕业时，基本会成批地要实习生

尽管是周末，颜俊玲仍然在为一个徒步公益活动忙碌，忙碌的工作是公益慈善从业者的“标配”，一遇大型公益活动，“忙碌指数”还要急剧上升。

一年前来到北京，离开北师大珠海分校的公益慈善教育中心后，颜俊玲顺利入职“中”字头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成为“善行100”公益项目的一员。如今，已经有了5名来自北师大珠海分校的同学成为她的同事了，他们习惯将自己成为珠海“公益班”毕业生。“有公益慈善专业教育背景还是比较受欢迎的。”颜俊玲说。

严格来说，颜俊玲才是真正的北师大珠海分校“公益班”的首批毕业生，去年6月，她和另外5名同学就已经离开公益班出来就业。

这缘于2012年公益慈善教育中心成立时的特殊情况，2012年5月，新成立的中心开始面向在校生招生，40人的班级规模，只针对大三的招生最终也对大四学生开放。25名大三学生和6名大四学生一同进入这个国内首创的公益慈善管理专业方向。2013年，包括颜俊玲在内的6名大四学生率先毕业，颜俊玲之外，2名同学在授渔基金工作，一名同学在海南成美基金会工作，另外两名同学则在申请澳门科技大学和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公益慈善硕士。2014年，余下的25人毕业，意向中14人进入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等公益组织，其余多进入企业的CSR（企业社会责任）部门，还有2名则计划去港澳读研。

金宝城对“公益黄埔一期”毕业生的这份“成绩单”感到满意。鉴于国内公益慈善专业人才的欠缺，“用人单位几乎是过来‘抢’人的”，金宝城说。“抢手”更显现现在尚未毕业时，基本会成批地要实习生，“今年有7个学生在中华儿慈会实习，他们觉得人手不够，明年要预定10个。这7个学生想留下的话他们都会重点考虑。”

不论是从人员构成还是行业发展，公益慈善组织确实太需要这样经过专业培训的人才了。在颜俊玲所在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大部分是“半路出家”，未曾接受过公益慈善的专业教育，需要“专业人才”时，多数的选择是到其他基金会去“挖”。

“科班出身”公益班毕业生很快就会表现出与其他专业同龄人的不同之处，每当管理层提出整体发展思路规划或是一些专业的理念、运作方式、专有名词时，别人多是一头雾水，他们则会很快理解。对于设计行业整体发展的会议或培训，他们也会表现出更浓厚的兴趣。另外一方面，领导也会对他们寄予更高的希望，颜俊玲一入职时就被要求管理一个小志愿者团队。

占有专业优势的同时，“不过这也导致了刚工作时我们压力会更大”，颜俊玲说，尤其是他们去年6个毕业生，一年的学习很匆忙，“多是理念方面的”，学得太粗，导致具体的工作容易因缺乏经验遇到困难。

公益班来了

许多热衷公益的学生将之视为最大的惊喜和礼物

今年颜俊玲所在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又多了一个自己的同学，实习5个月后，今年从公益班毕业的陈孚也顺利就职，目前负责基金会的自媒体传播工作。

与身边的同学不同的是，2012年公益慈善教育中心第一次招生时，陈孚已经大四了。当时他正处于休学状态。

陈孚2008年入学北师大珠海分校，学的是应用心理学专业。甫入学，他就像着迷了似的，把精

力都放在了公益上。他说：“我的兴趣点就是服务于公益年轻人和环保社团。”大一时，他参加了学校的两个环保团队；大二时，他成为世界自然基金会“地球一小时”的珠海高校协调人。大二到大三期间，陈孚还领导成立了一个叫做“绿色珠海”的环保社团联盟。“当时我想把它注册成为民办非企业组织，本来都和民政部门沟通好了，但最后我主观上觉得条件还是不够成熟，还需要多学习，加上一些客观原因，就没有注册。”绿色珠海目前处于休眠状态，陈孚说到此处颇为遗憾。

2011年9月，陈孚进入大四，这个一直“战斗”在公益第一线的大学生提出退学。陈孚说，提出退学的原因很简单，他觉得原来专业的毕业证和学位证等，与他想做的事情无关，所以是没用的，“有媒体说我是厌学，其实不是”。

在父母的劝说下，本来不怎么听劝的陈孚听了一次，选择休学。直到一年后，他突然听说，全国公益慈善专业来了。这正是自己的兴趣和所想学的东西，兴奋的陈孚立马回到学校，参与了公益慈善事业管理专业方向的报名。

但是，被录取的过程并不顺利。

“三位面试老师，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两位老师赞成，一位老师反对。”陈孚说的三位老师，就是中心主任金宝城、基金会中心网总裁程刚和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慈善学博士何莉君。“当时他原专业的学分没有修够，延迟毕业一年，还是没有修够，又挂过科。”第一年招生，金宝城比较谨慎。

面试之后，陈孚向公益教育中心提交了一份五六十页的“公益实践简历”。简历内包括了2009和2012年陈孚对珠海的公益社团做的两次调查。他还邀请了致公党金湾区委员刘昌言为他“背书”，做推荐人。刘昌言是陈孚在一次公益活动中结识的。

陈孚的“绿色珠海”曾做过环境苦难的应急，即对环境灾害、环境事件作出应对。媒体报道金湾区金海岸中学旁边5公里有一家电缆厂，该中学一度有10个老师和1个学生患了癌症，而环保局找不到电缆厂的环评报告。绿色珠海想考察癌症和电缆厂有无直接关系，于是在网络上发起讨论，并在普陀寺组织了一次现场活动，刘昌言参加了那次活动。

“公益实践简历”被程刚和何莉君力挺，陈孚“破格”获得入学资格。

在公益班中，跟陈孚一样，将这一专业的设立视为“福音”的还有不少人，许多从进入大学就热衷公益的学生将之视为学校给他们最大的惊喜和礼物。

进入公益班，中心的老师们讨论制定了三个基本的“门槛”：一是要有公益理念，以后愿意从事这一行业；二是家人支持；三是家庭环境不能太差。“从事公益慈善事业，只能拿到中等的薪酬，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们就业时顾虑就会多。”金宝城说，第三点也是无奈之举，他并不歧视家庭苦难的孩子，反而更愿意培养他们，只是这一行业现状如此。前两点则是为了保证能尽量多地成功为公益事业输送专业人才。

你是双学位吗？

毕业证书上还用括号标注着“公益慈善事业管理专业方向”的字眼

颜俊玲等人的毕业证书上，除了注明原专业外，都还用括号标注着“公益慈善事业管理专业方向”的字眼。在应聘非业内的基金会时，有时就会遭遇对方人力的疑惑，甚至会问，“你是双学位吗？”。

金宝城解释说，“我们正在向教育部申请试办，把公益慈善事业管理作为正式专业，这样就可以设置为辅修课程和双学位课程，还能开设公益慈善的通识类课程。”他甚至做出计划，如果能成为正式专业，还可以细分为筹资、项目管理等几个具体方向，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笼统称为“公益慈善事业管理”专业方向。目前中国的专业目录里没有公益慈善专业，设立时中心只好采取开设“专业方向”的做法，如此才能确保学历的合法性。学校面向各专业大三学生开设，学生所属原专业不变，毕业时仍领取原有的学位学历证书，但证书上会注明“公益慈善事业管理”的专业方向。

宋庆龄公益慈善教育中心首届公益慈善班招收的31名学生，来自11个学院的19个专业。中心将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召集在一起，究竟教给他们什么？培养方案中介绍，公益班将培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坚定的公益慈善理念、了解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前沿、掌握较扎实的原专业(如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金融学、会计学、文学、传播学等)理论基础、具有较强的公益慈善相关岗位实操能力，能胜任公益慈善机构和大中型企业社会责任部门的组织管理、项目运作、宣传推广、专业服务以及理论研究等工作的应用性、复合型高层次专门人才”。

这一长串的定语需要通过《慈善学概论》、《慈善伦理》等40个学分的课程完成。其中包含了10学分的实践课程。

曾经力挺陈孚的何莉君，是深受学生欢迎的一位中国籍“外教”。她如今仍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每年抽一段时间回珠海授课。她的《慈善伦理》课，被每一位受访学生提起并点赞。这门课上，9月上大四的吴滨则对法国小说家亨利·巴尔布斯的《第十一个人》(theeleventh)印象最深。“文章讨论道德困境，假设一个慈善组织救了10个人，但到第11个的时候没有能力去救了，这时候怎么办？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我不搞准则式的探讨，没有标准答案，我最希望看到学生结合自身的思考，看他们写出自己前后观点的对比。”除了阅读量要求很大之外，何莉君还引用课程网络技术，让学生在网络平台上“积分”。发表一篇文章积10分，评论积5分，点赞积1分，每个学生课后必须积满500分。这一切都是为了“逼”学生学会思考、学会批判、学会互相学习。

今年，中心首次尝试让学生综合原专业和公益专业来开题写论文，没想到几乎所有同学都直接选取了公益类题材，抛开了原专业。毕业生张睿颖的论文题目是《公益慈善班的实习情况调查》，他

在这篇以数据统计为核心的论文中，得出了“公益慈善班学生往慈善方向就业比重有所提高”的结论。原专业为家政学的他凭此“慈善”选题论文在慈善教育中心答辩，并顺利通过，获得原专业的学位。金宝城强调，由于教学管理的规定，今后还是要求毕业生以原专业的研究方向写论文。

困境

面包与情怀的抉择

能够选择并在毕业后将公益慈善作为职业，无疑是需要勇气的，金宝城将之称为“情怀”。“如果没有把公益慈善作为职业选择的情怀，我是不主张年轻人来的。想挣大钱？不可能。”金宝城坦承，这个行业普遍面临着流动性大、社会待遇不高的问题。“这也是设立前面几个面试门槛的初衷”。

这也决定了并不是所有的公益班毕业生都能坚守在公益慈善行业。张睿颖就是一个毕业后还没有真正进入公益领域的公益学生。张睿颖原专业为家政学，童年时“留守儿童”的经历使他大学时便一直热衷公益，大一大二时就在基金会做过志愿者，对公益慈善兴趣正浓时，恰逢中心招收，他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机遇。但是，现在他在横琴一家股权公司做融资分析。

“离开”的选择其实更多的是新兴专业面临的社会困境所致，本身社会机制不成熟，而且大众不一定认可。“选择这一职业就得面临很多外界的压力”，9月就升大四的公益班学生姚文秀说。她的同学林龙腾则说，很多人对慈善抱以片面的看法，认为慈善就是不顾一切地付出，这让自己将公益作为“职业”在很多人眼里显得不可理解。

待遇薪酬也是绕不开的因素。颜俊玲目前和五个同事合租，五人挤在一个三房中，分担高达5000多的租金，唯一的好处是离单位近，“省了不少时间和交通费”。“我的恩格尔系数特别高，工资基本消耗在基本生活需求上”，颜俊玲说，干这一行“想存钱确实有点难度”。

而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这仅有的10%有时还在基金会之间的“竞争”中越压越低。对于任何一个行业，低薪酬注定了很难往专业化发展，“高端的专业人才就不愿意来”，颜俊玲说。

公益人的“薪”结跟公众理念也息息相关，“前几年，听说收管理费公众都很不理解，觉得慈善怎么能收钱呢，现在好一点，但提高工资肯定是不行的”。为了基金会的健康发展，颜俊玲所在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早在2002年就完成了去行政化，没了事业编制和财政拨款，“但时至今日，每次办活动我们还是需要不断向公众强调，我们去了行政化，公众的理解对我们很重要”。

金宝城则认为，在制度设计层面，公益组织要想拿到免税资格，工资标准不能高于当地平均工资的两倍。这也造成了工作量再大，人才再重要，工资也上不去的现象。公众无法理解的是，“做公益也是一种职业，只是社会分工不同而已”。

作为毕业就投身公益的年轻人，颜俊玲、陈孚等怀着责任、热心、善良的单纯愿望进入慈善领

域，但有时，他们也不得不面对面包与理想的抉择。

“等到你年龄变大，要成家立业时，发现存款依然寥寥无几，在一个像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城市，你怎么办？会不会离开？”这是不少公益班毕业生们都思考过的问题。

思考

公益慈善教育，何时不再孤军作战

“试想一下，有一天，你走在平常的一条街道上，就能遇到有人在街头做慈善，而你了解到的，身边每周至少有两个你愿意并能够参与的慈善活动。那该多美好。”颜俊玲将这样一幅画面视作自己的职业理想目标，“也许5年能实现”，她顿了一下，“不，也许要等10年才行”。

当前，她则希望中国高校能真正开展公益慈善教育，而非北师大珠海分校孤军作战。公益组织本身，则能更加专业、去行政化，做“玻璃缸式慈善”，而且基金会和草根NGO可以分工更加明确。

从业者社会认同度低、薪酬低，如何破除“困局”一直都是从业者们不断思考的问题。

中心筹建初期，正准备在印第安纳大学开题作博士论文的何莉君被基金会中心网总裁程刚“挖”了回来。她希望能从教育入手，解决从业者自身的认知部分问题。何莉君花了2个月时间，为公益班设计课程体系和邀请师资，她最强调的是学生要通过这些课程树立起自己的公益价值观，要思考“为什么”，而不仅仅是“如何做”。

具有双重教育背景的何莉君认为中外公益慈善教育差距还很大。“美国是个很讲实用的国家，虽然他们的公益慈善教育也强调实操性，但他们已经走过了初创期，正处在成熟阶段，已经建立起共同的价值体系。”她说，美国有200多家学校设有非营利组织对内管理这一类的专业，教学上已经有了成熟的教材，很多研究已经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例如各类基金会的实际操作手法、筹款数据对比等都会进入课堂。另外，社会对教育的“供给”也很大，一些公益行业的人士到学校当兼职教授。而在中国，现在对公益事业专业人才的需求猛增，本科层面上，公益慈善教育需要常规、规范、系统，不能为了追求效率变成职业培训。“要以研究为基础，在大学里设立专业、开发出教材，建立共同的认知，否则就会出现鱼目混珠的现象。”到了研究生阶段，可以提供重学术或重实操两种选择。

公益慈善教育在中国是否能建立一个“中国化”的未来？何莉君说，公益慈善事业存在一定的商业化和政治化需要，但是，“不在共同价值体系下谈创新是非常危险的。”

陈孚读了六年大学，如今在心仪的单位顺利就业，但这个公益小战士的内心并没有真正安顿下来。“改变自己是最难的，我一直在寻找人生的意义，总觉得正在做的事情不如这些问题重要，但这些问题又解决不了。有人让我看开点，但看开了就不能进步，不焦虑就不能进步。”

与陈孚一样，中心的很多学生也在公益这一行业中迷茫地探究着“意义”。何莉君的微博上，引用了一些学生小论文中的文字。有学生写道：“这个社会的浮躁与不安从另一方面来看是伦理的缺失，才会存在‘郭美美事件’、‘小月月事件’等众多丑闻。伦理其实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一种善的力量，而不是一个守法分子。有时候，善良是比聪明更难的，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品性，一种选择。”何莉君说，这一类自主思考的学生是她最为赞赏的，“从他们身上，我也感受到作为一个公益教育者的真正价值。”

金宝城也乐意于将未来寄托在这些学生身上。他最终接纳了张嘉琪，让她破格成为了今年中心录取的第41名学生。

来源：南方都市报

地址：http://epaper.oeeee.com/N/html/2014-08/04/content_2140191.htm

[【返回目录】](#)

广州日报：枢纽型社会组织如何成为草根纽带？

今年以来，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创新社会治理的重大部署，广东多个城市陆续认定了一批枢纽型社会组织，而关于这些枢纽型社会组织，下一步的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到底何谓“枢纽型社会组织”？如何才能激发这些社会组织的活力？在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的广州，它们的发展面临什么难题？本期学术沙龙采访广州市社会工作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中山大学专家、相关社会组织负责人，共同探讨这些问题。

探索：以大带小激活社会力量

2012年，广州市开始对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进行部署。这也是广州市社会工作委员会推动社会组织领域创新的重点工作。广州市社会工作委员会社会组织工作处副处长陈才标向记者表示，目前全市评定的首批枢纽型社会组织，主要从服务实力、聚合能力、枢纽活力、发展潜力、自身建设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经过联名推荐、专家推选、综合评定等多个程序择优评定。他说：“它们都是一些实力比较强、影响比较大、聚合优势比较明显的社会组织，我们看到它们在行业内的力量，有能力带动一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同时帮助草根社会组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作为联接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枢纽型社会组织也符合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协同的要求。

近年来，广州市先后推出放宽注册条件、承接职能转移、参与购买服务、启动公益创投等多项

改革措施，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鼓励与引导显而易见。“虽然门槛降低了吸引很多有心人士创办社会组织，但是他们本身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希望通过枢纽型社会组织发挥他们自身的聚合功能，以大带小，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陈才标副处长坦言。

开展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是广州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途径，目前此项探索还处于起步阶段。陈才标说，“正在研究扶持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的一些激励机制、探索对这些组织在培育能力上的培养，激发这些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动力。”广州市社会工作委员会也希望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合作、品牌培育等形式支持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壮大，把枢纽型社会组织培育成为社会组织的孵化器、行业发展的示范区、协同创新的新平台。

落地：用项目培育草根组织

首批被认定为“枢纽型社会组织”之一的广州市青宫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就坐落在广州人熟知的青年文化宫内。据了解，这个2012年成立的服务中心作为青年社会组织孵化基地，目前已经有91个社会组织入驻。中心副理事长屠宪治向记者透露，有不少草根的社会组织入驻中心之后，获得的除了硬件服务如场地等，更重要的是软件服务。关于这一点，拜客·广州团队的负责人陈嘉俊就说，刚开始开展活动的时候经常都会遇到申请不到场地、资金不足、有些项目不知如何操作的难题，入驻孵化基地之后，这些问题都一步步得到解决。“我们被安排了一系列政策咨询、项目策划、人员培训、资源整合等‘大管家’式服务。基地还定期举行一系列的活动，促进了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他说。另外，虽然这种枢纽型的社会组织并不会给入驻组织提供实质性的资金资助，但是拍好广州·美丽花城的负责人沈敦文则从这里得到了业务的拓展：“孵化基地通过一些项目的带领和推荐，其实间接给我们带来了资金，也给我们提供了与政府、企业项目对接的服务。”

正如社会工作委员会对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定位一样，广州市青宫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如此。枢纽型组织一方面可以激活、规范社会组织的发展，也能从中实现自身转型，从原来行政色彩较浓的模式转向现代的公共服务范畴。

但长期致力于社会组织工作的屠宪治认为，枢纽型组织有必要探索更多创新的培育模式。“我们关注的培育应该更多是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枢纽型社会组织不能满足于过往对草根社会组织提供培训、场地这些基础性的帮助。现在很多项目找不到组织做，也有很多组织却没有项目，我们的作用可以把两者连接起来。通过项目实践来带动草根组织的能力提高，从策划、资源整合、实施、事后评估等等这些环节都可以让草根组织参与起来。”他提到。2013年，孵化基地通过公益加盟的方式发布项目，报名参加项目的社会组织可以通过熟悉项目运作，获得项目经验和资助。“去年曾有一个青少年防性侵项目，是创益文化发展中心通过戏剧普及防性侵知识的，其后为了扩大影响，通过公益加盟吸引了十几个社会组织来申请，我们提供了相应的戏剧教育，优秀的组织还能获得种子

基金方便项目运作。”屠宪治说。

北京是率先推行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的城市。2009年至今，北京已认定了近200家枢纽型社会组织，并以这些枢纽型社会组织为主体，通过搭建平台，带动草根社会组织协同解决社会事务的能力和热诚。最突出的例子要数在2009年，北京市红十字会被认定为“枢纽型”社会组织后，把一支热爱户外运动并自发组成的“蓝天救援队”作为重点培育的社会组织，而“蓝天救援队”在北京市红十字会的带领下，发展医疗急救、无线通讯、高山救援、野外生存等培训，在汶川大地震等特大灾害救援中成为了生力军。这支救援队在目前正在紧张救援的云南地震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海市妇联作为枢纽型社会组织搭建了妇女儿童家庭服务项目公益招投标平台，以社会组织自行申报和承接妇女工作项目方式，填补了很多社会服务领域的空白，这些小型的社会组织结合自身特长在多个社区展开健康讲座、培训讲习班、亲子联欢等等。而且，其所推出的“一会一品”项目，指导每个女性社会组织依据自身资源优势、社会需求设计、开发项目，逐步形成各自的工作品牌。

实际上，几个社会组织发展得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等都没有“枢纽型社会组织”这一创新的模式，这是因为它们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步伐与经济发展相对同步，而我国的社会组织发展却远远落后于经济。近年来大量的社会组织星罗棋布却质量不高，无法满足社会需求，才催生出“枢纽型社会组织”来起引领作用。但是，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两年多来仍然面临着一定的困境，也正遭遇专业人才缺乏、资金来源单一、没有活动品牌等难题。

问题：专业人才缺乏、资金来源单一

枢纽能力有待培养

屠宪治（广州市青宫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副理事长）：“政府不仅仅需要认定枢纽组织，还要从人才、资金、项目方面培育枢纽组织的枢纽能力。枢纽能力主要体现在组织的资源筹措能力，资源是否足够，这关系到我们对其他社会组织的孵化能否到位。目前政府购买花了大部分资源在‘家综’上，以后不妨关注更多方面。枢纽型组织可以通过对众多社会的了解，发放项目资金并对其进行监督、评估，把这些社会组织所做的项目成效与问题报告出资人。而枢纽组织这一系列功能还需要通过稳定的筹资渠道、健全的制约机制来实现。”

自上而下的资源配置方式有待转变

罗观翠（中山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运作方式还应避免行政化，要转变过去自上而下的资源配置方式。另一方面，枢纽型社会组织本身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目前从名单来看，我更期待看到更多长期持续在社会工作领域规模已经做得很大的组织上榜。我不希望这些枢纽型组织依然是工青妇背景的组织，这样对于构建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不会有多大的改变。其实现在很多大型的纯粹的民间组织已经有了很强大的培育、孵化功能，我希望接下来让他们也有承担起纽带作

用的机会，毕竟他们才是社会服务的一线力量。”

来源：广州日报

地址：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4-08/05/content_2710854.htm

[【返回目录】](#)

广州日报：枢纽型社会组织 重在运营模式探索

为了响应“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理念转变，广州今年五月颁布了第一批的16个“枢纽型”社会组织。而它们正好在这个社会组织发展机遇期被赋予了向导的职责。

其实“枢纽型”的概念，北京上海在此方面早已走在前面。毫无疑问，这些具备辐射能力的组织在整合资源、孵化培育上能提供大量丰富的经验。“枢纽型”社会组织从市场、政府获得资源的能力都远在草根组织之上，草根组织依托枢纽型社会组织无非希望获得信息、制度、人力、财力上的帮助，以便更有效地完成社会服务项目。

但正由于“枢纽型”组织在资源上有草根组织无可比拟的优势，导致其中有不少需要突破的利益关系。只有理顺社会组织内里的多元格局，才能有效搭建互动平台，激发各方活力。而落实到实际操作中，如何合理地将资源通过项目招标、公益创投等方式有效、公平地传递分配到其他草根组织，就成为了枢纽型社会组织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当中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资源聚集与公平分配的问题。然而矛盾的是，部分带有行政化色彩的枢纽型组织在运营模式上依然略显固化，当政府把资源分配给枢纽型社会组织，甚至承担政府购买服务招投标的时候，依旧没有对这种自上而下的分配模式进行革新。

从这个层面来说，一方面“枢纽型”社会组织要通过与入驻组织共同协商制定行为规范，在责任、权利、利益上实现自律和内部监督，在内部建立起适应社会组织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有效机制；另一方面，相关部门有必要对枢纽型社会组织资源分配的问题制定细化的监督机制和评估标准，来确保资金投入确实起到反哺草根组织的作用。

说到底，公平与透明应当成为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的第一要义。只有这样，“枢纽型”社会组织才能作为政府和草根组织的桥梁，打通部门、行业、身份对社会组织限制的“最后一公里”；只有始终在社会组织“去行政化”上大刀阔斧，并以公开的社会购买招标架构作为配套，才能给予社会组织发展的信心。

总之，大量社会服务购买项目虚位以待，这急需聚合大量沉睡的民间力量。除了设立枢纽型社

会组织，更重要的还是其背后的制度建设与运营模式的探索。

来源：广州日报

地址：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4-08/05/content_2710721.htm

[【返回目录】](#)

河南日报：政府“买”服务 社会组织缘何难以“接棒”

我省正加快推进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工作。今年上半年，省民政厅拿出300多万元采购资金，正式启动此项工作。

8月5日，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在向有关省直单位公开征集社工项目和岗位需求后，经过专家筛选，该厅确定购买14个社工服务项目，社会工作服务类岗位8类，目前正在组织全省社工机构进行申报。

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征集项目时，18家省直单位中仅有6家单位申报；我省目前只有不到30家专业社工机构，数量远远不够购买社工服务项目招标要求。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本该是政府有关部门转移部分职能，社会组织“接棒”的大好时机，为何实际推行起来却面临不少问题，有哪些困境亟待破解？

政府“买”服务助推社会组织成长

政府购买社工服务，郑州市金水区第一个吃了“螃蟹”，也最早尝到甜头。

2011年以来，金水区在我省率先探索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区政府拿出130万元购买26个社工服务岗位。2012年年底，金水区又拿出250万元购买50个社工服务岗位。这些岗位集中在慈善公益、养老服务、学生心理辅导、婚姻家庭咨询等领域。

2013年金水区开始尝试将社工服务由岗位转向项目，每个项目50万元，重点围绕为养老服务、社区服务和低保群体开发并购买了三个项目，以“项目购买”的方式直接将社会组织的服务与政府需求对接。

今年6月26日，在金水区花园路街道老年大学期末成果展示会上，舞蹈班、合唱班、功夫扇班等的老年学员各秀“绝活”，摄影班、书法班、美术班等的优秀作品同台展览。老人们看着自己的节目和作品，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是花园路街道办购买的“老年大学”项目，由恩夕社工中心承接运行。

花园路街道办副主任王静说，街道办和社区人手不够，专业化不强，对改善老人退休后的精神

文化生活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开始探索通过提供办公场地、启动资金等，物色社会组织为老年人服务。“社会组织发展壮大后，居民们也得到了更专业的服务，这是两全其美的事儿。”王静说，自己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社工机构力量不足难“接棒”

按要求，政府购买服务要由购买主体先申请。5月初，省民政厅将征集项目的通知下发到我省社会工作专业队伍建设工作联席会议的18家成员单位。最终，包括省民政厅在内仅有6家省直单位申报了项目，除老年服务、社区建设等项目，还有几家单位申报了工勤岗位。

“可能许多政府部门对社工服务还不了解。社工是指具有一定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能，在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扶贫济困、婚姻家庭等领域直接提供社会服务的专门人员，而不是工勤打杂人员。”负责此项工作的省民政厅人事教育处调研员党培红说。

购买社工服务，原则上要通过公开招标方式进行，但目前社工服务没有进入政府采购目录，也没有专家库。随着项目的申报，党培红在摸清我省专业社工机构情况后，更觉“尴尬”。购买社工服务，原则上要通过公开招标方式进行。但目前我省仅有不到30家专业社工机构，其中18家在郑州市金水区。而每个项目的招标至少需要三家机构进行竞标，这样的话，参与竞标的社工机构远远不够，只好采用申报的方式。

不仅如此，党培红还感到“缺钱”。这次6个单位申报了20多个项目，因为资金有限，经过专家筛选，省民政厅最后确定了14个政府购买项目。

从2008年就已开展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的广州市，投入购买社工服务财政资金累计已达7.7亿元，广州民办社工机构也得到快速发展，从2008年的不足10家发展到目前的160家，数量居全国第一。党培红介绍说：“政府购买服务在我省刚刚起步，还在探索阶段。政府买服务其实就是政府花钱请专业人士做公共服务，是国际上的普遍做法，这样不仅节约人力物力财力，还能让专业的人士提供更好的服务。”

“购买”之外还需“养育”

社会组织缺什么？身份认知给社会组织带来的是尴尬，资金困难才是致命的。华心社工机构负责人郝红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金水区通过政府购买岗位服务，每个岗位每年5万元，可除去给社工的工资，基本所剩无几，甚至为负数。“我们要先生存下来，才有可能服务。我们现在每次的活动经费甚至细化到几角几分。”她希望各级政府能多给些政策支持，社工机构能多承担一些项目，更快地发展壮大起来。

如果不是当初花园路街道办给予物力财力的支持，恩夕社工中心不会成长这么快，所以在王静看来，社工机构目前就像个营养不良的孩子，亟待各级政府“扶上马送一程”。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明锁表示，社会组织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直接承接者，因此，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才能提高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效益。我省社会组织力量较为薄弱，政府除了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外，还要有意识地加强对社会力量的培育。比如政府为其提供场地、启动资金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支持。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像广州、深圳、佛山、上海等地都专门成立了社会组织孵化基地，政府拿出专项资金，资助初创期的草根社会组织，为其提供场地设备、能力建设、信息共享、项目扶持等基本孵化服务。

令人振奋的是，我省也在积极行动。据悉，省民政厅正在筹备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基地，目前该基地正在审批中。

来源：河南日报

地址：http://newpaper.dahe.cn/hnrb/html/2014-08/06/content_1124297.htm?div=-1 [【返回目录】](#)

公益时报：宋代“杨六斤”们与检校制度

前不久，孤儿杨六斤获得百万善款捐赠的事件引起了极大关注，一些问题也随之而来：一个未成年人如何使用这笔巨额财产？谁有权帮助杨六斤规划这笔捐赠的使用？杨六斤未来的生活会不会因为这笔钱而产生转折？历史学家吴钩告诉《公益时报》记者，假如杨六斤生活在宋代，其实有一种制度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检校’是实行于宋代的一项孤儿财产保护制度，类似于现代社会的监护人加财产信托的制度。”吴钩说。

北宋前期：检校用于遗孤

其实官府检校遗孤财产的做法，汉、唐已有，“检校”之意是指查核、清点，中国古代各个时期，官府派遣官员处理各类须经查验、核实的事务时，就为“检校”，到了两宋时期，这种制度开始应用于儿童保护，各地官府检校遗孤财产的记载大量出现。

不管是官员还是平民的遗孤，不管是在都城还是在地方，宋代官府都有对遗孤财产进行检校的职责。此时的检校这一职责已比汉唐时期的内容更为明确细致：凡涉及到清查遗孤财产的“检校”，是指官府为亡故公民(包括官员和有财产的平民)的未成年子女即遗孤儿女，查核、籍记、保管财产，并逐时从保管的财产中定量向遗孤儿女发放生活费的行为。待遗孤儿女长大成人，官府将保管的财

产给还，检校行为即告终结。

例如，宋代最早的官府处理民间遗孤财产的记载是在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五月，对于民间一些母亲去世、由父亲和继母来抚养孩子的案例，明确规定：如果父亲死了，在继母改嫁之前，家中的财产应该全部归由父系子孙。如子孙年幼，官府要为这些孩子检校财产、负责保管，待其成人后给还。违反法令者，要受到刑法制裁。也就是说，继母不得动用和带走父亲留给孩子的财产。

开封府是北宋都城所在地，聚集着大批官员、士兵、行商、市井人户，人烟稠密，遗孤丧亲之事常有发生。因此，在这里建立专门的保管遗孤财产的检校库成为宋政府恤孤事业的重要任务。

宋神宗：检校放贷的恤孤制度形成

宋仁宗时期在开封府专门设立了保管与发放遗孤财产的检校库，除了保管遗孤财产，也开始保管民间法律纠纷之财、盗贼赃物、户绝财产、无主货物、人户存入等各类财产，这也标志着官府对遗孤群体的关爱与体恤开始进入制度化的发展时期。

“不过，这样的检校制度还存在另一个问题：检校库每个月都要定期给托管财产的孤儿发放生活费用，一个月一个月发下来，检校库代管的财产便会越来越少，如果孤儿的财产本来就不多，最后难免要坐吃山空。怎么办？”吴钩说。

于是，宋神宗年间，朝廷采纳了开封检校库的建议，允许设于各地的检校库将他们托管的财产作为本金，投资于抵押贷款，从而将原来沉淀在仓库里的资产盘活起来。先是规定1000缗(缗指古代穿铜钱用的绳子)以下的遗孤资产，允许民众入抵当请借，贷者必须押入抵当物才可借钱，岁输息二分。官府以贷者还本付息之息钱补贴遗孤儿童日常生活开支。长此以往，可有效解决遗孤财产不够支赡的问题。

吴钩说：“放贷所得的利息，则用来支付遗孤的生活费。这样，孤儿成年后，还能够从检校库领回属于他们的本金。这时候的检校库，已经相当接近于今日的信托投资基金了。”

检校库开展放贷业务后，开封府所在的中央各部门看到此法获利，于是陆续将本部门的经费存入检校库委托放贷生息。由于贷放本钱增加，用途又与遗孤财产有别，建立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就成为当务之急，于是就衍生出“抵当所”这一机构。可以说，遗孤财产的放贷收息业务已在宋代资金融通的经济活动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宋神宗元丰年间，遗孤财产放贷条例被加以修改，形成元丰令。改动主要在于，按季度给孩子亲戚或其他抚养人抚养费，将原来的不足1000缗的财产可放贷的规定提高为5000缗以下，并明确提出年收息额为本钱的20%。这样不仅大大拓宽了对外放贷的遗孤财产额的限制，使拥有5000缗以下财产的遗孤都可获得有保障的生活资金，而且促进了库存资金的利用和流动。

宋哲宗元符年间(1098年-1100年)和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在元丰令的基础上又陆续进行

了两次修订，内容体现了以下几方面的变化：第一，允许估卖不便保留的遗孤财产，估卖物品时必须要有本职之外的其他无牵连的官员覆验，以防主管官员疏忽渎职；第二，为保障遗孤财产不被耗失，借贷遗孤财产者必须有物力户为其作保，每年借贷的利息要于岁末以前交足；第三，管理检校与放贷业务的公人可以适量获取食钱，此举须纳入各路提举常平司严切把关监控之下。

南宋：由中央向地方转移

南宋以后，临安府是否仿照开封府设置检校库，目前没有查到相关记载。但是，临安府仍应保有检校本府遗孤财产与放贷的业务。由于临安府设有常平库，官府检校的遗孤财产也有可能保管在常平库中，各地官府检校遗孤财产并代为保管的现象仍然存在，《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较多此类记载：

“李介翁死而无子，仅有一女，曰良子，乃其婢郑三娘之所生也。官司昨与之立嗣，又与之检校，指拨良子应分之物产，令阿郑抚养之，以待其嫁，其钱、会、银器等，则官为寄留之，所以为抚孤幼计者悉矣。”

南宋时期，地方州县长期执行了对遗孤财产的检校业务。有的用遗孤钱财购买农田，以其收入充养育之费；有的将田产契约封寄县库，待其长大给还；有的见孺子可教，送入府学加以培养，官府为之管理产业。这些事例，都是南宋官员断案的记载。另外也有描述，当时宗亲族人侵吞遗孤财产的现象较为常见，故官府检校遗孤财产，不仅具有保护遗孤群体权益的作用，亦对净化社会风气，维护安定、和谐的社会局面具有积极的作用。

无法避免的贪腐欠债滋生

“宋朝政府之所以要设立检校制度，自然是为了防范孤儿的财产被抚养他们的族人、亲戚借故侵占。但政府机构也有可能侵占孤儿的财产。”吴钩说，为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宋政府曾试图订立一套比较完善的检校制度：

首先，宋朝的检校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凡符合检校条件者（亲人故去、只留下孤儿与财产），均须报官检校；但如果不符合检校条件而政府强加检校的，许人控告。其次，检校库如果挪用托管的财物，官员将被追究法律责任。再次，如果检校库托管的财物出现损坏或遗失，政府必须给予赔偿等等。

可以说，宋神宗之后的宋代君主们，对于检校信托制度所营造出的自我造血、抚恤遗孤过于理想化，遗孤财产借贷法虽屡经修订，却没有对舞弊的主体加以惩戒，渐渐产生了贪腐、欠债的大窟窿，也最终断送了这一制度的前景。

遗孤财产借贷中形成的恶意借贷的主体是形势户的借贷，其手段是虚指抵当或高估抵当物的价值，一旦请领到本钱，不仅亏欠利息，甚至亏欠本钱。官府催债时，常面临借贷者或远地做官，或

迁移他处，或销声匿迹，或赖账不还等各种问题。由于形势户是地方豪强，称霸乡里，官府对之无可奈何，致使遗孤长大，拿不到自己的财产而饥寒失所。政和元年四月特意修改法令，增加“须有物力户为保”，及“限岁钱”数足等条款，但是没有针对形势户制定惩戒条令。

另外，由于保管和贷放大量的钱物，负责检校遗孤财产的官员官职操守是否廉洁，就成为官府恤孤事业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北宋官至宰相的韩忠彦、曾布等人在其仕途早期都曾担任过开封府检校库监当官，这种经历对他们从政经验的积累和仕途的进取无疑是有裨益的。然而，宋代监当官吏借职务之便贪污、挪用检校财产的现象屡见不鲜。南宋以后，此类现象日益严重。这一点，在南宋各朝皇帝敕文和臣僚奏文中均有反映。

但总体上看，宋朝政府对遗孤财产的检校和放贷业务是积累恤孤慈幼事业经费的有益探索，也是适应宋代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有益探索。

（参考文献《论宋政府对遗孤财产的检校与放贷》）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html/renwuzishu/6834.html>

[【返回目录】](#)

公益时报：基金会传播现状堪忧？

近日，由《南方周末》发布的《2013—2014年度中国公益基金会舆情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中国共有3864家基金会，去年，被纸媒报道过的仅有10%，其中被媒体报道过25次以上的共有20家，另外90%的基金会未有纸媒曝光度。报告撰写人表示：这一比例若出现在其他行业是很难想象的，虽然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媒体的选择性，但同时也反映出绝大多数的基金会不善于或者不重视与媒体打交道，不善于利用媒体传播渠道。

那么事实上，为何大多数基金会不被媒体关注？各家基金会又是如何看待传播工作的？

“没消息就是好消息”

王近到企业基金会工作时，基金会刚成立半年，全职员工只有秘书长一个人，之前是公司工会主席。

“因为是企业基金会，所以基金会的工作都是公司员工兼着干，刚成立的时候也没什么项目，组织员工给云贵的小学生送温暖，我就负责拍照。”王近是应届毕业生，入职后没有被马上任命职务，从云南回来，她把照片配上文字做了一期简报发给秘书长，抄送了公司传讯部，没想到被公司老板

一眼相中，直接让她做基金会“传播与策划部副部长”。

“可能觉得我太小，直接当部长不合适吧，但其实就没部长。”签订岗位责任书时，秘书长告诉她，虽然叫传播与策划部，但以传播为主，并且以对内传播为主。“我们老板是政协委员，信佛，本来是拿了几百万想捐庙，后来没捐，就拿这笔钱注册了基金会。他不是那种特别高调的人，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不想靠基金会提高什么曝光度，我感觉他做公益更想影响身边的人，尤其是公司员工。所以我们特别重视内宣。”

在王近看来，所谓的媒体曝光度是把双刃剑。“尤其非公募基金会，不需要向公众筹款，太活跃的话反而容易被挑毛病，做地产的企业更是，你捐得越多人家越说你暴利。”

王近说基金会就“吃过一次这样的亏”。2012年上半年，有家中医院找到秘书长，想向基金会捐赠一批中成药，通过基金会搭桥与企业联系，到企业开发的小区里组织“中医进社区”的活动，为小区居民义诊、赠药。

“当时找了几家媒体，就一两家发了稿，根本就没什么传播。但后来这家中医院的一种药出了点问题，就有人在论坛里发帖，和我们的活动联系起来，说有问题的药都捐给基金会了，骂公司，抵制不要买公司的房，但其实一点关系没有。”王近庆幸那时微博的发展不够强大，“否则很容易像红会一样。”

从此以后，基金会中止了对外传播的工作，有项目需要宣传就对接给公司传讯部。“秘书长给我们总结基金会没消息就是好消息，13年就没什么报道，我们就是那90%里的。”

2014年6月，王近入职三年多后，终于由副部长升级成了部长，手底下还是没有兵，但工资涨了一级。日常工作是更新微信、做简报、设计各种印刷品折页、年底做年报、两会前给公司老板准备提案……“基金会没微博，没网站，微信的订阅几乎都是公司员工，会发基金会项目进展，也有公司志愿者投稿，偶尔也发一些国学大师的人生感悟。”王近说。

多年没和媒体打交道

一进入6月，胡晏辉就开始联系八九年前熟悉的记者朋友们，却发现大多数都转行做了别的，能帮到自己的实在太少。

身为长江科技扶贫基金会的秘书长，联系媒体的工作她大可不必亲力亲为，但因为机构已经太多年没做过对外宣传，所以连个专职的媒体官员都没有。6月下旬，机构将联合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发起名为“拇指公益”的公募项目，通过在互联网平台上传播公益人物的事迹，来为草根公益人筹款。

“既然是公募项目，就得有公众知晓度，靠我们机构网站的点击量肯定不够，所以想联系一些媒体。”胡晏辉坦言机构几年来的捐赠来源都非常稳定，主要靠理事长的一些关系，维持在每年几千

万的筹资水平上。“捐赠人和理事会都没有宣传诉求，员工主要参与项目执行，很多年没和媒体打过交道。”

胡晏辉十年前就职于一家有着官方背景的公募基金会，体制内注重形式，她常联系记者们到政协礼堂等地参加发布会。“记者的电话还是那时候的。”

作为一家非公募基金会，“拇指公益”是长江科技扶贫基金会决定转型后的一次公募尝试。“虽然过去善款的来源一直很稳定，但我们也有危机感。随着公众信任危机、经济危机、还有基金会注册成立的一步步开放，基金会之间的竞争会越来越强，筹资也会越来越难。所以我们必须得转型。”

转型是个长期的过程，而当下让胡晏辉苦恼的除了新项目上线亟需被关注外，还有另一个捐赠人也委婉地提出了宣传诉求。胡想尝试着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与媒体建立联系，但也做好了“万一沟通效果不理想，可能会寻求第三方帮助”的准备。

“心创益传播机构”很可能就是胡要找的第三方。两年前，几个从某4A公司跳槽的员工瞄准了公益行业的商机，成立了这家专门为非营利组织和社会企业提供品牌管理及营销传播服务的机构。两年后，这家不十人的小机构，客户已经涵盖包括南都公益基金会、阳光文化基金、陈一心家族基金会等在内的十几家公益机构。

“针对传播这一块，基金会分为几种：一种是本身有专业的团队，传播工作做得很好，这一部分基金会的数量极少；一种是有传播的诉求，但不知道怎么做；还有一种是自认为没有传播需求。”心创益的发起人武萍介绍，目前心创益的主要客户属于第二种，有诉求但不知道该怎么做的。而在她看来第一种和第三种也都是机构的潜在客户：可口可乐、佳能这些是不是大公司？公司内部也有很强的传播团队，那为什么还要和广告公司合作？因为广告公司更专业，能更精准、更便捷地达成公司目标。

“而自认为没有传播需求的主要是非公募基金会，它们在90%里占了很大一部分。压根儿不作为的不讲，只要基金会想发展，就迟早会发现传播的作用，因为行业在不断发展，竞争在不断形成，只闷头做事情是行不通的。”武萍说。

各有各招

被媒体忽略的基金会各有各因，被媒体关注的基金会也各有各招。

2014年8月3日16时30分，云南鲁甸县发生地震。两个半小时后，姚遥在微信朋友圈发：壹基金第一批救灾物资已经清点完毕，正在昆明备灾仓库装车，连夜起运。作为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公众参与中心副总监，他已经习惯了第一时间把机构动态分享到自己的各种社交平台：包括办公会、项目进展，甚至理事长的新名片。

《报告》显示：被中文电子报报道超过百次的公益基金会共有5家：安利公益基金会、深圳市

关爱行动公益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澳门日报读者公益基金会、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其中，壹基金是“公众最熟知的基金会”，超过了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众多老牌基金会。“我们工作做得好呗。”姚遥的玩笑背后是壹基金针对传播的特殊机构设置：取消了传统的传播部，成立公众参与中心。

“中心有员工7人，做三部分的工作：一块是针对机构正在做的项目，比如救灾，记录并提炼出来，整理成新闻稿、图片、视频等向媒体推送；第二块是在微信、微博、官网等公开渠道上，向公众传递机构信息，公众喜欢什么渠道，我们就在什么渠道上开设窗口；还有一部分是服务于公众参与的线下工作，鼓励大家多参加公益活动，比如蓝色行动、为爱奔跑等等。”在姚遥看来，传统的传播工作很难达成基金会使命，带动公众参与和引起媒体关注不可分割。

而作为曝光度最高的安利公益基金会，其经验总结下来是：用公益项目赢得媒体关注；以透明姿态与媒体沟通；针对不同的传播平台提供不同的传播内容。

“以春苗营养计划为例，项目契合了媒体对于儿童营养改善的关注，而且项目本身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是媒体愿意关注的前提。并且在项目执行中，无论是厨房的建设和开餐，还是基金会志愿者在各地的督导、评估成果的发布，基金会都会主动邀请媒体参与。”安利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彭翔解释。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html/yaowen/6821.html>

[【返回目录】](#)

公益时报：企业社工的东莞之路

2013年，企业社工试点在全国展开，东莞是全国入选民政部首批企业社会工作试点地区的唯一地级市，东莞市共有9个社工服务机构成为首批试点单位。而早在2011年，东莞市已经出台购买企业社工的相关文件，并开展试点。东莞的企业社工发展模式以及遇到的问题，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7月26日，在民政部企业社会工作试点开展一年之际，东莞举办企业社工实务研讨会，发布东莞市企业社会工作发展情况报告，共同探讨企业社会工作的现状及发展方向、服务模式和方法，建立交流平台。

东莞市民政局调研员郑锦堂介绍，市镇两级财政已向社会组织购买工会和企业社工32名，还购买了超过20个新莞人社工岗位，为在莞异地务工人员家庭及子女提供专业服务。多样化的服务使企

业员工的业余生活得以丰富，情绪压力得以舒缓，精神面貌得以改善，极大地满足了企业员工不同层次的需求，受到企业和员工的肯定和赞扬。

纳入工会系统

东莞企业社会工作肇始于民间自主运作。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东宏实业有限公司和东莞裕元集团就开始自主招聘专业社工为职工提供心理关怀和文娱活动。但大部分企业对于是否有必要购买社工服务普遍采取观望态度，行动迟缓。

2011年3月，东莞市正式出台了购买企业社工服务的相关文件，分别向东莞市正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东莞市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前称星扬）和东莞市乐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三家社工机构购买企业社工16名，派驻到五家企业，由此，由政府独立出资购买的企业社会工作试点服务正式开始。

试点伊始，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免费服务于企业尚遭到有些企业拒绝，一年后部分企业主动出资购买社会工作服务。2012年3月，东莞龙昌实业、徐福记和立亚达三家企业分别通过1:1的方式购买企业社会工作服务。2012年8月，清远市迪米格企业慕名向正阳社工服务中心购买企业社工2名。东莞市企业社工工作开始由原来的政府独立购买向政府、企业1:1购买过渡。

与此同时，为统筹规划企业社会工作服务，东莞市将企业社会工作纳入工会系统管理，由市总工会全面统筹企业社会工作的整体事务，打造并依托“先锋号职工服务中心”，有效地提高了企业社会工作服务管理的针对性，减少了企业社会工作服务的行政成本。

三种模式

企业社工的主要开展模式是企业内置。社工被派驻到单个的企业，在企业内部为企业的职工提供专业社工服务，与企业内的人力资源部、行政部或者是企业工会合作。

企业内置模式的优势，是社工与员工同食同宿，能够真正了解员工的需求，为员工和企业服务。但另一方面，社工的服务受企业管理层（特别是决策者）态度的影响比较大，管理层是否认同社工的理念，直接影响社工服务的开展和效果，目前，选择社工服务的企业一般是注重企业文化建设的大型企业，并以港资、台资或外企居多。

不同的企业环境，所倾向的社工服务也有较大差异。例如有的企业关注职工家属，因而社工较多在生活区为职工家属提供关怀和亲子类活动；有的企业注重新员工的适应，强调职工稳定性，因而社工在工作中需要为新员工的服务投入更多。

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居多的东莞，另一种重要模式是工业园区内置模式。将社工派驻到某个工业园区，借助工会的“先锋号”职工服务中心实体平台，为工业园区内的企业、员工及居民提供服务。目前，东莞的莞城科技园、新科、万江新和工业园区已经在园区引入企业社工服务。

工业园区内置模式的关键词是“服务合作”，更注重与市、街道相关职工服务类社会组织的联系

和合作，强调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员工间的联动与参与，充分发挥各合作方的资源和专业优势，整合工会资源形成具体的服务功能及其工作内容和要求，以直接、快捷、方便的方式，为职工提供多元服务，实现工会组织、工会社工和志愿者的协同工作。

这种模式下，服务对象更加多元，包括园区内的企业员工，也包括居住在园区内的员工及其家属，还有园区内的社会组织。针对多元的服务对象，社工提供的服务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涉及到员工心理、家庭、就业指导帮扶、学习培训、娱乐休闲等多个方面。

还有一种就是工会内置模式，将社工派驻于市总工会或镇总工会，利用工会的12351职工服务热线、工会社工站、康复医院等平台，为企业员工尤其是困难职工提供专业社工服务工作。目前，社工已经进入东莞市总工会社工站、法律援助热线办公室、石排镇总工会、茶山镇总工会、塘厦镇总工会、樟木头镇总工会、虎门康复医院、桥头康复医院等八个站点，进行工伤关怀、工会组建及政策宣传等服务。

成效与困境

经过三年的不断摸索，在东莞，企业社会工作的认知度和接纳度不断提升。在企业社工进驻之初，绝大部分员工及家属对突然出现的社工充满好奇与不解。部分服务对象以为社会工作者是政府工作人员，或者以为社工是“玩游戏”的。企业则更多顾虑社工是政府派至企业监督其发展的“特派员”。但随着企业社会工作服务的开展和深入，企业社工逐渐为企业、员工及其家属所认识和接纳。越来越多的企业员工及家属在情绪、精神、健康存在困扰时主动向社工咨询，也会将其身边受生活困扰的朋友向社工转介。

企业方面则开始接纳并在人财务方面支持社会工作在企业的发展，更有部分企业主动购买企业社会工作服务岗位或者项目，如2012年东莞徐福记食品有限公司、东莞立亚达电子有限公司、东莞龙昌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均自主购买企业社会工作岗位，陆逊梯卡华宏(东莞)眼镜有限公司总部则出资万元支持企业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而目前，企业社工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社工价值观与企业理念的冲突。2014年世界社工联合会重新定义了社会工作概念。社会工作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职业，是促进社会改变和发展、提高社会凝聚力、赋权并解放人数的一门学科。社会工作的核心准则是追求社会正义、人权、集体责任和尊重多样性。而企业则以盈利为目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社工服务为员工争取最大的福祉看上去会影响企业盈利情况，企业社工与企业之间似乎存在天然的冲突。加之“有形成本”与“无形产出”之间的困局，企业购买社会工作服，付出的是真金白银，看得见，摸得着，而社工的服务很难在短时间内立竿见影。因此，需要寻找到企业社会工作与企业间的利益结合点，把做好员工关怀与服务与企业生产统一起来，让企业懂得看似花钱的员工服务做好了，能够产生足够大的溢出效益。

社工的介入也可能让企业中的人力、行政、工会等联系比较紧密的部门觉得是来“抢饭碗”的，故而出现种种不配合。因此，社工介入前必须了解不同企业、不同部门的文化和分工，注重处理及调节与其他部门的关系，找到社会工作服务与企业对员工一般服务的区分点与结合点，巧妙地融入企业。

多头管理导致服务不顺畅

行政上，企业社工则面临着多头管理与社工工作交代的冲突。社工在工业园区内开展服务是相对自由，但当社工面临工会、社工机构、工业园区、镇街等多个相关主管部门的管理时，就容易造成混乱。目前东莞市工业园区内企业社工的直辖管理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社工需要同时向多个部门进行工作交代，甚至出现不同部门对同一事件的不同的回应或指示。开展一个服务，要向所在企业以及多个有关部门和单位申请和报告，程序繁琐复杂且处理反馈时间较长。这种多头管理的现象并不利于社工服务的开展和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

针对这些问题，除了完善政策支持，增大购买力度，更重要的还有理顺工作机制，优化服务格局。如何理顺市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市民政局)，市总工会、服务企业、机构，社工、服务对象等之间的关系，形成良好的工作机制与工作格局，对于企业社会工作能否提供有效高质的服务至关重要。

个案

企业说：社工是企业 and 员工间的桥梁

东莞龙昌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1964 年在香港创立，在东莞市以生产遥控电子塑胶玩具及数码电子玩具为主，厂区有 3000 多名员工。龙昌数码的管理人员胡迎春介绍了他对企业社工的看法。

2011 年 5 月 3 日，东莞市正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社工正式进驻公司，成立龙昌社工站。目前龙昌社工站的两名企业社工，1 名由政府购买，1 名由企业购买。龙昌也是东莞市最早自行购买社工服务的企业。

持续四年的社工服务，让员工从抗拒到逐渐接纳。自社工进驻企业后，起到了一些正面的、微妙的作用。胡迎春说：“80 后、90 后员工背井离乡来到东莞，在情绪上需要舒缓。”社工主动走进生产车间和员工平常生活中，跟员工打成一片。方式也很多，比如在中午吃饭的时候，社工会通过龙昌广播站播放一些生活小故事与心灵鸡汤。

胡迎春更看重社工的第三方角色：“厂里有工会、互助会，但它们还是从工厂角度出发，而社工则是第三方身份，这种身份会让员工更加信任，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润滑了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比如，员工会主动向社工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社工也会搜集员工的合理意见反馈给企业，以便企业更好了解员工的想法，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提高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与归属感。

有时候工厂管理者认为某位员工工作态度散漫，请他去谈话，但双方都觉得自己有理。后来管理者与社工一起去跟员工谈，社工能做出客观、中肯的分析，对员工、企业都有好处，这样问题处理起来就会快很多。社工还开展了许多康娱类的活动，让员工下班后可以参加，丰富了他们的工余生活。

胡迎春说，在购买企业社工的四年时间里，与其说员工是最大的受益者，不如说企业是最大的受益者。社工服务的引进，在彰显企业文化、企业社会责任感方面，起到了巨大的助力作用。“我们会继续做社工的同行者，向更多的企业同仁宣传社工服务。”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html/yaowen/6820.html>

[【返回目录】](#)

【鸿芷】阿里公益基金会 Q&A 四部曲（四） 互联网的本质就是帮助社会做公益的事情

问：各位好，我叫王嘉，来自海航的社会责任部。听了刚才大家分享，确实学到很多，有几个问题想跟大家探讨一下。

首先我们做公益慈善做了很多年，但是从社会责任角度来做分析也是最近两三个月的事情。我想知道你们怎么看待社会公益和企业社会责任，因为从我自己了解到的一些消息来看，国内其实这块划分是非常模糊的。

包括央企在内的很多企业，他怎么看待社会慈善、怎么看待公益慈善都没有清晰的界定，但是看欧美成熟的资本市场，对社会责任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上市公司如果不能完成社会责任数据报告，可能经营层面就要受到影响，这是我想了解的第一点

第二个问题，在公益领域的话，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会如同阿里巴巴的业务一样，成为行业的变革者吗？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会给中国的公益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第三个问题是政府职能划分后民间组织有了一定的发展机会，另外就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对于这样一个时代，阿里怎么样做未来的规划？五年十年后，可能大量 NGO 组织起来，你们怎么抓住这个机会？从一个企业的角度来说，肯定要实现自身盈利的，可能公益只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角

色而已。

闻佳：高大上的问题，我尝试回答一下，不一定对，完全是我自己的想法。你第一个问题问公益慈善和社会责任到底对我来讲区别在哪儿。从我的角度来看，很多企业做慈善，捐很多的钱，他就认为自己在做公益、做慈善，我认为真正的社会责任不是这个，是你今天真正解决了什么样的社会问题。你今天做的事情到底是为了名还是真正为了这个社会，我觉得这是真正本质上的区别。

而今天的阿里巴巴，马总给的目标，只是说今天我们要帮社会解决水和环境的问题，至于水和环境的问题解决了之后，是不是给阿里巴巴带来名还是带来很多骂声，我们不关注。

第二个问题你说我们用互联网思维给公益带来什么。其实我想今天阿里巴巴天生就有这个优势，不记得最早谁跟我们说，我们今天的商业模式是天生的好人做好事。互联网的本质就是在帮助这个社会做公益的事情。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阿里巴巴平台上的很多网店，这些网店都自愿把他们的收入的一部分捐给公益。其实我们内生的商业逻辑里面，天生就有做公益的基因，就是可以做这个事情。

同时我们在自己做的同时把这个平台开放给大家，通过今天阿里巴巴所有的特长，不管技术还是平台，去帮助所有的 NGO 成长，能够让更多的人加入。我们希望自己带动我们的客户做，客户再带动他们的客户做，这才是阿里巴巴要做的事情。

互联网是特别好的平台，开放、透明、分享、责任，这是互联网最核心的原则。而这也是我们 NGO 做事情必须要具有的条件。

马总经常说我们要用公益的思想、商业的手法去做事情。今天来看，你认为他是一个 NGO，他是一个商业企业，而我觉得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的时候，我们分不出来谁是 NGO，谁是商业企业，因为我们自身的商业模式就跟整个社会责任挂在一起，我们自身的商业模式从设置的第一天就把公益理念放在里面。我们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为这个社会来解决问题。

然后第三个，你说阿里巴巴怎么抓住这个机会，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在这个巨大的环保市场里抓住这个机会，未来 NGO 那么多，我们能够干什么？我们现在想做的一件事情其实跟所有商业产品逻辑一样，是要帮助别人成功。

不是说你赚 100 块，我希望 100 块都给我。我是希望你赚 1 万块然后你给我 5 块钱，互联网就是靠这种方式做起来的。

我们今天在做的所有公益事情，不是看未来在里面有什么机会，而是希望今天能够帮助行业发展。

来源：鸿芷微信平台

地址：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YxNTI0MQ==&mid=200297374&idx=1&sn=1b391bf20c440eed22e46cd1a2d1867a&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rd [【返回目录】](#)

【资助者说】第15回：理想中的资助者应具备的“资助者心态”

作者：赵中 草根 NGO 甘肃绿驼铃发起人，现任太平洋环境组织 (PE) 中国项目协调人、全球环境基金 (GEF) NGO 网络东北亚协调人、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 (GGF) 中国顾问

2012年9月，在草根 NGO 工作了8年后，我加入了一家国际 NGO，负责其在中国对环保 NGO 的资助和能力建设。随着职责和角色的转变，离泥土和实务项目距离远了一些。但从“媳妇熬成婆”的那一刻起，我也能真切体验到“资助者”——这一“公益圈”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生态位”，开始考虑应该成为怎样的资助者。

我不赞同“屁股决定脑袋”之说，因为只有“脑袋”能决定“屁股”坐哪，更能决定将以怎样的方法和态度对待“屁股”所处的位置。

和大多数草根 NGO 组织一样，在发展过程中我遇见过许多对草根组织提供资金、能力和信息等全方面关怀和支持，至今仍然是良师益友的资助者；也难免都有一段受到资助方各种压迫和不平等对待的“血泪史”。积极正面的资助者在此就不多说了，NGO 的年报和各种文章能读出很多真挚的感谢。负面的，也就是 NGO 在资助方那些年受到的那些委屈，很少有草根 NGO 公开的讲出来（此文中的许多观点，我也是熬、忍、憋到现在才敢说的）。环保 NGO 领域我只记得自然大学的冯永锋校长和云南生态网的陈永松老师对基金会的公开批评，他们两位都我所敬佩的人。

大家很少说“坏话”的原因估摸包括：1) 大多 NGOer 都是好人，好人的包容和承受能力都很强，要在“忍辱负重”中前行；2) 东方的文化中凡事要给对方一些面子；3) NGO 的资源仍然是卖方市场，供不应求，草根 NGO 还没有能力可以洒脱的对资助方说“NO”，要维护好关系；4) 以大局为重，为了公益行业的整体形象还是忍了，毕竟资助方还是真金白银的出了“干货”，比起那些“为富不仁”的企业和个人已经超越了许多；5) 找不到对资助方的投诉渠道（我曾有一次偶然的见到国内某著名基金会的高层管理人员，便抱怨了和其合作中受到的“伤害”，高级管理很诧异这些负面信息，说“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6) NGO 都很忙，不停的“筹款——做项目——写报告”循环往复，没时间去批评。

许多资助方都会提到“资助过程是一个资助者和被资助者相互共同学习和成长的过程”。除了“吐

槽”和抱怨，我列出了理想中资助者应具备的“资助者心态”，希望分享给大家一起探讨。

“平等”的心态

哪怕是最强势企业家或退休官员成立的基金会，也不会霸气的直接说“老子出的钱就该听老子的”。所有的资助者都会说“我是为被资助者服务的”，但问题不在于你怎么去表述，而在于你真正的心态、理念和实际的行为。

作为资源的掌控者，资助者是否能平等的去对待 NGO，是否能平等的同他们沟通对话，是否能平等的同他们合作，尤其是解决分歧的过程中。大多数资助者都会不承认自己有过“不平等”地对待，那么我们是否抱怨过被资助者能力不足，觉得他们“笨”？我们是不是厌烦于多次催缴报告，抱怨他们效率低、有拖延症？我们是不是曾经威胁过“你再这样以后不资助你了啊”？我们有没有向被资助者妥协，是不是坚定的认为，“我比你懂得多，你应该按我说的去做”？

我们都明白社会和环境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靠当地的机构和当地人，那么资助者更应该以平等的心态与当地机构和当地人来一起努力。“平等”不只体现在言语，更在于尊重并学习被资助者的经验、知识、文化、传统和习俗；在于懂得换位思考，避免以资助方和个人的判断标准来评价对错好坏；在于真诚的沟通，对被资助者发自内心的认可、赏识和鼓励。

“理解”的心态

我的益友小军有段分享：“我以前经常批评草根组织的不足，但当我自己开始做一家草根组织（雨田），理解到草根组织的艰辛和不易，便不再批评”。小军现在也是一位资助者。在此不是要求每一位资助者一定要有“草根”的经历和背景，但资助者，尤其是对草根 NGO 提供资助的，至少应有一份对“草根”组织的理解。

从外部看，大部分 NGO 都是崇高而光鲜的，为了一份公益的使命，为了个人的理想，奉献服务于社会、环境和人民。但从内部看，却多了一些“不是那么理想的理想”和“不是那么美好的美好”。如果用以下问题来批评草根 NGO，估计没能免于“躺枪”的。

某组织只有热情，没有战略规划，没有长期目标，没有核心竞争力……

某组织就是那么些人在自娱自乐，不从需求出发，不从问题出发……

某组织的负责人个人英雄主义太浓，组织就等于他/她一个人，没有人才培养也留不住人才，没有可持续性……

某组织的工作人员能力太差，项目书乱七八糟，一点逻辑都没有……

某组织连一个专业财务人员都没有，账目十分混乱……

某组织的项目都是模仿其他组织的，一点创新力都没有……

某组织从企业拿了一大笔钱，帮企业卖产品去了，变味了，变味了……

某组织获得了政府购买服务，还能不能独立的监督政府，看来要被“招安”了……

某组织什么都做，什么项目都申请，没有专注，没有聚焦……

某组织都是一群年轻人，太不稳定，是否能持续下去，还要再观察观察……

某组织的成员都是从企业出来的，动机是否单纯，还要再观察观察……

某组织成立了十年还是这个样子，能否成功转型，还要再观察观察……

如果以上言论仅仅是 NGO 工作人员互相发个牢骚或对问题纯技术层面的切磋也无可厚非，但当这些话在当事机构不在的情况下从一个资助者嘴里说出，用以证明自己的工作多么重要多么辛苦，就显然格外的刺耳。如果被资助者都没有这些问题了，要资助方的这些工作人员有什么用？

不得不说，在 NGO 仍非主流化的今天，一些刚毕业的学生或者有企业、政府背景的资助方代表似乎无法理解：有些时候，草根 NGO 不是能力差，而是工作压力大，太多的事情都做不完，哪有时间去学习国外的先进理论；有些时候，NGO 人员流动性大，那是因为许多资助方不支持或限制 NGO 人员工资，NGO 有限的资源无法支撑员工作为个人的长远发展而不得不忍痛将其“推出家门”；有些时候，NGO 项目的拖延是因为 NGO 承担着更多项目书以外的职责，NGO 将其视为使命和社会责任的一部分，而无法拒绝；有些时候，NGO 不是不要专业化、规范化，而是因为草根组织的初衷仅仅是所关注社会问题的解决，他们不懂管理、不擅于管理，更请不起职业经理人。

如果资助者理解了，那么相信工作中批评和指责会少一些，赏识和鼓励会多一些。想起我曾参与执行过的一个世行赠款项目。由于当时项目设计经验的不足，也由于为了提高竞标成功率尽可能的增加项目内容，原来计划一年期的项目用了三年才基本完成。三年间我们两次向资助方申请项目延期，所幸都得到了批准和理解。项目完成后，我们才可以拍着胸脯说，这个项目我们是踏踏实实做完的，这个项目中每一笔财务都是真实的。试想如果这个项目执行中的问题当时没有得到资助方的理解，那么我们要面临的选择是：要不承认项目失败，项目中止，退回资助；要不编造项目报告和财务将资助方“糊弄”过去。

“信任”的心态

和朋友们讨论国内外基金会的区别，其中之一便是：国际基金会资助的基础是“信任”，国内基金会资助的基础是“论证以取得信任”。

个人感受，国内一些基金会总是带着怀疑态度对待 NGO 组织，资助前要求 NGO 证明工作人员的能力，证明项目运作的经验，证明财务的规范，证明当地的资源和社会关系网络等。这还不够，还要签“承诺书”，立“投名状”。资助给出去了，还是不放心。一些资助者，会把“手伸得很长”。

“手不要伸得很长”并不是“不要伸手”，到底“伸多长”才是对被资助者适度合理的帮助和引导，“伸多长”会质变成资助者的“控制”和“干预”，这就是一个“度”的把握问题。“度”把握的

好坏则是取决于资助者对被资助者是否有信任，也取决于资助方代表的个人理念和职业素养。

资助方要信任合作伙伴，也要珍惜自身的声誉，获得伙伴的信任和认可。有些资助方似乎有些苦闷，钱没少花，工作没少做，却换不回一个好口碑。2013年底的“百家NGO眼中的基金会”排名让一些“不差钱”的资助方非常尴尬。人与人、机构与机构、国与国之间的相处都是一样的，给予真诚便能收获真诚，给予尊重便能收获尊重，给予信任便能收获信任。若只是给钱，以上的不一定有，只能收获发票、收据、项目书和报告。

分享一段作为被资助者的“血泪史”吧。2010年，绿驼铃申请国内某基金会一个两年16万元的机构发展资助，获得了批准，基金会网站上也进行了公示。继而，我们提交了详细的工作计划，但是基金会项目人员觉得我们的计划和她想要的不一样，我却坚持着“不妥协”原则。其实我个人经常没什么原则，但在代表草根组织时原则是一直有的。于是该资助就一直拖着，一直拖到2011年初，基金会以预算花完为由电话通知资助取消。敝组织虽小，穷骨头，还是有那么两根的，好在至今还没蜕变成“贱骨头”。本着不哭、不闹、不卑、不亢的原则，我代表组织平静的要求基金会将我们的名单从其网站资助公示信息中删除，然后转头对机构成员说：“在此基金会做出正式解释和道歉之前，我们不要再和他们有任何合作”。

坚持原则，撑起两根穷骨头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一些草根组织希望在带来社会和环境改变的同时，也推动着资助方一起共同成长和进步，即使路会很长。希望资助者信任合作方的同时，也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合作方的信任和尊敬。

“包容”的心态

公益圈（读二声）就是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纠纷，就有帮派。一些能力建设项目把江湖中的人组织到一起，让大家唱啊、跳啊、哭啊、笑啊，然后告诉大家“你们是一家人，你们要团结，你们要合作，你们要一起努力”。学员们挽着手，含着泪光，点头赞同……

出了戏，江湖依旧……

资助方的江湖也会因为背景、关注、兴趣、理念和使命的不同，对问题有不同的理解，对资助有不同的策略和方向。

和而不同，有共同愿景的小伙伴们一起继续愉快的玩耍，对其他的小伙伴们仍以欣赏的眼光、谦虚的态度去学习和了解，这便是包容。

对于资助者而言，即使对一些个人、组织不太熟悉，或是对他们的工作方式不太认同，甚至觉得他们不够可爱、不招人喜欢，但资助方代表仍能从基金会策略和社会价值角度公正的评审资助项目，这便是包容。

一些组织最痛苦的事之一是资助方代表的变更，一旦遇上了那种有野心但没实践经验的，则是

痛苦中的痛苦，多数情况只好顺着新任资助方代表的意向对项目进行紧急的临时调整。资助方代表如果能抛弃个人喜爱和成就感等因素，能虚心接纳前任的基础和经验，能保证资助方向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这便是包容。

总之，一个资助者的能力有大有小，对社会的贡献有多有少，但只要有了平等的心态、理解的心态、信任的心态、包容的心态，就是一个高尚的资助者，一个纯粹的资助者，一个有道德的资助者，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资助者，一个有益于社会和环境的资助者。

来源：社会资源研究所

地址：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jY0ODM3NQ==&mid=200576222&idx=1&sn=d7045d3363cd81cfbb8b1cffe40d712d&scene=1&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rd [【返回目录】](#)

【DMEL 每周一问】第 42 问：美国基金会怎么做评估？

本文为 2009 年发布的《慈善领域的评估 (Evaluation in Philanthropy)》一文的摘译。作者 GEO (Grantmakers for Effective Organizations) 是一家美国的支持性组织，它推动资助者聚在一起，进行务实的讨论，并获得能够将知识转化为行动的资源 and 网络关系。目前拥有 450 多个会员。

我们观察到普遍存在一种误解，即当说到“设计-监测-评估-学习 (DMEL)”时，很多人都认为这仅针对于 NGO，而基金会则更多作为项目设计的“审批者”、监测报告的“收件人”、终期评估的“甲方”出现。然而，我们认为“DMEL 之环”对于基金会来说，既是完全适用的，也是同等重要的。今天就通过带大家了解美国基金会对于评估的看法和最新实践，来感受一下 DMEL 之于基金会的意义和价值。

在美国，将评估作为一种学习和改进的工具，也属新鲜事物。2008 年 GEO 的调查显示，很多基金会仍以问责作为开展评估的主要目的，并将评估结果仅为自己所用，而不是将他们所学到的分享给被资助机构乃至其他基金会。

然而，在对近年来有关慈善领域评估和学习的研究进行文献回顾后，GEO 发现一些领先的基金会已经重新界定了评估在慈善领域的作用，并主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开展了新的实践：

1、**评估关乎提高改进，而不仅仅是提供证据。**评估不仅仅是对已资助项目的结果追踪，还能学习如何更好地达成目标。有很多种将评估和改进联系在一起的方式，例如一些基金会将评估和学习

作为调整资助战略的基础；另一些基金会则投入于“实时监测”，以便在项目执行时就能及时调整修正。

案例：不仅仅是聚焦于成果评估，Retire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还鼓励申请者或被资助机构使用学习工具来生产知识，以帮助其他人修改现有项目或设计新项目。

2、评估关乎如何贡献于社会影响，而非归因。评估经常被用于进行明确的成败判断。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基金会和被资助机构不一定能进行这种类型的判断。此外，一些资助额度太小，而无法将被资助机构取得的成就直接归功于自身的资助。由于基金会面对的往往是复杂的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评估可以成为一种学习方式，用以了解一系列可能影响目标达成的因素，和考察某种特定的干预活动可能会、或可能不会产生影响。

案例：William Penn Foundation 以影响一个项目规模化、或在其他环境复制的关键因素，来评估其试点项目和示范项目。

3、评估关乎与他人一起学习，而非独善其身。评估不仅是衡量以及提升基金会自身的表现，它还是学习如何帮助关注于同一社会问题的各类实践者共同改进。这意味着基金会应该与被资助机构一起制定评估方案，以帮助他们从正在进行的工作中有所学习。通过采用“参与式评估”与建立“学习社区”，基金会能够确保评估满足所有利益相关方的需求。

案例：The Global Fund for Children 请被资助机构使用一种自我评估工具来衡量其在八个重要方面的能力，以此来了解基金会在下一个资助周期可能的工作重点。

4、不仅仅是评估单个项目。当基金会想到评估，他们往往指评估单个资助项目。他们想要某一个被资助机构或特定的一组被资助机构是否达成预期目标的信息。这些信息固然有用，但它很难呈现出基金会作为一个整体的表现。基金会一系列投资组合的整体回报是什么？基金会如何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使命？组织层面的评估给基金会带来很多挑战，但这对于澄清基金会自身的使命和目标，改善和提升其战略和运营有很大帮助。

案例：Stupski Foundation 最近完成了对过去所有资助的评估工作，包括大量研究、深度反思以及向 100 多位教育和其他领域领导人的咨询等。作为评估的结果，基金会改变了它的资助策略和方式。

5、评估关乎拥抱失败。慈善事业为 NGO 解决社会问题提供研发资金。然而，无论基金会和被资助机构多么仔细地审查，也不能保证每个方案都能成功。通过评估，基金会可以将一次“失败的资助”转化为很好的学习机会，研究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没能达到预期目标，基金会和被资助机构如何才能在未来取得更好的成果。

案例：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 一个 2000 万美元的资助项目未达预期目标，

基金会委托两名独立研究者批判性地考察项目的假设和方法，以及从中获得的经验教训，并将报告公开发表。

最后，GEO 建议基金会：

以文中观点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目前的评估工作。

召开理事会和员工讨论会，探讨如何加强评估工作以推进基金会、被资助机构、其他基金会的学习实践。

将评估和资助战略联系在一起，通过运用进行中工作的数据和信息来检验和调整战略。

询问被资助机构对于如何将评估作为学习实践的看法。

在基金会之间探讨有关评估和学习的看法和面临的挑战。

尽管中国的公益事业和公益评估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所幸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无须全靠自行摸索走遍所有弯路，关注领先者的发展趋势，思考为何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转变，并在现实环境中努力创造条件去尝试，当是我们应做的事。

来源：社会资源研究所

地址：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jY0ODM3NQ==&mid=200578606&idx=1&sn=6289cecdcf96d22b06a2e079f5d32a&scene=1&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rd

[【返回目录】](#)

社会创业家：救灾 NGO 的坚持与探索

“三年一大灾，年年有小灾”，我国是世界上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大灾严重，小灾频繁。但民间力量参与灾害救援中一直存在一个“悖论”现象：每遇重大灾害，就是一次民间组织集体行动的“井喷”，参与物资筹集、现场救援、灾后重建等工作，但在中小型灾害救援中，又几乎看不到民间组织的影子。

究其原因，民间力量参与灾害救援，与社会所能提供的救灾资源密切相关。重大型灾害能够吸引政府、媒体公益、企业及公众的普遍关注，政府拨款与社会捐赠都非常活跃；但中小型灾害几乎无人问津，媒体关注与社会捐赠都十分缺乏。

这就导致了另外一个“悖论”性的后果：虽然全国公益组织数量庞大，也一直有参与灾害救援的传统，但专业开展人道主义赈灾工作的公益组织却寥寥无几。

目前,我国的民间救灾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比如:缺乏政策鼓励;对中小型灾害回应不足;专业化程度低;媒体重视不足与公众缺乏参与渠道;对灾区服务及防减灾的关注不足等。

虽然整体状况不容乐观,但是,仍然有 NGO 坚持在灾害发生时奔赴一线,并在实践中探索出适合自己的救灾模式和经验。

网聚民间力量的跨界平台

针对民间组织在灾害管理,尤其是参与灾害救援中的无序、分散的状态,以及在信息共享、优势互补、联合行动、与政府对接等方面暴露出的不足和问题,友成基金会在 2010 年成立了民间灾害应对支持中心,促进跨界合作。从汶川地震的“绵竹灾后重建社会资源协调平台模式”到“盈江救灾公益组织联合工作站”,友成推动救灾过程中的信息共享、资源协调、前方调研、后方支持、紧急安置、社区动员、特殊群体关怀等工作。

“壹基金联合救灾”是一个民间力量参与灾害救援的平台,其核心就在于“联合”。自 2011 年 11 月份启动以来,截止今年 8 月中旬,联合开展了 57 次的救援行动,覆盖全国 1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探索出一种民间力量高效参与的救灾模式。

今年夏季中西部洪灾频发,是近年来较为密集和严重的一年。壹基金联合救灾从 5 月份开始,就一直投入到各地的洪灾救援中。截止到 8 月中旬,紧急回应了江西、广西、湖南、甘肃、贵州、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北京等地突发的洪涝及泥石流灾害(包括云南、四川、新疆 2 次地震救援) 21 次,共发放救灾包 16437 个、帐篷 234 顶、共有 18387 人受益。夏季联合救灾行动中,共有 114 个民间救灾 NGO 和救援队参与了赈灾行动,参与志愿者 701 人,14557 名儿童得到救助和关爱。洪灾救援中,不仅体现出联合救灾、跨区域联动响应的网络行动特征,而且在频繁的救援行动中,为过去得不到救助的灾区儿童提供了援助,同时也进一步历练并优化了区域救灾网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平台将那些有救灾经验、对灾害议题感兴趣并对自己所在或所服务区域的灾害十分关注的组织联合起来,形成民间救灾小组,壹基金与公益组织的联合是紧密的,常态性的联合。这个联合首先是一个民主治理的平台,每个区域性民间救灾网络,都是当地有意于赈灾工作的民间组织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各区域性组织之上,有一个总协调机构,也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其次一个开放性的平台,所有关注救灾并愿意联合的公益组织,不论组织规模大小或注册与否,都可以参与进来并享受平等的权利。再次,这是一个行动的平台,以救援行动为主线联络所有组织,在救灾过程中实现优势互补与资源共享,从而有效回应灾区需求。

第一时间响应的保障

救灾过程中的物资筹集和调动十分重要。具有多年救灾经验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在灾情未发生时就将物资捐赠单位或者物资直接联系到位,主要包括衣服、毯子、帐篷等常用救灾物资,进行灾

前救灾物资备灾储备，在灾害发生后能够第一时间响应。

救助儿童会在中国没有专门的救灾资金储备，一旦决定响应救灾，只能在外部支持者和救助儿童会各成员间募集资金，但是这往往需要时间。针对此种情况，救助儿童会总部设立了单笔最高额度为10万英镑的“紧急救灾启动种子资金”，中国项目可以在灾害发生后按照既定流程申请，总部会在48小时内批复，保证在向外界筹款资金到位前，能有内部的少量资金启动需求评估等工作，不会贻误最佳的救灾时机。

要维系覆盖十个省的“壹基金联合救灾”的网络行动，提供必要的救灾物资是十分必要的。作为倡导者和推动者的壹基金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也成为联合救灾网络能够顺利运作的主要原因。

壹基金在凝冻与洪灾救援过程中，先后购买二万多套救灾物资，并储存到各地备灾仓库。壹基金提供的救灾物资主要是标准化的儿童救灾包——“壹基金温暖包”，针对不同的灾害类型和儿童需求而设计。儿童包一般包含十余种物资，满足儿童在生活、学习与卫生和心里支持等方面的需求。另外，根据不同灾情的需求，壹基金还提供帐篷、家庭包、卫生包、壹乐园、儿童友好中心等物资与服务。这些物资或服务，往往只能保证一次救援或一段时间的需求，或者仅仅侧重于为儿童提供服务。如果灾区需要更多的资源，则需要各地救灾网络通过媒体及微博向社会动员。

此外，壹基金还为一线救援人员提供了必要的救灾设备，包括救灾马甲、救灾背包、手持电台、发电机、冲锋舟、相机等一系列常用救灾设备。

为了维系联合救灾网络的救援行动及网络运作，壹基金也提供必要的费用支持。在行动方面，所提供的费用能够保障每次救援行动的顺利完成，包括灾情评估、物资运输、物资发放、回访评估等活动的开支。对于区域性网络的运作，壹基金酌情提供每省区域协调员和救灾专岗人员费用，负责网络体系的常态运作与救援行动的开展，并提供一定的网络能力建设费用。不过，这些支持无法解决十余个省份的中国民间灾害管理组织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只能维系因为救灾而产生的运作管理费用。

以社区为本降低“灾害风险”

国际美慈组织认为，虽然在灾害发生后开展积极有效的紧急救援和应急响应非常重要，但最重要的应灾策略应该是在灾害发生前做好应对灾害的准备，而寻找最脆弱的社区成了关键。

国际美慈组织在四川和云南等灾害易发的地区广泛开展了以社区为本的“灾害风险降低”项目，与社区一起找出社区的灾害和风险，在社区建立灾害管理委员会，并将国际国内减防灾的知识和经验交给社区灾害管理委员会，建立起应对灾害的本土资源。国际美慈组织与社区灾害管理委员会一起设计和实施村一级的脆弱性能力分析（VCA），并制定出村一级的减防灾计划，建立社区灾害应急响应队，并配备应急物资，开展情景模拟演练。

重大自然灾害多为突发性灾害，难以预测和有针对性的防范（比如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但中小型灾害主要以气象灾害为主，其发生具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分布规律。

壹基金通过分析历年灾害发生的频次，发现凝冻雪灾、旱灾与洪灾是最为普遍性的灾害类型，而且多发生在中西部贫困省份。根据国家减灾委2011年公布的数据，这三类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占到所有灾害损失的80%（其中洪灾占40%，旱灾占30%，凝冻雪灾占10%）。据此，壹基金联合救灾确定了中西部10-12个灾害频发省为策略重点省份，并按照灾害发生的时间规律，制定了冬春季开展凝冻灾害救援、春夏季开展旱灾救援、夏秋季开展洪灾救援的三大救灾任务。

在凝冻灾害救援中，壹基金在灾害常发的区域建立了6个备灾仓库，其中有5个布设在灾害最为严重的地级市，即使在凝冻封路之后，也能保障救援的顺利开展；由于洪灾发生面较广，之前就建立了4个省级区域中心备灾仓库，分布在贵阳、长沙、成都、西安等交通枢纽城市，便于跨区域调运。

统一的工作流程与规范

中国扶贫基金会多年来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救援机制和物资发放机制，在国内发生灾情时，无论是西南旱灾、汶川地震、舟曲泥石流，以及今年入夏以来全国大部分地区遭受的洪涝台风，他们都能冷静应对，合理“套用”，及时有序将救援物资发放到最需要救助的灾民手中。他们拥有一支专业人员形成专门的团队，包括项目的策划、筹备、宣传、执行、评估等一套模式的专业人员。发生灾情后，这支专业团队要在第一时间做出相应的准备，各协调人员都准备就绪，随时进入工作状态。而且，他们有固定筹资人员专门筹集救灾物资。

经过历次救灾的实践和摸索，救助儿童会也形成了自己一套比较成熟的以儿童为中心的救灾操作手法。灾害发生后，救助儿童会第一时间派出专业团队赴灾区开展需求评估，了解儿童和其家人的最迫切的需求。根据需求评估的结果，制定救灾工作计划，安排救灾物资的筹集和发放。

由于在“壹基金联合救灾”中，有着不同的行动主体针对不同的灾情而开展救援行动，过程细碎而复杂，如果没有统一的工作流程与规范，难以保障行动的高效和专业。所以，在灾害应对过程中，他们不断建立和完善规范的工作流程。首先在西南各省建立了区域性联合救灾小组之后，统一形成西南联合救灾委员会，讨论通过了《壹基金西南联合救灾委员会章程》，规范了各主体的权利义务，清晰了决策机制与管理规范。其次针对洪灾救援，开发了《壹基金联合救灾手册·洪灾》，规范了灾害救援的决策机制与救援行动流程，并就如何传播与动员资源提供了指引。然后还建立了一套工作流程表格，比如灾情评估表、物资申请表、仓库出入登记表、总结报告模板等，保障救灾行动的规范化操作。在项目筹备与救援活动中，壹基金全方位提供品牌支持，当地救援伙伴可以以壹基金合作伙伴的身份开展救援工作，也可以以壹基金合作伙伴身份进行物资筹措。合作伙伴从企业处

筹集的款物，可以经壹基金账户并开具免税发票。另外，壹基金还会协助网络成员协调政府关系、开具身份证明、配合传播等活动。

联合媒体、企业和政府之力

毋庸置疑，NGO 救灾中，政府的支持非常重要。

作为一家植根于中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救助儿童会也始终保持与有关政府部门的良好沟通，并尽可能地与合适的政府部门合作。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十分注重保持与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关系，在灾害发生时也会尽快与当地的政府部门取得联系，沟通意图及工作计划，了解当地的需求，取得理解和支持。以 2009 年玉树地震救灾为例，虽然救助儿童会在青海当地没有办公室，但是之前通过教育项目和当地的教育部门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于是在采取正式的救灾行动前，与省教育厅做了充分的沟通，使得成为极少数能参与到玉树救灾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壹基金联合救灾的实践探索，对于破解本文一开始所提到的“悖论”找到了一个突破口。联合救灾除了联合救灾公益组织外，还特别强调了两类重要伙伴：媒体和企业。

联合媒体参与救灾，可以直接将灾情及灾区的需求通过媒体传播，引起社会关注，动员更多的救灾资源。其次，持续关注并报道中小型灾害、发布灾害公益广告，引起当地政府及社会的关注，使得中小型灾害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再次，媒体也对民间救灾行动进行报道，有助于展示民间救灾力量，促进社会了解、认可并支持民间救灾行动。特别要提到的是微博已经成为壹基金联合救灾中重要的信息沟通与发布的平台，目前各省已经初步建立起民间救灾的微博网络。因此媒体成为壹基金联合救灾中联合的第二层次，承担着民间救灾行动与企业及公众沟通的桥梁。

资源缺乏是民间救灾面临的主要困难。壹基金联合救灾，十分注重与企业的合作并动员社会公众的参与，为民间救灾筹集可持续的资源。

总之，7·21 带来的北京之殇很快就会从舆论的视野里消失，然而，频发的灾难必将更需要 NGO 的参与，NGO 的能力，也必将在磨练中持续成长。

来源：社会创业家

地址：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A0NjIwMw==&mid=200517589&idx=1&sn=14652deef4d7c0c696fb8e327b305e62&scene=1&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rd

[【返回目录】](#)

西藏自治区户外协会：当尊重不存“益”在何处 腾讯益行家藏地越野赛引发的反思

2014年，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了“腾讯益行家”这一创新型公益项目，鼓励我国15所顶尖高校的在校大学生及校友通过四人组队展开筹款竞赛的模式，为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小学筹建“益行运动场”。七月，每所高校筹款第一名的团队来到西藏林芝地区参加“腾讯益行家”藏地越野挑战赛。这次挑战赛融合了公益和户外，旨在为广大中国青年提供磨砺自我、突破潜能、探索世界的机会，证明中国青年的力量。

小绿帽有幸全程参与了这次赛事，但是所见所闻却与预期有着不小的落差，只因在这次公益户外赛事的实际执行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尊重”严重缺失——对自然的尊重，对藏地民俗的尊重，对人的尊重，以及对本次赛事主旨的尊重。当这一切都被忽视，这次赛事跟整个益行家活动比起来，“益”被大大削减。

对自然的尊重的缺失

赛事选址在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波密县的朱西冰川和岗云杉林。这两处地方皆是各种难得一见的美景集中之地，自然景观多样，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可以说是户外摄影爱好者的天堂。

然而，这两处地方并非成熟开发运营的景区，而是藏地深处的生态秘境。若是少数自觉的有相关经验的驴友或摄影爱好者来到这里，小心翼翼对待这里的生灵与土地，大自然自有它的能力来承受。这次赛事却是两百多人，浩浩荡荡，大部队进驻，其中绝大部分成员没有任何户外经验和生态保护知识，有的只是看到雪山冰川的惊奇，看到奇花异草的新鲜劲儿。所过之处，残花遍地，“枝”横遍野，更别提满地的来自现代社会的工业制品，即使有志愿者清场收拾垃圾，造成的伤害仍不可估量。

若是赛事选址在成熟开发运营的景区，也许一切又将不一样。成熟开发运营的景区，经过了严格的生态评估，并且有着完善的后勤服务系统，在常年的景区运营中，形成了相应的恢复能力，我们不能说毫无损害，但是能够争取将对自然的损害降到最低。

对藏地民俗的尊重的缺失

赛事结束后，志愿者在拆卸帐篷的时候，在帐篷内发现了众多匪夷所思的东西，装着某黄色有异味液体的矿泉水瓶、被冠以网络新词“翔”的某排泄物这些就不用提了，最让人不忍直视的是被用来当作了厕纸的白色哈达。这次赛事虽然选址在野外，但绝对没有达到茹毛饮血的程度，帐篷营地不远处就设置有公厕，这里仍是文明社会！即使是对藏地民俗没有研究，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

道，哈达在藏区是代表敬意与情谊的，绝对不是拿来擦拭排泄物的！

哈达最早是藏族宗教礼仪中虔诚地向神灵敬奉的一件珍贵供物，也是僧侣们互赠或向活佛敬献的礼品。世世代代藏区人民都把献哈达看成是至高无上的礼仪。“哈达有价情无价”，它象征着一片纯洁的心，代表着最真诚的感情，寄托着最美好的祝愿，标志着最崇高的敬意。

将纯净的洁白哈达当了厕纸，辜负了藏区人民献哈达时的虔诚敬意，是对藏地民俗的尊重的缺失。

对人的尊重的缺失

有三十多位志愿者无偿参与到这次赛事中来，其中有西藏大学的年轻学生，长居拉萨的资深户外人士与公益人士，赛事所在地波密县团委的志愿者等等。从米林接机、赛道勘探、帐篷营地搭设到后勤物资搬运、路餐分配，再到赛事裁判、赛后收尾，统统都少不了志愿者的参与。然而，这群贡献最多的志愿者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

赛事开始前，志愿者们顶着高海拔地区的烈日搬运了好几车的后勤物资，搭好一百二十顶帐篷，安置好饮用水，忙得不可开交，多名志愿者严重晒伤，几乎毁容，还有几名志愿者由于搬运过于沉重的物资，导致肌肉拉伤。当晚，比赛成员和嘉宾到达后，由于组委会安排出现失误，部分帐篷空置，部分成员找不到帐篷住，赛事组委会在这时指责志愿者人数过多，占用了帐篷。于是志愿者们淋着大雨摸黑搭帐篷，才能有个栖身之地。

从朱西冰川向岗云杉林转场时，帐篷营地遍地垃圾，草地上不方便用扫帚，志愿者们一个个提着垃圾袋，徒手挨个捡垃圾。腾讯公益的一名工作人员由于怀疑自己的物品被当做垃圾收拾了，跑过来便将志愿者收拾好的垃圾袋统统倾倒在草地上。一名志愿者让这名工作人员将垃圾重新收拾好，她甩出一句“你算什么东西，凭什么让我捡垃圾”，然后潇洒离开。该名志愿者是西藏大学的青年学子，尚未踏入社会，凭着对公益的一腔热忱，满怀希望参与其中，却不小心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恶意！

有四名志愿者由于对遭受的不公对待表示不满，在到达岗云杉林后选择了离开，这里交通不便，他们需要凭借脚力走到318国道上，之后能不能搭到车回到县城，更要看他们的运气。某位深受志愿者们信任的领队在向组委会反映情况时，则用了一句非常清茶淡水的说辞“没事，就是走了几个无关紧要的志愿者”。

从岗云杉林往林芝地区行署所在地八一镇回撤的时候，由于志愿者来时乘坐的车辆提供给媒体人员，志愿者只能在各个车找空位坐。当志愿者来到媒体人员的车辆上时，媒体人员表示车上不能坐人了，再坐人的话，他们的行李就没地方放了。而这些占了多个座位的行李甚至都不是什么贵重摄影器械，不过是赛事结束后大家可以拿走的免费睡袋和防潮垫之类……

在赛事结束最后的欢送晚宴上，志愿者们已经落座后，遭到了腾讯公益工作人员的驱逐，她们表示：“我们只定了参赛学员的餐，志愿者的餐我们没定，你们要吃饭就出去找别人吧。”

在这些事件的背后，也许各方都有其苦衷。但无论立场何在，人与人之间的尊重都不应被忽略，尤其是在一次公益活动中！

对赛事主旨的尊重的缺失

藏地越野挑战赛作为“腾讯益行家”的一个重要环节，旨在为广大中国青年提供磨砺自我、突破潜能、探索世界的机会，证明中国青年的力量。然而，这次赛事中，却未能看到这一点。直至四天的赛事结束，大部分成员甚至还不会装睡袋，不会卷防潮垫，不会搭拆帐篷。在组委会和志愿者的“精心照顾”下，他们没有获得磨砺自我的机会，端到手边的食物，整理到位的帐篷，完场后一片待他人来收拾的狼藉……他们被动地成为了被服务对象，而非磨砺自我的主体。在藏地越野挑战赛这一环节中，我们看不到中国青年的力量。

赛事的主旨在执行中被彻底抛在脑后！

倒是赛事的志愿者们，他们展现了中国青年的希望。从成为这次赛事的志愿者开始，他们便表现了无偿奉献不求回报的精神，在过程中他们表现了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的能力，在受到不公对待后他们表现了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的勇气。

结语

腾讯益行家的活动仍在如火如荼进行，运动器材也陆续到达指定小学。我们感激这次活动给偏远乡村的孩子带来的快乐与力量，我们憧憬这次活动的公益梦想，我们相信藏地越野挑战赛的主旨。

但是，我们期待这次活动能得到更好的执行！我们期待这次赛事的主旨能得到坚持，公益梦想能得到实现，中国青年的力量能得到完全展现！而不是让尊重缺失，让公益之“益”无处可寻！

来源：西藏自治区户外协会

地址：<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view.php?id=9492>

[【返回目录】](#)

顾远：英国的公益“薪”问题

最近一两年，在国内的公益圈里，薪酬问题突然成了热点话题。说它突然，是因为并没有什么重大事件来引爆这个话题。然而问题本身却已经长期存在，造成的严重影响也显而易见。从这个角度来说，“公益薪”问题能够成为热点是必然的，也有助于它进一步从“话题”走向“议题”。

两年前，英国的公益圈里也出现过一次“薪”问题。当时的大背景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各行各业都不景气，人们对薪酬问题普遍敏感，拿着高薪的“首席执行官”(CEO)们成了众矢之的。

在公益领域里，首先发难的是英国公共服务领域中最大的工会组织 Unite。他们代表旗下的 6 万名公益行业从业者，强烈质疑一部分公益组织的 CEO 拿的年薪居然比英国首相还要高。想想那些捐款的普通民众，他们的收入只有中低水平；再想想那些基层员工，他们只拿着时薪 5.8 英镑的法定最低工资，这些富豪 CEO 们的行径简直是种“侮辱”。Unite 提醒公众，一种“过分的薪酬文化”已经在公益领域存在，并日益侵蚀着这个行业的精神气质。

工会的观点立刻遭到了驳斥。英国公益部门 CEO 联合会(ACEVO)的首席执行官 Stephen Bubb 用调研数据说话，公益机构的 CEO 平均年薪仅为 5 万 7 千英镑，还比不上一个国会议员，更别说首相了。部分 CEO 领取高薪，那是因为他们所领导的都是些人员数千、资金过千万的大型机构。再说了，有谁见过这个行业里的 CEO 领过年终奖或者业绩奖吗？在自己的博客里，Bubb 干脆毫不客气地指出，工会的观点其实反映出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认为做公益的都是些小机构，干的都是业余的活，所以不配享有专业人士才能拿的薪水。

被工会点名批判的那些公益机构也纷纷站出来，力挺自己的 CEO。他们分辩说，一来自己的机构业务规模庞大，人员的能力要求很高，跟商业机构或者公营部门相比毫不逊色；再则，给 CEO 的薪水也是在做了各种业内业外的综合比较之后才确定的，有严格审慎的流程。

最后是半官方的行业管理机构英国慈善委员会(Charity Commission UK)出面表态：为公益机构的员工制定薪酬政策是理事会应尽的职责，这项工作必须遵循合理且审慎的管理流程。这种态度表明了公益领域薪酬问题的责任人和程序原则，而没有对当事各方的具体观点做出直接的评价。一来，慈善委员会只是规则的监督者（连制定者都不是），所以不应直接参与论辩；二来，当事各方的观点都自有合理与不当之处，真理是要越辩越明的。

仔细地分析一下各方的观点，我们能够看出英国“公益薪”问题的特点以及和中国这一问题相比的异同。

首先，英国的“公益薪”问题很大程度上聚焦在 CEO 薪酬上。不仅是工会的眼睛盯着 CEO 这个“资方代表”，公众也很容易拿 CEO 薪酬来作为一家公益机构公信力的衡量指标，在很多捐赠咨询中，也都会建议捐赠人在做出捐赠决定前有必要查询机构 CEO 的薪酬情况。政府对此问题一直保持密切关注，虽然在英国的慈善法中并没有对公益领域薪酬做出规定，但是一旦出现“过度薪酬”，公益机构的法律地位和免税资格都将会受到重新审查。从这个角度来说，英国的“公益薪”问题首先是个“公信力”问题，防止的是某些人假公益之名而自肥。

其次，英国的“公益薪”和中国一样也存在偏低的情况。根据英国著名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

XpertHR 和英国志愿与社区行动联合会 (NAVCA) 联合发布的《Celre 公益部门薪酬报告》，公益领域的 CEO 比他们在其他领域的同行少收入 20%，部门经理级员工的薪水比其他行业同等职位薪水少 22%。基层员工的平均收入为 13700-15500 镑，虽然缺少比较数据，但有一个现象很能说明问题。英国公益行业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特别是在基层员工中，女性的比例高达 70%。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因为女性可能更有爱心，也是因为她们不是家中主要的经济来源，所以更能容忍低薪。

这种收入差距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中英两国是共同的。调查显示，有四成的公益机构表示“薪酬水平”是难以招到合适员工的原因，而员工离职的原因中排在第二位的也是薪酬问题。显然，机构的招聘成本和培训成本都会因此而上升。而更严重的影响是一种“逆向淘汰”现象：愿意接受现有薪酬水平的员工往往是一些能力不足、在其他领域难以找到工作的人。所以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发出警告：不要把注意力只盯在 CEO 身上，大量低收入的基层员工给机构带来的损害可能要远远超过一个拿了过高薪水的 CEO。

造成“公益薪”问题的原因之一正如 Bubb 所指出的那样，来自于一种认识上的偏见。至今仍有英国人，对公益的认识还停留在维多利亚时代，以为公益活动就是一些出身富贵的中老年妇女做志愿者，在街头卖卖小饼干之类的事情。他们当然不会意识到公益行业也需要吸引优秀的专业人士来管理日益庞大和复杂的公益活动。另一种认识上的偏见则过分放大了公益行业从业者所能获得的“心理满足”，以为有了奉献的快乐，就不应该也不需要薪酬方面有所要求了。

与上面两种认识偏见相比，“公益薪”问题存在的另一个原因却体现出了某种行业特性。在前面的争论中，我们或许已经注意到，不论是 Unite 还是 ACEVO，都在用和“他人”比较的方式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只不过前者拿 CEO 和员工做纵向比较，后者用公益行业和其他行业做横向比较。然而他们都没有用薪酬和“业绩”来做比较，而这恰恰是制定任何“合理的”薪酬水平的依据。

公益行业不是为了商业利润而开展业务，业务的结果又经常难以测量，所以“业绩”这个概念在公益行业要么不受欢迎，要么实践起来有心无力。这就意味着，至少在理论上——在事实上也绝不少见，存在着公益机构工作严重低效的可能性，也存在着从业者虽然薪水少，但活干得更少更差的可能性。于是在成果难以考量的情况下，关注点不得被放在了成本上。所以 Budd 才会忿忿不平地问“有谁见过这个行业的 CEO 领取过绩效奖金吗？”。

在“公益薪”问题的现状和原因上，中英两国的公益行业有很多共同之处，而在解决之道上，英国的公益行业则充分展现出了自身的行业成熟度。

这种成熟度首先表现在资金来源的自主性上。在 Unite 的斥责中，他们曾提到了广大中低收入水平的捐赠者，用来反衬那些可耻的高薪 CEO 们。然而在今天的英国公益行业，来自公众的捐赠在公益机构资金来源中所占的比重已不到 1/3。

根据公益行业咨询机构 Philanthropy UK 的最新数据，英国公益机构的各项资金来源中，通过经营业务获得的收入所占比例首次超过 50%。这些收入来自于机构对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所收取的费用以及政府的服务采购等（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所谓“非营利机构”并非指机构“不能盈利”，而是指“利润不得进行分配”）。越来越多的公益机构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的“创业精神”，许多机构还成立了自己的“社会企业”，用商业性的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所获得的利润全部返还到公益事业中。资金来源自主性增大，公益机构在薪酬问题上的处理弹性也随之变大。

另一方面，公益行业的成熟也与市场的力量分不开。围绕公益行业已经出现了各类规范的服务。拿招聘来说，公益行业跟商业领域一样，有自己的行业招聘网站，大型招聘网站上都开设了专门的公益招聘栏目，还有猎头公司招募行业内的高级人才。

市场化的特点之一是信息透明。关注过英国公益行业招聘信息的人可能会注意到，绝大多数的招聘信息上都注明了薪水，让求职者一目了然，也方便在各家间做出比较。MySalary、Monster 等等网站均提供免费的薪资查询和比较服务，像 PayScale 这样的网站还可以让你输入工作职责和技能要求来做出更精确的薪资比较。对刚毕业的大学生，想要进入公益领域又摸不清方向的，可以去英国高等教育职业服务处推出的网站 Graduate Prospects 上看一看，那上面可以找到从技能要求、起薪到未来发展方向等等丰富的信息。

对于公益机构来说，想要了解行业薪资情况，可以从专业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获得行业薪资报告，比如前面提到的《Celre 公益部门薪酬报告》至今已第 21 版。有了行业信息，公益机构不仅在确定内部岗位薪酬时更有把握，在向公众解释自己的薪酬政策时也更加有底气。事实上，这种用同行间（甚至跨行）相互比较来确定薪酬的方式也得到了政府的认可，政府在判定公益机构薪酬是否过高时采用的也正是这种方式。

透明还表现在公益机构对公众进行主动的信息公开。按照英国慈善法规定，任何一家年收入超过 1 万英镑的公益机构都必须向英国慈善委员会提交详细的年度报告和财务明细，任何公众也有权查看这些信息。越来越多的公益机构不仅提供财务信息，还主动将活动细节及活动成果公之于众，用成绩说话。

行业内部不同维度的联合也是行业成熟度的表现之一。在英国的公益行业，既有保障员工利益的 Unite，也有保障 CEO 权益的 ACEVO，同时还有众多的行业联合会和机构网络。英国志愿组织理事会 (NCVO) 是全英国最大的公益领域伞形组织，旗下有 16 万家地方性和社区性的公益机构，而 Charity Finance Directors Group 则是一家由公益机构中的财务人员组成的会员机构，曾与世界知名人力资源公司 Hay Group 联合发布英国公益领域财务人员的薪资报告。这些机构在向成员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也能够用集体的力量为成员争得合理的权益。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情况是，虽然就绝对数量而言，公益行业从业者的薪酬偏低，但如果将职业带来的多种收益综合考量，在某些方面他们也有可能比其他行业里的同行多获得一些好处。容易想到的是，公益机构一般会提供更灵活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时间，更长的带薪假期（调查显示，英国公益机构给员工的平均带薪假期超过25天）、更人性化的工作氛围。另外，很多的英国公益机构还能够为员工提供比营利性机构更优惠的养老金计划和医疗保险。在涨薪标准上，几乎一半的机构会参考零售价格指数来设定涨薪幅度，而在机构内部薪资差异上，男女员工的工资要在比其他领域更加平等，上下级之间的薪水差异也远小于其他行业领域。

在可预见的未来里，“公益薪”问题仍将长期存在。英国公益机构的这些做法或许会给当下中国公益领域的这个热点话题带来一些启发和借鉴。

来源：Aha 社会创新学院

地址：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DQ2NjIzMw==&mid=200461638&idx=1&sn=62b4005c75a761aa90658dcc5da2d84a&scene=1&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rd [【返回目录】](#)

◎行业动态

开全国先河 成都建立全国首家社会组织学院

今后，社会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将有属于自己的专修学院。今日上午，全国首个培训社会组织及其从业人员的“成都社会组织学院”在成都锦江区正式挂牌成立，该学院将为社会组织及其从业人员进行系统培育培训。

成都市社会组织学院由中共成都市委组织部、成都市民政局主办，中共成都市锦江区委、锦江区人民政府领办。成立大会上，相关领导对成都社会组织学院及成都市社会组织学院首批实训基地进行授牌。

社会组织学院成立 助推社会治理创新

如何培育壮大社会组织，实现在党的领导下，有序有效地激发、引导、规范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成为当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成都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元坤介绍说，成都市结合中央、省委对深化县党校办学体制改革的要求，继创办成都村政学院之后，诞生了全国第一个以县级党校为基础、以社会组织为对象的专门学院。这是新时期加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助推社会治理方式转变的一项创新举措和积极探索。

作为全国第一家为社会组织工作者提供培训的专门机构，成都社会组织学院将挖掘本地具有区域性、时代性、独特性的创新示范资源，实行开门开放办学，打造“立足成都，面向西部，辐射全国”研究型社会组织实训基地。

成都社会组织学院有关负责人表示，“该学院由锦江区领办，通过理论研究、政策学习、实务操作等多种方式，对社会组织及其从业人员进行系统性培育培训，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健康发展，真正发挥其联系服务群众，促进社会治理的优势和作用。”

打破党校封闭办学模式 走专业化特色之路

“去年我们以县级党校办学体制改革为契机，支持成都创办了全国第一所村政学院，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动效应。在新一轮干部教育培训规划中，我们明确提出要探索建立专业化特色的县级党校、村政学院，把县级党校建成面向基层党员干部的综合性培训基地。”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雷世界介绍说，“此次成都社会组织学院创建于锦江区委党校的基础上，是打破县级党校面向本区域封闭办学的传统模式，挖掘区域性、时代性干部教育培训资源，走特色化、差异化办学道路，形成‘专科’培训优势，培育县级党校比较优势的必由之路。”

雷世界认为，成都社会组织学院着眼新形势下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和社会组织发展实际，把优质

培训资源向基层一线倾斜，面向社会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开展专业化培训，有利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引导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有望再建城市社区学院 “三驾马车”共促基层社会治理

成都社会组织学院的成立是成都市创新社会治理思路，探索加强党对社会组织领导和服务的实现方式和途径，是发挥其在社会治理中主体作用的一种有益尝试。

成都市社科院社会学与法制研究所所长王健认为，目前，成都市社会组织数量较少，社会服务能力较弱，在承担政府转移职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公共服务需求、扩大社会参与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适应。学院的成立对成都市社会组织加快发展、规范运作，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目前我们还在抓紧筹建城市社区学院。”据成都市委组织部相关人员透露，“今后，村政学院、社会组织学院、城市社区学院将共同构成成都基层干部教育培训的‘三驾马车’，专注于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积极探索党对这类群体实施领导的方式，在加强基层党员干部和新兴群体教育培训的同时，促进构建基层治理体系。”

来源：人民网

地址：<http://sc.people.com.cn/BIG5/n/2014/0804/c345509-21872576.html>

[【返回目录】](#)

“中国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现代化”会议召开

8月2日上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主办、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承办的“中国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研讨会暨2014年全国社科院系统社会学所所长会议在哈尔滨市金谷大厦隆重开幕。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培林，中国社会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宋林飞，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陈光金、邴正、石英，秘书长谢寿光，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书记汪小熙，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朱宇以及全国社科院系统的院长、所长等70余人参加了会议。

此次会议的主题是“中国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我们党从新的历史时期国际国内新形势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此次会议是社会学界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中国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现代化”这一主题展开的学术研讨和交流。全国社科系统的社会学知名

学者共同研讨中国当代社会体制改革和未来社会治理方向，与会学者进行了深入广泛的交流，同时对黑龙江省在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治理中所取得的成就予以了充分肯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在开幕式上致辞。李培林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丰富了我国现代化的内涵；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社科院的发展提出两点意见：第一，要找准定位；第二，要注意人才培养。同时，李培林院长对鼓励社科院系统的科研工作者要“大力发扬社会学关注民生的人文关怀精神，踏实工作，努力创造社科院系统社会学所工作的新局面。”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朱宇在致辞中指出，此次会议旨在回顾和反思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并深入探讨未来与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并呼吁广大学者共同关注社会问题，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事业。

在随后的会议中，江苏省政府参事室主任、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宋林飞、吉林日报社社长、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吉林社会学会会长、研究员邴正、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研究员陈光金先后作了主题发言。发言题目分别为：《我国社会风险的主要趋势与治理》、《新媒体时代的社会治理》、《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茶歇后，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陕西社会学会会长、研究员石英、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巡视员、研究员方向新、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研究员王爱丽作了主题发言。发言题目分别为：《质性社会学视阈下的转型期社会发展》、《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未来走向与研究视角的转型》和《政府善治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六位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展望了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体现了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前沿的学术眼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中国社会学会秘书长谢寿光主持了大会主题发言。

2日下午，与会人员分为三组进行讨论，主题分别为：社会治理理论、社会治理与民生、城乡与社区社会治理实践。各位专家学者围绕着中国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治理现代化这一主题就自己的研究领域各抒己长，畅所欲言，在讨论和交流中加深了对中国当代社会体制改革和未来社会治理方向的认识。3日上午，各位专家学者参观了北大荒博物馆和北大荒生态园，并在农垦总局进行了调研座谈。参加座谈的学者就“两江平原开发国家战略与垦区城乡一体化”自由发言，对垦区城乡一体化问题作了深入的交流。

此次会议是自2003年以来，第二次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主办、地方社科院承办的社会学所所长会议。2003年的社会学所所长会在哈尔滨由黑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承办，时隔十一年，再一次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社会学所所长会议，充分体现了中国社科院对于地方社科院和社会学所的重视和关注。会议体现了社科系统社会学学者的学术造诣和社会责任，在讨论中，各位学者踊跃发言，对中国的社会体制改革、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等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同时，本次会议也为中

国社科院和地方社科院、社科系统社会学学者之间建立了桥梁，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并为未来社科系统各研究机构和学者之间的交流互动建立了良好的运作机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地址：http://www.cssn.cn/zx/zx_skyskl/skyskl_new/201408/t20140805_1279359.shtml [【返回目录】](#)

红十字会：请大家忘记郭美美 称将把有限精力和资源投入抗震救灾

警方调查确认，郭美美以及其资金来源都与中国红十字会无关。昨天，中国红十字会发布声明回应称，郭美美的所作所为不仅令中国人道、慈善事业遭受损失，也严重破坏了社会诚信体系。相关专家认为，郭美美事件给慈善行业带来许多不利影响，此后，整个慈善行业开始了系统地改革。

昭通地震的死难人数已经超过 300，这个夏夜里，这个黑色的数字很可能还会继续增加。无数人正在为救援行动彻夜奋战，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难道还有什么比这件事更重要、更揪心、更值得我们全身心投入的吗？

所以，从这一刻起，请忘记她，把有限的精力和资源全部转向灾区。

——摘自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微博

红会回应

郭美美严重危害了慈善事业

8月4日凌晨1点至1点06分，中国红十字会官方微博接连转发4条媒体针对郭美美案的报道及评论，公安机关调查结果及郭美美本人供述显示，她与中国红十字会毫无关系。“因为自己的虚荣心，犯下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导致红十字会这几年名誉受损这么严重。”

8月4日早8点，中国红十字会发布声明称：“公安机关的调查表明：郭美美不是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其炫耀的财富与红十字会、公众捐款及项目资金没有任何关系。”

声明还称，“近年来，一些机构和个人利用郭美美炫富在互联网上编造、传播中国红十字会的谣言，针对中国红十字会进行污蔑中伤，严重损害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声誉和社会公信力。这种造谣中伤行为，影响了社会公正，危害了社会诚信，误导了公众认知，破坏了社会秩序，对中国的人道、公益、慈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新闻发言人姚立新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称，“郭美美的所作所为不仅令中国人道、慈善事业遭受损失，也严重破坏了社会诚信体系，我们每个社会公民都是受害者”。

他表示，公安机关的侦查结果不仅还红会一个清白，同时也给全社会一个重塑诚信体系的机会。

将有限精力和资源转向灾区

声明还称，近年来，从芦山地震、于田地震、台风“威马逊”，到最近的台湾高雄燃气爆炸和昆山工厂爆炸，红十字人“顶着舆论压力，不忘使命，始终奋战在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救助的第一线”。

与此同时，红会也始终感受到来自社会各界广大公众特别是红十字志愿者、捐赠者对红十字事业的信任和支持，“中国红十字会已走过110年的风雨历程，在新形势下将不断改革创新和发展，在品牌管理、信息公开、规范化管理、能力建设等方面不断改进和完善”。

8月4日，红会相关负责人对京华时报记者表示，目前红会已全力投入到昆山工厂爆炸以及云南鲁甸地震的救灾中，对于郭美美一事将不再多做回应，“事情已经很清楚了”。

记者注意到，从8月4日早10点开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官微也一直在发布有关救灾的消息，其间还转发了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微博。该微博称，“昭通地震的死难人数已经超过300，从这一刻起，请忘记她（郭美美），把有限的精力和资源全部转向灾区”。

慈善行业问责是必然趋势

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中民慈善信息捐助中心副主任刘佑平表示，郭美美事件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是对整个慈善行业的问责，是行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郭美美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

刘佑平说，早在汶川地震期间，全国捐赠款物大爆发，慈善组织承接了老百姓的诸多爱心，问责其实已经开始。而郭美美本身又非常吸引眼球，且自称是商红会总经理，对红会、对慈善行业的问责也就一触即发。

据了解，郭美美事件2011年6月发生，红会当年接收到的个人捐款相对往年来说非常少。

中民慈善信息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当年7月全国社会捐款数为5亿元，环比下降50%，慈善组织6到8月的捐赠额降幅则超过八成以上。

该中心发布的《2012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全国接收捐赠的总额约817亿元，连续第二年下降。其中，红十字会系统的募捐额也连续两年下降。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副司长徐建中当时对媒体表示说，导致捐赠总量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全球经济形势持续低迷、重大自然灾害的减少等，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受到郭美美“问责风暴”的持续负面影响。

专家点评

推动红会及慈善组织改革

刘佑平表示，郭美美事件之后，不仅是红会，整个慈善行业都开始酝酿改革，首先是红十字会系统的改革，第二是所有公益组织的改革，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如何使捐赠信息更加公开透明、如何更加满足捐赠人的需求等。

“郭美美事件不出，这个过程会慢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郭美美事件也推动了整个行业的改革。”刘佑平说，郭美美事件短期内使各个慈善组织的捐赠量下滑，但反过来，也有刺激和推动作用，无论是慈善组织还是政府管理者，都努力完善管理制度，公益领域出现了很多行业自律联盟。

同时，通过郭美美事件，更多的社会大众也更加了解慈善行业。不过，刘佑平认为，郭美美事件更需要反思，“她是要炒作出名，媒体和社会公众不应该把更多的目光放在她身上，更不能放大一些东西”。

诸多民间慈善组织获支持

刘佑平说，“质疑红会某种意义上是它的不幸也是它的荣幸，它是行业的龙头老大，所以质疑肯定就都冲着它来”。

据了解，本应属于民间组织的红十字会，在我国实际上与官方结合甚密，每年都有一定的政府财政拨款。

而郭美美事件可以说为非官方背景的民间慈善机构带来了某种机遇。刘佑平介绍，郭美美事件后，公益领域的劝募市场也经历了新的变化，尽管红十字会系统的募捐受到一定影响，但以微博、新媒体为代表的一系列民间慈善组织、全民劝募方式异军突起，比如腾讯“月捐计划”、邓飞发起的“免费午餐”、“壹基金”等，都逐渐赢得了市场。

背景

红会陷入质疑数年难以脱身

2011年6月，实名认证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郭美美在新浪微博炫富，引发公众对中国红十字会所获善款流向的质疑。

此后，尽管中国红十字会在多个场合数次重申，红十字会没有“红十字商会”机构，更没有“郭美美”其人。但舆论风暴仍持续发酵，红会陷入质疑狂潮中，数年难以脱身。就在前不久，红会向广东台风灾区捐赠棉被时又陷入质疑。

大事记郭美美与红会

2011年6月20日，“郭美美 Baby”在微博上传玛莎拉蒂跑车照片炫富，其微博认证身份为“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2011年6月22日、24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发表声明指出，中国红十字会没有“红十字商会”机构，也未设有“商业总经理”职位，更没有“郭美美”其人。

2011年6月28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以郭美美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

2011年7月，红十字总会邀请审计署工作组进驻商业系统红十字会进行审计，并商请中国商业联合会组成联合调查组开展相关调查工作。

2011年12月，中国红会《商红会调查报告》，称郭美美炫耀的财富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商红会、公众捐款和项目资金无任何关系，但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管理存在问题，红会在调查结果中承认“疏于管理，监督不力”。

2012年12月，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成立，16名各界知名人士担任委员，作为第三方监督红会。

2013年4月，中国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新闻发言人王永在微博上称，将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此说法被红会否认。红会因此再次被拖入质疑漩涡中。

2014年7月，郭美美因涉嫌赌博等罪被抓。

2014年8月3日晚，公安机关公布的调查结果以及郭美美本人的供述显示：郭美美与红会无关。

来源：京华时报

地址：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14-08/05/content_110893.htm

[【返回目录】](#)

郭美美被抓是“掩耳盗铃”？“商红会”慈善真相！

网络红人“郭美美”在今天早上在朋友圈瞬间刷屏，并占据了各大网站的头条。这一瞬间，媒体似乎忘记了昆山工厂爆炸和云南地震，几百人在灾难中的离世，以及数千人因此的伤痕累累，而是一拥而上地关注一个23岁女孩的炫富、情色交易和赌博内幕。

媒体总是追逐那些聚光灯下的人，不管是红毯上的明星，还是微博上的“大v”，但是在“郭美美”事件中，众多网络媒体铺天盖地的专题、刷屏，将“性交易”、“干爹”、“包养”等最刺激的词放在头条，把各种细节肢解并强行送到读者眼前，赚足了点击率。但是在这些表面热闹的背后，我们不得不想追问一个问题：在这些报道中，郭美美反复表示，与“红会”没有关系，似乎是想欲盖弥彰，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刺激性更强的“情色交易”，从而忽略掉某种真相，那就是：红会究竟有没有问题？

在我看来，很多人搞错了一个概念，“郭美美跟红会有无关系”和“红会有无问题”完全是两个

层面的问题，但不少媒体总是试图混淆这两者的关系。媒体应该是冷静地追寻真相，而不是追逐表面的热闹。

在这铺天盖地的“起底郭美美”的报道中，我想问三个问题，也算是代表另外一种不和谐的“质疑”，期待有媒体能继续挖掘真正的事实：

第一，在郭美美的报道中，为何反复强调“红会”跟郭美美无关？郭美美和王军把红会的关系撇清，但“红会”却在长达三年来却忍气吞声，任由郭美美在微博上实名认证“商业红十字会总经理”败坏红会声誉？如果真的一点关系也无，红会为何不采用法律手段起诉郭美美，甚至新浪微博？

第二，在现有媒体的报道中，明显带有为“红会”洗白的元素，不少读者看完都认为是认为是“红会”的软文，不仅角度统一而且内容同质，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这带有明显的“议题设置”倾向，难道媒体都是商量好，“大概八点二十发”？

第三，商红会和红会的关系到底如何？为何王军能花几百万来包养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年轻女孩？难道跟郭美美的微博认证“商业红十字会总经理”毫无关系？商红会接着红会的名义大肆开展商业项目敛财，被借用商标的“红十字会”真的一点也不知情？

以上问题期待媒体的继续跟踪和解读。下面这篇报道是三年前起底商红会的调查报告，但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意义，那就是媒体的本位——对喧嚣提出质疑，对真相进行追问。

起底商红会慈善真相

与红十字会携手闯市场，用慈善为商业“背书”，在某些企业那里，俨然成为“一种独特的商业模式”。而商红会则是这个利益链条的上层推手

《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 邹玲)继 2008 年汶川地震救灾后，郭美美炫富门令全国亿万网民对中国红十字会再次投下不信任票。

这种不信任指向两个方面：一是红十字会在公众捐款捐物使用上长期不公开不透明，而正是这种不公开不透明滋生了种种违规滥用的情况；二是红十字会在一些公益慈善项目上与企业紧密合作，存在慈善与商业界限不清、权责不明、监管缺位的先天痼疾，使得“以慈善为名，行商业之实”成为现实存在。有的合作企业甚至将此当作一种“独特的商业模式”。

对于第一种情况，只要红十字会能够公开透明账目，做到善款善用并非难事。而对于第二种情况，仅仅公开透明还不够：现有的法律法规并未对公益组织与商业机构合作的权利界限做出明确的区隔，而这个“盲区”就成为某些商业机构借助红十字会的关系“浑水摸鱼”的禁脔。

郭美美事件爆发后，一批与红十字会有合作关系的商业机构浮出水面，天略公司、王鼎公司、中红博爱、心动传媒、中基传播等等。而其中大部分企业都直接与中国红十字会下设的二级组织——商业系统红十字会(以下简称商红会)直接发生关系。吊诡的是，有些商业机构负责人甚至在商红会兼

职。比如，商红会副秘书长李庆一便是王鼎公司的副总经理。这些商业机构是如何与商红会合作的？在合作中，慈善与商业又分别居于何等位置？最关键的，是商业为慈善助力，还是慈善在为商业效劳？

6月30日，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中国企业家》发现号称“红十字青少年视力关爱工程”唯一指定产品的“眼康近视治疗仪”，正由西安一家叫瑞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网上公开“招商加盟”。

随后，记者在陕西、北京两地，深入调查了“红十字青少年视力关爱工程救助基地”项目的运作情况，一个贴着“红十字”标签、“慈善+商业”的“独特商业模式”渐次浮出水面。

以“慈善”的名义

西安青年路147号。含光现代城的一层，“红十字青少年视力关爱工程救助基地”的牌匾赫然醒目。门两侧的墙上，分别挂了一些其它机构的名字，其中之一，便是“西安瑞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安医疗）。

记者在前期调查发现，截至目前瑞安医疗并无自己的网站，在疑似“红十字青少年视力关爱工程”项目的官方网站上，点开“招商加盟”一栏，里面的“眼康—可调式双目治疗仪陕西省地市区县级代理加盟方案”赫然写着，加盟费：地市级40万、县区级10万，且“加盟合同一旦签订，加盟单位即为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会员单位”。该招商方案的落款是“红十字青少年视力关爱工程救助基地(陕西)”和“西安瑞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看来，“红”（救助）与“商”（招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慈善与商业如此深密结合，引起了我们强烈的好奇。

7月1日，记者随某申请加盟的商家暗访了这家“救助基地”。该店面不算小，足有近200平方米。店里陈设的设备和桌椅满满当当，有七八台液晶电脑，一台大的液晶电视，验光机，焦度仪，当然，在靠墙一厕的柜橱里，还陈列着数十台眼康治疗仪。

时间是上午十点多，店里人不多，除了三四个工作人员外，还有四五个学生和家長。有的在登记，有的在测视力，有的则戴着“眼康治疗仪”在玩电脑。记者与其中的学生随机聊了一下，发现这个店确实是在提供免费近视矫治，免费治疗期为一个月。据说效果还不错。

从初步的所听所闻判断，这似乎是一个蛮正规的“救助基地”。

得知我们是为加盟的事宜而来，该店的负责人曹珊将我们让进了里屋。里屋就比较狭仄了。有一张办公桌，桌后是一把老板椅；桌前靠墙摆着两个沙发。我们坐在沙发上，曹珊搬了把椅子坐在我们面前，对谈。

从我们身后墙上悬挂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所载示的内容看，这里便是西安瑞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注册地。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闵建新，“企业负责人”为曹珊。记者随后获得的其它文件显示，闵建新是瑞安医疗第一大

股东、总经理，而曹珊的正式身份是该公司总经理助理。

据曹珊称，瑞安医疗是“眼康治疗仪”在陕西的总代理；后者也是目前瑞安医疗代理销售的唯一主营产品，而他们目前开展起来的唯一“业务”就是运作该“救助基地”。“我们这个基地已经运作两年了。”她说。“因为基地是公益项目，所以这两年我们公司是纯投入。不说人工水电，光房租每月就是1万多块。”

说到这，曹珊看出了我们的狐疑：你们要是不赚钱，凭什么邀请我们“加盟”？

“我们当然是要赚钱的。”曹珊肯定地说，“之所以前期投入这么多时间和金钱，就是为了得到患者的认可，树立市场口碑。”

事实上，在瑞安医疗做“救助基地”的过程中，已经实现了一定的销售业绩。“上个月，我们卖了三四十台吧。”曹珊透露。不过，她强调，免费治疗与产品销售是不挂钩的。“如果有学生家长觉得产品使用效果好，向我们提出购买需求，我们就卖给他。”

很显然，这就是我们在街头、公园、药店、社区等地方常见的“体验式营销”，所不同的是，它穿戴着“红十字救助工程”的华丽外衣。

再看看这个由郑州科瑞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生产、所谓获得国家两大专利的“眼康治疗仪”。瑞安医疗相关网站标售的该产品价格是2850元，价格不菲。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有点像“游泳镜”的产品，镜架子不用说了，核心的部件就是一组光学镜片，这么简单的产品，能值这么多钱？

据曹珊称，2850元是标价，一般要买的家长都会要求打折，“我们就2350元卖给他们。”这500元的差价，“我们就说是红十字会救助基金的补贴。”曹珊也承认，这仅仅是一个“说法”而已，所谓“补贴”并不存在。

“加盟商要拿货的话，多少钱？”我们问。

“这个目前没完全确定，还不能告诉你们。我只能说，这里面价差非常大。”曹珊答道。

即便利润空间极为丰厚，但如果瑞安医疗仅止于通过“免费救助体验”，暗渡陈仓式地销售，那也只好做成一家慈善机构了。

这，当然不是一家代理销售医疗器械公司成立的初衷。

以“红十字青少年视力关爱工程救助基地”的名头“招商加盟”正是瑞安医疗下一步大举敛财的重要手段。

根据网上披露的“加盟方案”，成为地市级加盟商，需要缴纳40万元的加盟费和保证金。而且加盟商必须完成：第一年2000台、第二年8000台、第三年15000台的销售指标，如果三年后累计未完成总的销售任务(25000台)，则由总代扣除20万元的保证金。

“加盟合同正式签订后，省代公司一次性提供眼康双目可调式治疗仪50台，50英寸等离子彩

色电视机1台,台式电脑4台,验光机1台,焦度仪1台,插片箱1套。”据曹珊介绍,这些设施正是用来装备地区级“红十字青少年视力关爱工程救助基地”的。

“一年2000台,三年25000台,是不是太多了?”同行的加盟商叫苦。以西安这个救助基地的情况看,两年救助1500人,即使都变成买家,每年平均也才销750台。三年后,20万的保证金岂不是肉包子打狗了?

“首先是我们产品质量好,有疗效,你们也看到了;其次我们还没有大规模推广。现在孩子都放暑假了,我们打算开学后就进学校宣传,用红十字视力关爱工程项目的名义开展防治近视知识培训和讲座,西安这么多学校这么多孩子,市场潜力很大。一旦进入学校,一年卖2000台仪器,你觉得还算多吗?”面对我们的疑虑,曹珊反问。

与红十字会携手闯市场,用慈善为商业“背书”,曹珊将之称为“一种独特的商业模式”。

商红会在为谁服务?

没错,这正是“慈善”与“商业”混搭交融的项目。而作为项目发起方的商红会,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在瑞安医疗提供的一份眼康产品宣传单上,记者注意到下面赫然印着“陕西省红十字会”的监督电话。循着这个线索,记者随后来到位于西安未央路的陕西省红十字会。

陕西红会事业发展部的张喜民部长接待了我们。张部长表示监督电话属实。不过,“他们是今年初才把材料报到我们这的。”根据工商登记资料,瑞安医疗在2011年3月才完成注册。

据张部长回忆,2010年下半年,就有会里的同志注意到在青年路有这么一个使用“红十字标志”的地方。“当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等到材料报来才知道。”

“这个项目是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批准的,商红会属于红会系统,当然可以使用红十字的标志。人家是行业分会,跟我们省的分会属于平行机构。他们批的,跟咱这没啥关系,我们咋管得着?”张部长举着一叠文件给记者看。

既然没啥关系,为何陕西红会还要“监督”一下?“因为商红会在省里没有分支机构,所以在省内开展活动的话理应得到陕西红会的认可。”张部长说。这一表述恰与瑞安医疗下一步准备在学校搞大规模宣传推广活动以及“招商加盟”计划合拍。

不过张部长强调,陕西红会的角色仅仅就是监督,“没有谋取任何的利益”。

“我们不可能跟任何商业组织有经济利益上的往来,这也违背了红十字会章程,我们只是政府的一个助手,帮助政府实施救助和赈灾的义务。”但是他也感叹“红十字会”发展的艰难,“任何一个组织都需要自我发展,红十字会除了大灾时有大量捐款,平时收到的捐助非常少,所以必要时也需要开展一些活动,甚至跟公司合作,否则红会的发展会陷入停滞。”至于商红会与眼康治疗仪这种

合作模式，张部长觉得，“也不能完全否认其意义，毕竟企业是为红十字会在做事情，尽到了一部分救助的义务。”但慈善跟商业的界限在哪里？张部长认为“很难说清楚”。

在界限模糊的情况下，红会监督的内容是什么？张部长表示，“陕西省红十字会对该项目只是监督它是否存在救助行为的事实，没有监督其后续商业活动的权利。他们怎么运作的，我们也搞不懂。因此，这家公司利用红十字会名义开展的一系列商业活动，与省红十字会没有任何关系。说白了，赚了赔了，都是公司行为。”

在陕西省红十字会，记者还见到了该会秘书长。“陕西省红十字会自己运作的公益项目中从来没有这种模式。”据秘书长介绍，“一般来讲，企业给我们做了捐助，也希望落一个好名声。我们就帮助企业做些宣传。这是比较常见的，也合情合理。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在于，有些企业在捐助活动过了很长时间后，还在使用当时有红十字会内容的材料做企业产品宣传。对这种情况我们是要加以制止的，但是往往防不胜防。”

眼康项目的运作是否涉嫌违反《中国红十字会法》关于“禁止滥用红十字标志”的规定？答案是肯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第18条规定，“红十字标志不得用于商标或者商业性广告。”

而这种滥用的始作俑者就是商红会：一个创立十年却至今未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的“机构”，一个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机构”，却拥有下发红头文件、批准红十字标志使用并将其商业化运作的权力，且不受任何机构监管，着实令人胆寒。

和商红会相唱和的还有一家叫“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简称关工委)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学校教育研究办公室”的机构，早在2009年8月，双方就几乎同时向“全国各级各类中小学校”发出了对眼康治疗仪的推荐函。其中，商红会在其推荐函中明示：特指定该产品(眼康治疗仪)为“红十字青少年视力关爱工程”专用产品。

将近两年的铺垫蛰伏，才吹响大举进军市场的号角，让人不得不佩服策划者的忍耐力。

而让人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商红会或者红十字会在其中是否有牟利行为？

蹊跷的红会“牌照费”？

由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发起的“红十字青少年视力关爱工程”，目前在北京、陕西、山西、山东等地设立了十几处救助基地。记者以加盟商的身份电话采访了眼康山东总代理。

“现在加盟眼康这个项目要求比较高，第一你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店面；第二你必须要跟红十字会和关工委合作，要拿出比较多的钱，给红十字会一些费用来买这个证书和牌匾；第三要求下面的加盟商必须要买一台瑞风商务车，在车体上要标有红十字会广告在市内做宣传。”眼康治疗仪山东总代理商马先生跟记者透露了惊人内幕。

该人士还表示，给红十字会的“牌照费”根据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好的是山西太原还有北京这几个地方，他们一个店用于买牌照的费用就是好几十万。”而类似菏泽这样的三线城市，“牌照费可能两万左右。”如果不买“牌照”和“证书”，无法取得红十字会的授权，不能挂“红十字青少年视力关爱救助基地”的牌匾。而如果不使用“红十字会”的标志和资源，一个店的加盟费用会减少大半。

至于“牌照费”到底是交给了谁，马先生语焉不详，只是透露上交给了当地红十字会。因为商红会在北京之外的各地区并无分支机构，上交给地方红十字会就成为了唯一可能的选择。

高昂的牌照费并没有阻挡加盟商的热情，据马先生称，最近山东刚刚召开“眼康”项目周年庆典，有将近300人前来参加，当场达成项目加盟意向的有24家，还有不少商家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

“首先我们这个产品利润很高。”马先生透露，“二级代理商拿货价是800元一套，零售价2850，相当于三折。”另外最重要的是“这个市场好，青少年近视人群庞大，而且有红十字会和关工委的授权，有垄断资源。”

7月6日，记者进一步探访位于北京光华路的又一“红十字青少年视力关爱工程救助基地”，与西安的店不同，该店隐匿在办公楼里，平时大门紧闭，没有任何公司的明显标志，进门的显眼处则悬挂着“商业系统红十字会”颁发的“红十字青少年视力关爱工程救助基地”牌匾，以及“红十字会章程”和红十字会“人道、博爱、奉献”的宣传标语，这里的员工也自称是“红十字会”人员。乍一看，根本看不出来这其实是一家商业机构，而容易误解为红十字会的某个分支。

据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就是眼康治疗仪生产厂家、郑州科瑞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在北京地区的总代理商，北京一共有三家加盟店，分别位于大兴、白广路和光华路，均以“红十字青少年视力关爱救助基地”的名义运营。记者提出了加盟的问题，工作人员让记者去联系他们负责人郜总。

郜先生在电话中称，他们就是科瑞公司的，眼康就是他们运作的产品。科瑞公司计划9月份在央视大力推广该产品，届时会有新的加盟方案出台。谈到加盟商与红会的关系，郜先生说，“你可以用红十字会的牌子，也可以不用。用的话你就要投入场地设施建救助基地，不用的话你就想别的办法做市场推广。”至于山东代理商说到的“牌照费”，郜先生表示未有耳闻。他推测，可能是加入商红会交的“会员费”。

加盟费、牌照费、会员费，一个产品，三地的代理商三个说法。不管是什么费，显而易见的是，对于想加盟代理该产品的商家而言，“染红”并不是免费的午餐。而“染红”所能带来的市场便利大家也都心照不宣。

就在记者7月1日在西安采访的当天晚上，中国红十字会发表声明—鉴于媒体对于商红会运作方式存在问题提出质疑，“暂停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一切活动”。并邀请审计机构对商红会成立以来

的账目进行审计。

商红会到底有没有通过和企业进行商业合作牟取利益?如果有,企业的回报又是如何使用的?也许只有等到审计机构查账完毕才能搞清楚了。

无论何种情况,商红会的行为都不可避免地陷入悖论:如果向合作企业收取了费用,就涉嫌违规“出卖”红十字标志;如果没有向合作企业收费,那么企业借助红十字名义谋取巨大商业利益,试问,谁可容忍?

“800 元的进价,卖 2850 元,这个价格太暴利了。”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第三部门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徐家良教授得知这个获利比例感到非常惊讶,“红十字会是监管其商业合作方价格是否适当的。公益组织结合商业并非不允许,但要有公益的底线。获取暴利显然是不符合其精神的。”

来源:中国企业家

地址: <http://www.iceo.com.cn/renwu2013/2014/0805/293785.shtml>

[【返回目录】](#)

民间环保呛声鄱阳湖建坝

7月25日,北京环保人士叶子(化名)一早就收到了一条信息,被告知有关鄱阳湖建坝的专家研讨会,当天上午正在国家发改委举行。

“他们进行如此重大的水利工程项目审议,外界似乎完全不知情,不太合理”,叶子于是将这个信息在朋友圈做了传播,提醒大家关注鄱阳湖建坝的审议结果。

这已是鄱阳湖建坝项目自2011、2012年后的第三次进京闯关。前两次该项目已相继通过了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总院的行业审查。

多家环保机构呼吁暂缓立项

要不要在鄱阳湖建大坝(或“闸”),在国内环保界早已不是一个新问题。而这次专家研讨会之所以如此受重视,是因为民间环保界一直担心其是否被国家层面批准立项。

与民间环保界一道焦虑等待的,还有主推建坝的江西省水利部门及政府部门。

“从最初提出建坝,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江西省水利科学研究所副院长许新发在年初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述:上世纪80年代,由江西省科学院牵头,组织了省内近40个科研单位对鄱阳湖进行科学考察,其中一个重要的考察任务,就是论证《鄱阳湖控制工程研究》。这次考察结束后,形成

了一份《人工湖控综合报告》。

“当时还只是一个理论探讨方面的大胆设想，但近些年，随着鄱阳湖冬旱连年加剧，这一设想已经越来越急于落地”，许新发称。

2008年9月，江西省水利厅最先公布了《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规划方案》。该方案披露，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由闸坝主体工程和自然保护区保护工程两部分组成。这一规划方案，迅速在国内环保界引起争议。

这一切均与鄱阳湖自身特殊敏感的生态位相关。夏来洪水一片、冬春枯水一线。毕竟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的鄱阳湖，不仅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而且还是长江中下游湖泊群中至今通江的两个大型湖泊之一。其独特的湖泊湿地景观、以及丰富无比的动植物基因资源，令国内环保界、生态学无法侧目。

1992年，鄱阳湖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2002年10月，鄱阳湖代表中国加入“世界湖泊网”，成为我国加入该网的唯一代表。

与此同时，2009年底，江西省提出的环湖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得到国务院批复。尽管作为环湖经济区规划最重要配套工程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被要求拎出来单独论证，但“建坝”一事显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2013年初，江西省专门成立了推动鄱阳湖大坝建设的鄱湖办。该机构的工作目标就是加快推进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大干快上”，“争取2014年完成工程立项”。

“从目前进展来看，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已经进入国家发改委立项审批阶段，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坚持客观、公开、公正原则，在对鄱阳湖生态功能进行全面科学研究、以及对工程建设的生态影响作出客观评估后，再动议是否建坝”，7月25日，第一个公开呼吁“暂缓建坝”的环保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公开表态，称“无坝方案，将是维持鄱阳湖生态系统健康的最优方案”。

此后，国内环保组织自然大学紧跟发声，呼吁国家发改委慎重审批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认为“仅江西省政府一方声称做了多个专题研究，目前在相关论证内容、论证结果、存在风险、科学数据和建议等重要信息都没有公开讨论的情形下（通过项目立项）”，势必产生高的生态风险和社会风险。

建坝“六好处”被驳为“六害处”

自2008年以来，一直高举“生态保护”大旗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遇到最激烈的反对声音，同样来自国内一线生态环保专家和环保组织。

2008年前后，中科院政策研究副所长王毅，找到陈宜瑜、曹文宣、李文华、刘兴土等生态学方面院士，联名上书国务院，认为鄱阳湖建坝，将会“产生许多负面影响，不仅会影响下游大城市的

供水安全，而且必然延长鄱阳湖换水周期，希望政府能给予研究”。一位长江生态保护专家，甚至直接将反对意见送达了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手中。

2010年，江西省作出调整，邀请国内著名科研机构的相关专家，亲自担纲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六大研究课题的补充调研，补充研究的项目总费用约1200万元。

“围绕鄱阳湖建坝（或闸）的必要性，江西方面前后给出了六大好处，但实际上也完全可以看作六大害处”，中科院湖泊研究所姜加虎教授直言，他反对鄱阳湖建坝，已反对了15年，他的观点从来没有改变过。

姜加虎曾担任鄱阳湖站长，长期在鄱阳湖从事湖泊科研工作。“江西建坝的六大好处，包括留一湖清水，可满足灌溉、供水、航运、旅游、发电、水产等，但这些都能被轻易驳倒”，姜加虎举例，比如主建方认为建坝（闸）会留住一湖清水，反之如果湖区周边污染不被控制的话，一湖清水很可能留下来，就是一湖污水，太湖、巢湖近年来的污染与富营养化，已经验证；其二航运方面，目前江西火车、公路均已相当发达，发展航运实无必要；以及发电，由于江西湖口入长江处江湖连动，水面无太大落差，相比筑坝成本和管理维护成本，发电效益并不可观等。

2004年，在江西省召开的一次鄱阳湖水利枢纽专家讨论会上，有人提出：建坝（闸）后，可以长距离向北京输送清水。“从江西调水，且不论路途遥远，中间隔着淮河、海河、以及大别山等，就是输送过去了，那水的成本，北京喝得起吗？”一与会专家当场反对。

此外，鄱阳湖大坝主建方也还曾提出建坝有利于江豚保护、以及防治血吸虫病等。“这种观点挺可笑”，姜加虎解释，主建方认为建坝后湖水变库水，水质会变清，利于江豚捕食，其实江豚是靠超生波集体捕食，水清水浊并不影响它生存，相反食物量的丰富与否、以及能否通江洄游，对它能否生存更重要；至于防治血吸虫就更无可能了，“因为蓄水后，血吸虫的寄主钉螺，只会往浅水岸边逃，有可能连附近居民家门口都有了，反而带来血吸虫蔓延，你以为钉螺会等着大水淹死而不跑呀？”

姜加虎教授称，自己反对的六大理由，这些年也一直未变。比如第一条，就是对鄱阳湖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会危及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区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包括白鹤、小天鹅、东方白鹳等珍稀国际候鸟；以及闸掉鄱阳湖每年对长江的输送水量，相当于闸掉了长江干流水量的17%，比黄河、海河、淮河三条大河的水量加起来还多，会影响长江中下游地区供水安全；以及建坝变水库后的水质污染等。

“拖字诀” Or 收生态服务费？

2013年前后，在国内生态专家和环保机构持续的反对声中，江西省对鄱阳湖建坝思路作出调整，由先前的“调枯控洪”，改为“调枯不调洪”；将“建大坝”改为“调闸不建坝”、“拦水不蓄水”、以及“建管不调度”。

“坝是高出水面的，闸则可升可降，可根据江湖水位进行调整，主要用于枯水季节拦水，在洪水季节则不起作用，夏季涨水时依然任其泄洪，至于拦水后涉及的下游江水调度问题，江西承诺只管理日常维护运行，不涉及全流域水调度”，一水利专家解释这一变化。

而去年公布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公众参与公示》披露：“受长江上游干支流水库群汛后蓄水以及近年来鄱阳湖上游来水减少等影响，鄱阳湖年年枯水期提前、水位降低、持续时间延长”，故拟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闸坝长2900多米、闸顶高程23.4米，该工程静态总投资120.91亿元，年运行费用约1.28亿元。

江西省水利厅相关科研人员称，2003年，三峡工程开始蓄水；2007年，三峡完成正常蓄水；结果2008年起两湖地区便开始冬旱。“试想想一举截掉长江每年300亿立方米的江水，对中下游是怎样的影响？”，该科研人员认为三峡工程建成后，已经改变了鄱阳湖等中下游水环境生态。

“这些年，鄱阳湖上游赣（江）、信（江）、抚（河）等五条江上，共建了8000多座水库蓄水发电，加上工农业发展用水增加，鄱阳湖近些年枯水期提前、水量减少，也不能完全赖到长江头上呀？”，国内一生态学者认为“鄱阳湖建坝理由不充分”，不能因为长江上游层层建坝，中下流也跟着圈水大跃进。

自上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并已在长江流域开展了大量生态保护活动的WWF则认为，鄱阳湖以建坝方式应对三峡工程影响，是在用“三峡的手段，来抵消三峡的影响”。

事实是：2008年江西宣布建坝不久，近邻上游洞庭湖也接踵宣布启动建坝工程。工程总投资接近140亿。

对此，复旦大学教授、长江湿地保护网络专家组组长陈家宽忧心忡忡，态度非常坚决，表示“绝对不能建（坝）”。“鄱阳湖、洞庭湖已是目前长江中下游唯一的两个通江湖泊了，具有调蓄长江洪水的重要吐纳功能，以及由此复杂的水文条件所形成的独有而珍稀的湿地生态系统，一旦被人工堵上，且不说江豚，就是对湿地植物、候鸟、长江洄游鱼类等都将是致命之灾”。

“如果没有草鸟鱼虫，那长江岂不成了一条下水道？”陈家宽教授认为鄱阳湖建坝，很可能连锁引起长江整个生态系统崩溃。

参与鄱阳湖建坝补充调研6个专家组之一的中科院水生所王丁教授在接受记者访问时，也称：根据他们科研团队对鄱阳湖淡水水生生物补充调研的结果，目前依然不适应建坝或闸。另一位参与专家则干脆解释，“上一次补充调研结果，依然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这其实是个‘拖’字诀，即既不说能建，也不说不能建，真实的态度是反对”。

陈家宽教授则粗略算了一笔帐，认为鄱阳湖一年下泄入长江的净水量多达1400亿方，如果向下游经济更发达、生产能力及生产效率更高的江苏、浙江、上海等长三角地区供应清洁用水，就算一

吨水只收5毛钱，其收入也是一年700个亿。

“相当于2013年江西省财政收入2357.1多个亿的近1/3，想不通(他们)为什么非要建闸呢？”，陈家宽教授认为，江西省应该尽力保护好鄱阳湖的一湖净水，然后完全可以通过中央财政平衡，获得由中下游地区提供的生态服务费，而不是简单建闸建坝。

截止目前，民间环保机构联署反对鄱阳湖建坝的行动，仍在进行之中。国家发改委在这次专家论证会后，将汇报国务院，由国务院最终做出建或不建的决定，未来或许还需要全国人大表决也难讲。

来源：网易新闻

地址：

http://3g.163.com/ntes/special/0034073A/wechat_article.html?docid=A2SCBN9R000465B7&from=single_message&isappinstalled=0

[【返回目录】](#)

◎国际观察

社区利益公司：英国独特的社企模式

英国的社区利益公司(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 以下简称 CIC)是英国社会企业的重要形式之一。CIC 是有限责任公司的一种形式, 它进行商业贸易, 但最终目的是为社会服务, 或者从事以社区利益为目的的商业活动。

在英国, 大多数投身公益的公司采用社会企业形式, 或是由社区组织建立公司(通常是担保有限公司), 还有一些采取合作社形式。CIC 是对以上形式的良好补充, 特别适合愿意在有限责任公司框架下自由开展工作的人。CIC 比其他形式更灵活, 其特有的资本结构多样性可以满足成员和组织的需要。

在法律上, CIC 有权持有社区会所和设施等本地资产, 可以直接面向公众和团体提供商品、进行服务, 开展贸易。虽然同一个机构不能既是 CIC 又是慈善组织, 但是 CIC 可以为某一慈善机构(如慈善商店)提供慈善贸易活动。它可以分配部分或全部利润给慈善机构, 资助它们的慈善活动。CIC 使社区受益, 它不可以只服务于有经济优势的人群, 不可以有政治目的, 也不可以服务于个别雇员、董事或成员, 它的服务目标必须是公众。

鹅卵石画廊

鹅卵石画廊(Pebbles Gallery)是一家社区利益公司, 它通过经营咖啡馆、画廊、出租空间、售卖商品提取佣金等形式赚钱, 并将盈利用于资助本地的创意艺术家。

2006 年, 阿曼达·加尔布雷斯(Amanda Galbraith)在诺森伯兰郡的艾伦代尔(Allendale, Northumberland)偶然看到一间商店, 她注意到, 有不少艺术家在此展示作品, 另一些艺术家不远万里来此参观。

“我与其中一部分人聊了起来。我们打算合租这家商店, 把它做成画廊, 并且分摊运营费用。”加尔布雷斯说。“在短短八个星期内, 我们筹集到 10000 英镑用于翻新门店, 画廊很快向公众开放了。”

画廊和与之相连的艺术咖啡馆取名为“鹅卵石”。目前, 鹅卵石俨然是这里的活动中心。在咖啡馆, 人们讨论展览方案, 开展充满活力的项目, 各种创作活动有机结合在一起。咖啡馆还承办了一年一度的文化节, 包括专题研讨会、音乐表演、艺术作品展示等。

2007 年 1 月, 鹅卵石画廊筹备转型为有限公司。公司由 15 名正式成员组成, 他们的身份包括独立艺术家、音乐家、食品生产商等, 还有大量准成员不断加入, 最近一次统计是 71 人。组织迅速成长, 加之原始租约到期, 迫使“鹅卵石”考虑寻找新址。加尔布雷斯说: “镇中心有个车库, 口蹄

疫期间倒闭了。这座大楼最初属于一个铁匠，我们将它买了下来。”

搬家后，加尔布雷斯与合作伙伴开会，与地方理事会、艺术委员会和诺森伯兰的社会企业共同讨论鹅卵石的发展方向。最终，决定转变为一家社区利益公司。

艾伦代尔的创意艺术家因自给自足而骄傲。成立之初获得的捐款被用于新业务，目前，不需要寻求任何资金资助。他们靠出租空间，收取代售作品佣金赚钱。正式成员都是微型企业，同在这把伞下运作。2008年，他们获得了东北地区商业奖中的“最佳文化及创意商业奖”。

加尔布雷斯表示：“在鼓励和支持农村地区企业发展方面，我们看到了新的目标。现在，新大厦已经落成，将会举办规模更大的项目，完全做到自给自足。”

沃灵福德蓝调音乐啤酒节

安静的英国沃灵福德牛津郡在一年中的某个周末活跃了起来，上千人聚集于此，享受蓝调音乐和啤酒。这就是“沃灵福德蓝调音乐啤酒节”(Wallingford Blues and Beer Festival)。

每年的啤酒节都有超过60名志愿者为此服务。作为啤酒节主席，以及该社区最资深的成员之一，约翰·柯里(John Curry)在11年前接管了这项工作。最初的啤酒节通过社区募集捐款维持运营，现在，门票销售和赞助资金就足够支撑运营了。

随着啤酒节名气越来越大，柯里发现规范化操作势在必行。2006年，他们决定成立社区利益公司，负责啤酒节的各项工作。“过去，我们所有人都投身于啤酒节中，组织松散，问题层出不穷。这让我意识到，只有正规的公司化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才能让啤酒节越办越好。资金方面，社区利益公司的资产锁定模式也保障了财务安全。”

“啤酒节已经成为布鲁斯巡演的固定环节，”柯里说，“我们不仅吸引到一些大人物，比如戴夫博瑞组合，也为本地乐队提供了展示机会。当地人经营酒吧，销售当地的啤酒和红酒，还有本地生产的食物……”啤酒节为社区带来的好处远不止这些。最重要的是，获得的利润将用于资助沃灵福德和周围村镇的青年发展项目。从2000年至今，已筹得超过29000英镑善款。“我们每年资助两个组织，有学校音乐团体、学龄前学校、地方唱诗班、橄榄球队，以及越来越多的慈善机构项目，比如为残疾人和家庭成员培训骑术等等。”

谈到未来，柯里希望这种模式能持续发展下去。“我们想将啤酒节推广到其他地区，这是我们为沃灵福德创造的一份财富。”

“书籍捐献者”

“书籍捐献者”(Bookdonors)是一家苏格兰社区利益公司，2005年由劳里·海沃思(Lawrie Hayworth)成立。乍看起来，它似乎只是卖书，并为公益事业筹集资金。实际上，它将二手书籍转化为商品，并通过这种形式，实现三重价值。

书籍捐献者的经营模式并不复杂：从慈善机构、图书馆或其他合作机构那里获得二手书，再通过互联网，如亚马逊进行售卖。不能重复使用的将被回收。

销售额的四分之一用于支付给供应商，帮助他们的事业筹集资金，这实现了经济价值。成吨的二手书从垃圾填埋场转移出来，这实现了环保价值。为完成以上工作，书籍捐献者雇用长期失业和残障人士，为他们提供就业培训机会，也使他们实现了社会价值。

“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中有三分之一是残疾人。”海沃思说，“其中约 80%的人长期失业。我们是苏格兰第一家社区利益公司。”

如今，书籍捐献者已完成 85 万英镑营业额，提供 22 个工作机会，并已向慈善机构捐赠了二十多万英镑善款。

社区利益公司的模型对于书籍捐献者很有帮助，它遵循商业原则，为服务于社会而工作，而非慈善机构。“我们不想拓展慈善路线。作为社区利益公司，我们有清晰的界定和资产管理办法。”

书籍捐献者的最初目的是为慈善筹资，这个作用现在仍然存在。但海沃斯认为，这家企业更大的成就是——为失业和残障人士提供就业机会。“我看到了他们生活改变了，因为他们有了工作。”

(据英国政府网站 www.gov.uk)

链接

在英国，CIC 在法律定义上属于有限责任公司，可以是新注册的公司，也可以从原有公司转变而来。

为了保证 CIC 的资产、收入或利润要为所在社区服务，这样的公司需要具备一些附加功能。首先，需进行“资产锁定”，以确保公司持有资产，并以经营活动或其他方式造福于社区。资产锁定的主要内容包括：CIC 不可以低于市场价格转让资产，除非这种转让发生在狭义准许范围内，如为了社区利益，转让给另一家 CIC。

其次，如果公司章程允许分红(向另一家资产锁定机构、另一家社区利益公司或慈善组织除外)需要明确分红上限。分红上限也适用于与社区利益公司挂钩的贷款利息上。

社区利益公司解散时，须将所有剩余资产转移给另一家资产锁定主体，直到所有负债得到还清。

注册社区利益公司的第一步是制定相应章程。这一章程必须符合相关法案。如果是从现有公司转型为 CIC，则需改写章程和机构名称。之后要发表声明，宣布机构的活动是为社区利益服务，并公布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办法。

证明社区利益公司的行为已经或将要服务于社区利益，这个过程就是“社区利益测试”。在社区利益公司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测试将不断进行。一旦发现某机构从事特定政治活动，或只为特定机构成员、特定雇主雇员利益服务，那它就考砸了。因为声明中明确规定：本机构不能被任何政党或

政治竞选组织所有或控制，否则将被禁止一切活动。

社区利益公司需要定期发布《年度报告》，并向公司注册处(Companies House)缴纳 15 英镑年费。年报必须清晰记录 CIC 在本年度的活动，相关利益者在这一年是如何参与的，透明度相当高。这就确保了公司所服务的社区，可以获取全部关键信息。年报中还需提供董事的酬劳、股息分配等重要财务信息。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html/guojianli/6830.html>

[【返回目录】](#)

可穿戴技术将改变慈善机构与捐助人的关系

想像这幅画面：你是一位负责大笔募款的项目官员，正在去和一位捐助人开会的途中，你迷路了。于是，你需要问路。装在你眼镜上的头部演示设备给你展示了一幅通向捐助人大门的地图。

你停好车，拉出捐助人的资料——依然是从眼镜上——并花了几分钟回顾这些信息。你用你值得信赖的魔法眼镜上的摄像头记录这次会议，而你可以全神贯注在捐助人身上，而不是在纸笔或录音机上。

这不是什么科幻小说。实际上，这里面越来越强调“科学”而非“幻想”的成分。

在 2013 年，可穿戴技术成为技术领域的新热点，并愈发红火。从健身追踪器到心脏监测器到智能手表到谷歌眼镜，可穿戴技术被认为会像衣服一样无处不在，而非营利组织需要跳上这辆快车。

“它在技术上十分灵活，”杰基·马西斯(Jackie Mathis)说，他是德州奥斯丁的软件公司青比亚(Kimbria)的销售工程师，也是谷歌眼镜的用户。马西斯谈到要将谷歌的可穿戴电脑——谷歌眼镜，与捐助人管理系统结合起来。“问题在于可穿戴技术成为社会所接受的一部分。社会整体是否准备接受谷歌眼镜，或者一些设备不仅是带在你的腰上而是跟你的日常生活互动这种概念？我想这不是一两年的事情。”

克里斯·特投(Chris Tuttle)，一位住在纽约的技术顾问认为，虽然非营利组织的执行官们对谷歌眼镜很感兴趣也愿意使用，“但只有少数人找到了有效(使用这一技术)的途径，因为谷歌眼镜还有其限制。”特投提到的一些限制包括这项技术的成本(约 1500 美元)、在使用摄像功能时电池的寿命(小于 1 小时)、难以在用户之间轻松切换、糟糕的录音功能，以及谷歌眼镜的视频会议技术实施群聊(Hangout On Air)的限制。

虽然可穿戴技术也许还无法让募款官员们的生活变得更轻松，它已经被一些非营利组织使用并起到了救命的作用。康乃狄格州威尔顿(Wilton)的南希·卡贝勒(Nancy Capelle)，在40岁突发心脏病以前身体一直很健康。心脏病专家检查出她患有罕见的自发性冠状动脉夹层症。

“其中一位心脏病专家不让我离开医院，直到我穿上生命马甲(LifeVest)”，现年42岁的卡贝勒说。“我之前从未听说过这个东西，但听起来不错，因为我很害怕再次发作。穿上这个东西不仅一天24小时都在监控我的心脏，而且一旦心脏骤停，它还可以电击起搏，对我来说这让我感到平安。”

卡贝勒说这个设备一点都不显眼，大小像一个小包。病人先穿着“生命马甲”，一个可穿戴的除颤器，穿一两个月的时间，它将心脏数据传给制造商，这些数据可以被患者的医疗团队获取。当患者发生异常的心脏节律时，会发出警报声，如果患者无法关闭警报，马甲将自动为病人除颤。

“可穿戴监控设备反映了动态医疗的未来。”医学博士克莱德·杨思(Clyde Yancy)如此说。他是伊利诺伊州芝加哥西北大学芬博格医学院的心脏病主任，也是位于德州达拉斯的全美心脏病学会的前任理事长。“但我们要将这一技术放在医学疗法的相同检验标准上。”

杨思相信，非营利组织在开发新的可穿戴医疗技术当中可以扮演重要而独特的角色。“非营利组织的职责是直接地融入这些技术”他说，“非营利组织可以对其效应进行事实确认和平衡。非营利组织可以呼吁科学界有实现这些技术的必要。我不认为许多非营利组织能够转播技术，但他们可以推进信息的整合，提高公众意识。”

由全美心脏病协会以及其他机构开展的非营利组织开展的倡导工作，被整合进入保留有关可穿戴除颤器的医保政策当中。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的耐用医疗设备医保管理承包商曾在2011年考虑修改医保政策，这会让为数不少的病人无法得到可穿戴除颤器。部分由于非营利机构的倡导，政策修改草案被撤回。

可穿戴技术也可以在其他方面拯救生命。当马特·阿斯那(Matt Asner)患有自闭症的儿子在户外走失，阿斯那作为位于洛杉矶的南加州自闭症发声会(Autism Speaks Southern California)的执行主任，希望他的孩子一直穿着GPS追踪器。他的儿子在走失后几小时被发现，没有受到伤害。

“(GPS追踪器)是我们强烈推广的，”他说，“如果有孩子失踪，我想在某些危险发生之前，你只有很短时间采取行动来找到他们。你越快定位到他们，就越快知道他们在哪儿，也就越快找到他们并带回家，情况就会好很多。孩子在外面越久，这个世界对他们就越危险。”

自闭症发声会没有分发追踪器或帮助家庭得到资助以获取设备。阿斯那说，组织的合作伙伴，全国自闭症基金会，应该帮助有自闭症儿童的家庭获取GPS追踪器。而全国自闭症基金会对此没有发表评论。

克里斯托夫(Christopher)与达纳·利夫基金会(Dana Reeve Foundation)为他们的服务对象——脊

髓损伤或瘫痪的群体，密切关注可穿戴技术的可能性。基金会已经提供了 15 项“生命质量”基金，总计超过 13 万 5 千美金，针对可穿戴技术创新，包括眼球追踪技术和头部指示设备，这两项技术都可以让瘫痪病人不需要用手就可以与他们周围的环境互动，此外还有声控打字技术。

“技术为瘫痪病人个体生命的改变提供了无限可能性。有了可穿戴技术的新进展，瘫痪群体就可以与他们的家人、朋友及看护者交流沟通，”位于新泽西州低岭(Short Hills)的利夫基金会“生命质量”项目高级副主席妮基塔·塞西(Niketa Sheth)说，“当你给那些多年沉默的人们自我表达的能力，这就是一件无价之宝。”

成本仍然是一个问题。“问题在于许多(GPS 追踪器)都很贵，”阿斯那说。“家庭需要帮助来获取它们。”另一个问题是追踪器的形状。阿斯那说，许多自闭症儿童“对于装在他们身上的东西都很敏感”。追踪器必须不引人注目，孩子不会介意穿戴，也不会掉下来。阿斯那建议装在孩子的鞋里。

可穿戴除颤器的成本跟一辆新车差不多。据卡贝勒说，中等程度的设备在 4 到 6 万美元之间。卡贝勒的保险覆盖了除颤器，但对于没上保险的人，这个成本差不多就把这种设备排除在外了。

非营利组织还有许多技术需要，信息汤国际(TechSoup Global)的吉姆·林奇(Jim Lynch)说，“把移动端与办公场所整合起来是一个大议题。自带设备这种事情到处都在发生。我们发现非营利组织对于他们网站的移动端并不乐观。这中间有巨大的差距。但当谈到可穿戴的时候，这些就像是玩具一样了。”

林奇说比之于社会的其他部门，非营利组织的科技大都还处在基本层面。“有许多人还在使用 Windows XP，一个已经 10 到 11 岁高龄的操作系统。它即将退休，那时将面对恶意软件大开后门。我们正尝试宣传你要么升级操作系统，要么就要安装十分强大的防毒程序。这是我们此刻正在打的仗。”

可穿戴技术可能是未来，但对非营利组织来说还不是现在。这可能很快就会改变。凯瑟琳·安格塔-克隆克(Kathryn Engelhardt-Cronk)，德州奥斯汀的咨询公司 CTK 的 CEO 如此认为。她相信可穿戴技术被采用的速度会比其他技术采用速度快许多。

“当我在 2000 年创办 CTK 的时候，我所工作的非营利组织中只有约 60%会上网”她说，“事情变得太快，我觉得无法预言(可穿戴技术的)使用率会有多少。非营利组织已经不再患有技术恐惧症。他们更多时候是技术的拥护者了。”(翻译：赵擎寰)

来源：环球协力社

地址：

<http://www.loongzone.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5844&extra=page%3D1>

[【返回目录】](#)

◎企业社会责任

马蔚华：在中国做公益，比做招行要难很多倍

福特汽车的董事长有这样一句话：“一个好的企业和一个伟大企业的差别在于，一个好的企业可以生产让这个世界满意的产品和服务，而一个伟大的企业，不仅可以让自己的客户满意，而且会让这个世界可以更美好”。维珍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企业，布兰森不仅做了很多商业创新的事情，他还把公益当成很重要的事业。比如他早在2006年就准备了30亿美元，要使地球变暖的问题得到重视和解决；他花2500万美元设了一个挑战地球奖，让能够改变、能够连续十年，让大气减少10亿方污染的科学家获得这样的奖励……这都是让世界非常赞赏的壮举。我们也从中得到了很多启发。

使命：公益慈善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

中国在过去35年，经济增长平均接近10%的速度，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在世界上，连续30年超过10%的国家只有三个。但是中国在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也出现了两个负面情况：一是我们的环境，资源贫乏，环境不堪重负，北京的雾霾就是典型的反映；另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6000美元以上，属于中等收入。与此同时，中国的基尼系数连续十年超过国际标准，也就是说中国的贫富差距在世界上是最大的国家之一。环境被破坏，社会矛盾增加，如果中国不解决这两个问题，中国可持续增长是不可能的。

要想解决这两个问题，除了政府的力量还不够。政府可以制定改善环境的许多政策，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来解决一部分贫富不均的问题，但是不够。西方的国家，解决这个问题的很多重要的措施是社会的公益事业，所以对中国来说现在是发展公益慈善事业的时候了。

第一，中国有一句话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就是你穷的时候只能自己好，你发达的时候才能帮助别人。因为一个人自己不能站起来的时候也不能帮助别人站起来。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达到全球第二经济体，这个时候中国已经有能力开始做公益慈善事业了。作为先富起来的人们，他们也应该有能力帮助别人了。

第二，社会上有三种解决贫富的方法，就是分配的制度。第一次分配是企业自己创造价值；第二次分配是政府通过税收来调节贫富不均；我们把慈善公益叫做第三次国民收入分配。而这种分配应该是有钱人发自内心的，是社会倡导的一种分配模式。

第三，我们的社会过去叫他组织，政府包揽一切。随着社会特别是互联网的兴起，许多自组织、社会组织，不是政府可以指挥的组织，成长起来了。其中有很多是慈善公益组织。但是我们比起美国还有差距，美国有12万个基金会，中国只有三千多个，但是现在正在成长的过程中。

第四，慈善公益已经成为一种价值观。过去是靠宗教的力量，西方过去也是靠宗教的力量，现

在变成企业的一种内心的内在的价值观，我认为这会超越宗教的力量。

差距：中国对公益的重视还不够

我认为，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有四个因素来制约：锐意创新的政府，不断创造财富的企业家们，能够批评的媒体，还有就是具有博爱之心的社会公益组织。这四个是一个良性社会的结构，中国距离这样一个结构还有一段差距。在中国发展的阶段，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中国也到了发展慈善公益事业的阶段，但是中国还有很多差距。

首先是制度。美国之所以公益事业非常发达，很重要在于美国有非常完整的税收政策。美国的遗产税是50%，美国的慈善是免税的，NGO非盈利组织是低税的。在中国有慈善的减税政策，但是目前需要政府很多部门一个一个的批准，每年批准也就是一百多家。这是一个人为的障碍，它制约了很多慈善公益的发展。不久前苹果公司要捐给壹基金两千万，但前提是必须有税收的政策，我们就赶紧找政府赶紧批。我们很期待中国政府有一个公平的覆盖面比较全的税收政策。

再比如，中国政府的主管单位民政部，规定所有的公益组织的费用，不能超过捐款的10%，而且70%要在当年花掉，好像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这种规定。但是在这种制度没有改变之前，我们还很难突破。所以作为慈善公益组织的员工的福利待遇和激励机制，可能有些困难。现在更多是凭着大家的热心和自觉性，但是这个问题将来会解决。

其次，在社会上，大家对公益慈善还有很多很多误解。我去年卸任招行行长，壹基金的第一任理事长就打电话给我，让我来当壹基金的主席。我当时几乎没加思索地答应了，因为我原来也是它的理事和预算委员会主席。他怕我中间变卦，还写在理事会的记录上。后来我才知道在中国做基金工作，是非常艰难的，比当初我创建招行还要难很多倍。因为干银行，在中国是稀有的，尽管很多困难，但是别人是找你的。但是做公益事业，要筹款，每天都要去找别人。而且做银行干好了大家都有奖金，做公益事业不仅没有奖金，然后还要自己的钱要放到里面去，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我当行长的时候，每年中国开两会，我们叫两会，英国叫议会。很多媒体都采访我，问我创新的事。因为我身份转变了，我希望他采访公益的事情。我做了一个很充分的准备，而且做了一个很好的发言，但是没有有一个媒体去采访我关于公益的事。当时我很失望，我觉得这就是说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后来我找了十家跟我关系比较好的，我说你们必须报道慈善公益，这就说明我们还需要开拓。

同时，中国公益事业发展还很不健全。在中国做慈善事业，现在是个好的势头，但是各有各的做法。很多企业自己要做公益基金，这也是需要的。但很多跨国公司需要在中国找专业的公益基金，中国专业的基金还非常缺少。中国现在连一个完善的公益慈善的统计体系都没有，更不用说界定财产的制度。

此外，中国还缺少公益慈善的人才，在美国有 292 所大学有公益慈善的专业，而在中国只有北京师范大学有一个研究院。所以我们一直在和美国的一些朋友，和中国的一些民营企业家一起策划，在中国成立一个慈善公益大学。不久前，比尔·盖茨到中国去，我们跟他交流，他也很感兴趣，我们需要慈善公益的人才。

模式：用商业来管理和经营慈善机构

做公益很重要的就是如何管理慈善公益组织。中国有很多问题，特别是中国在前几年因为社会公信力的问题对很多慈善基金提出质疑。这里有慈善基金本身不规范的问题，也有这个社会缺少制度的问题，比如说信息披露的制度，不透明大家肯定有怀疑。

还有一个如何经营这些慈善机构的问题，我看了美国西方很多的慈善公益的做法。最近这几年一个最流行的做法，就是用商业模式来管理慈善机构，这是非常有道理的。西方很多基金会都有一个良好的治理结构，有董事会。所以我们也在把壹基金变成这样一个机构，理事会领导下的秘书长负责制，也就等同于董事会领导下的 CEO 负责制。我们要有一个战略，因为壹基金的理念是尽我所能、人人公益，不完全指望有钱者、富人。过去中国的慈善似乎都是富人的事，都是社会上层的事，社会精英的事，而不是社会公众的事。但一个良好的社会结构必须把慈善变成一个社会的、平民的、整个社会都认可的事，所以我们通过互联网可以做到这一点。

我们最初发招行信用卡的时候，就和李连杰当时创造的壹基金发了一个联名卡，刷一次卡就提示他，你可以捐一块钱给公益事业，得到很多响应。后来又和阿里巴巴支付宝合作，用户完成一笔交易，也可以提示捐一块钱，甚至一毛钱都行。再比如可口可乐，顾客买一瓶可乐，可以自愿捐一毛钱。但这些钱都是公众捐的钱，它必须透明，必须让公众知道如何使用，所以我们必须像管理上市公司一样管理这些钱。这就需要客户经理制，就像我在招行一样，我们要了解投资人的希望，要给他们服务。

另一方面我们要通过很多 NGO 来管理这些投资。因为这些钱都是社会捐的，不能出风险，就需要像银行控制风险一样管理。我们要让社会信服，要有内审制度、外审制度，聘请国际会计师来向社会披露。

总而言之，管理公益机构就像管理上市银行一样，而且还要有绩效考核体制。但绩效考核体制不能像商业机构那样干好了多发奖金，因为公益事业没有多少钱，工资很低，在中国可能更低。但是中国有一批越来越愿意献身公益事业的人才，比如壹基金的职工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有来自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生，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还有中国许多名校的学生，还有来自很多国际组织的人。他们每天都在第一线，因为壹基金最重要的是灾后重建。在四川灾区，一个小女孩刚从伦敦政治学院出来，拿了三四千块人民币的工资，一待就是半年、一年，毫无怨言，这

是非常宝贵的。

未来：每个人都要贡献力量

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逐渐发展起来了，也包括我们的环境保护。我曾经参加过阿拉善基金，这是中国第一个民间的环境保护基金，是治理沙漠的。我们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45位企业家每个企业家都对公益做过重大贡献，很多企业有自己的基金会和公益项目，壹基金有十个理事都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企业家。所以在中国，公益慈善越来越成为我们中国企业家追求的价值理念。我们有了这样一批群体，有了越来越多的献身公益慈善的企业家，他们自愿地保护环境，减少排放，减少污染，解决地球变暖的问题。这是根本的，光靠政府是不行的。尽管我们的政府不断地开会，但是要真正地解决是要靠企业自觉地去，而自觉地做就需要有这样一种价值观。

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也需要社会公益来解决，而这种解决方法可能比政府强制解决更有弹性。听了布兰森的事迹介绍，我觉得中国也应该和像布兰森这样的企业学习，让更多的中国企业为我们这个地球，为我们人类能够更好的传承下去。

布兰森有一个理论：“我们从上一代接过这个地球，我们还要把这个地球传到下一代，不能让它有任何伤害。”作为中国的企业家，我们肩负着共同的使命。

来源：凤凰公益

地址：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4_08/06/37877395_0.shtml

[【返回目录】](#)

马蔚华对话布兰森等企业家：用商业模式管理慈善机构

导语：受英国维珍集团创始人布兰森的邀请，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一行正在他的私人岛屿内克岛进行参访。在8月3日的互动环节，俱乐部执行理事长、原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就中国的公益制度环境、如何用商业模式管理慈善机构等方面，回答了布兰森等企业家和嘉宾的问题。

一、一个稳定的社会，应该是中产阶层大，富人和穷人小

理查德·布兰森（维珍集团创始人）：很显然，听到您的演讲我明白在中国，公益慈善有很大的潜在机会，这对于社会来讲非常重要。我的问题是，中国有没有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来鼓励人们捐赠或者给予呢？

第二个问题，如果上市公司或者是说有各种不同股份制的公司，如果要在公益的事业上面，捐赠出一个百分比的公司盈利，或者是说资金的话，会不会被他们的股东所批评，或者社会上其他人

所批评或者加以评价呢？

第三个问题，对于中国这么少的人，积累这么多的财富，你认为有没有任何的风险重蹈覆辙，又有另外一次革命，也就是说中国的商人是否要做出榜样来，让政府和人民不要担心。这对西方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对中国也是非常重要的。

马蔚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行理事长、原招商银行行长）：您说的非常重要。美国之所以公益事业非常发达，很重要在于美国有非常完整的税收政策。美国的遗产税是 50%，美国的慈善是免税的，NGO 非盈利组织是低税的。而在中国有慈善的减税政策，但是目前需要政府很多部门一个一个地批准，每年批准也就是一百多家，这是一个人为的障碍，它制约了很多的慈善公益的发展。不久前苹果公司要捐给壹基金两千万，但是前提是必须有税收政策，我们就赶紧找政府赶紧批。所以我们很期待中国政府有一个公平的覆盖面比较全的这样的税收政策。

关于第二个问题，捐赠有两种形式，一是作为个人的捐赠，如果企业家个人，我们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企业家用自己的钱去捐赠，这个和董事会没有关系。也有通过公司名誉去捐赠的，但是这必须由董事会通过，或者董事会的授权，在一定的限度内，由 CEO 去完成这个事情。

第三个问题您说的担心，不仅我有，中国的领导人也有。当一个社会极度不合理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不是稳定的。因为中国的贫富差距在全球来说也是比较高的，中国的基尼系数连续十年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所以中国政府一方面要调整一些制度，比如说税收制度、分配制度，他要使那些过于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得到基本的生活保证。同时也要通过制度，通过一种价值和道德，来希望富人为这个社会做贡献。

我觉得中国应该有这样一个发展的方向，就是培养中产阶级。一个稳定的社会，应该是中产阶级大，富人和穷人小，而不是两头大，中间小。因为在这个世界的历史上，从欧洲的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光荣革命、明治维新，在这样的社会变革中，中产阶级都是起到重要作用的。如果贫民过多，特别是赤贫过多，他们希望用暴力解决。这就是中国过去历史上的政权更迭。

所以中产阶级一般是采取比较温和的办法，需要改革。因为它本身有一定的社会技术能力，有一定的财富积累，所以它不希望这个社会制度有根本性的改变。同时它又不满意政府和某些人利用特权来牟取私利。所以中国未来需要调整政策，如何培养一批中产阶级，这是社会未来稳定的因素。

Q2 张贤明（远大可建科技有限公司 CEO）：马行长，最近有一位中国商人去美国做慈善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中国在非洲也有相当多的各种公益慈善的合作项目，您认为中国在未来的世界范围上面的慈善工作，会不会受到一些冲击？

马蔚华：每个人做慈善可能有他不同的选择方式，我们也不必责怪陈光标和潘石屹这种方式。尽管他的方式可能不一定被很多人接受，但他毕竟拿钱给了穷人。但是我们更希望像非洲这些。比

尔·盖茨跟我说，他这几年解决非洲的疾病问题，一个一个地解决疾病问题，消灭非洲很恶劣的疾病。但中国慈善还是个初级阶段，只要他做了慈善，我觉得任何方式我们都可以容忍，但将来会随着慈善的发展，可能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一个大家都很赞成的方式去做慈善。

二、确保每一个英镑都是有效运用的

程虹（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秘书长）：我看到的一个现象是在过去中国几十年，确实积累了非常多的财富。而且现在在中国，无论是做公益还是做慈善，意愿是很强烈的，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陈光标等等，其实他们在意愿上没有问题。但是中国面临的公益和慈善的问题不是想到的问题，是怎么做到的问题。所以我想问马行长和布兰森，怎么样才能找到好的经理人，去用一种商业的方式，把慈善的任务完成？两位都是企业家，都转身或者是有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公益，在你们操作公益事业的过程当中，用了多少商业的方法，给它移植到公益里面来。

布兰森：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对于非盈利公司来讲，跟盈利公司来讲，是同等重要，或者更重要的，是同样的方式建立成立起来。需要有同样有财富的首席执行官，然后100%信任他们，然后100%鼓励员工，然后很有效的去运营，不浪费金钱。以我们的维珍基金会来讲，就是确保每一个英镑都是有效运用的。同样的，每一块钱，每一英镑，对于我们盈利公司来讲也是有效的去运用，所以这跟盈利公司同等对待。

马蔚华：我赞成布兰森的观点，现在全球很崇尚用商业的方式来做公益事业。实际上一个商业企业和一个公益组织，过程完全一样，只有最后一条是不一样的：企业是利润的最大化，而公益组织是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我们完全可以用做企业的方法来做公益。首先都需要一个良好的治理结构，和一个符合实际的发展战略。另外有对投资人、捐款人和钱的使用人的一个具体的客户经理制，就是有专人负责。然后还要有一个比较好的绩效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还有一个向社会披露信息的透明制度和审计制度。

我觉得唯一不同的是在中国，中国政府的主管单位民政部，它规定所有的公益组织的费用，不能超过捐款的10%，而且70%要在当年花掉，好像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这种规定。但是在这种制度没有改变之前，我们还很难突破。所以作为慈善公益组织的员工的福利待遇和激励机制，可能有些困难。现在更多是凭着大家的热心和自觉性，但是这个问题将来会解决。

三、如果忠诚地执行制度，那么永远不会有创新

李凯琳（英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商务参赞、英国贸易投资总署中国区主管）：您好，第一个问题是怎么样能够把员工的工作环境提高？在中国有很多的方式，把员工的比如说生活的这种方式或者交通的安全能够提高？无论在盈利还是在非盈利公司，如何通过更好的措施或者举动来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

第二个问题是，您刚才讲到了中国的公益制度环境，您觉得如何促进政府做出改变？我们也愿意推动英国和中国双方能够互相分享各自的成功和经验。

马蔚华：昨天我在互联网上看到一个令人沉痛的消息，在中国江苏省的昆山，发生了一个工厂的爆炸事件，有50多人失去了生命。这个原因就是工人的工作环境十分恶劣，在空气中产生一种粉末，遇到着火点就发生爆炸。中国很多事故都是由于不重视工人的工作环境而造成的。我觉得这些事情已经使我们的政府感到痛心了。

在中国不断地出现这样的事情，政府必须从中吸取教训，才能够从制度和法律上来解决这些问题。不管它是一个外资的业，还是一个中国内资企业，保护工人的健康和工作环境，已经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充分的注意，因为血的教训不断地发生。但是解决这些问题，一个是靠政府的法律制度，靠社会的公众道德，我觉得还要靠工人自觉地维护自己的权利。

我们有工人的工会，我们也要发挥工人工会的作用，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这样一次一次事故信号，都会使中国政府加快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是一个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共同面对的过程。

第二个问题，的确像所说，中国政府的一些制度，还不适应今天公益慈善的发展。这和我们商业创新是一样的，任何制度法律都滞后于商业发展的实践。如果我们忠诚地执行制度，那么永远不会有创新。布兰森的成功，是不拘一格，锐意进取，很勇敢地突破了很多原则和框框。在中国也是这样，很多企业在往前走。有风险，但是政府现在是比较改革开放的，只要容忍有风险，容忍犯错误，而且也可以通过修订制度来改变，这个国家就有希望了。

我本人作为一个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英国叫议员，也会发挥一定的作用。我现在的提案都是为了让中国有一个良好的公益慈善的制度。比如说税收问题，财产的权力界定问题，信托关系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慈善公益最基本的制度都没有，所以我们要努力。这和商业的突破是一样的，通过公益的创新，来突破现有的制度。

不过现在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政府，应该越来越开明了，原来中国不批准个人的团体，就是民间的团体，这是中国政府比较担心的事情，但现在越来越好了。中国政府民政部准备放开个人团体的备案制。其他方面的制度，也在解决，税收的制度，财产的界定制度。总而言之，虽然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中国是往前走的。当然，像布兰森这样的国际上的知名企业，他们的做法对中国也是个促进，因为世界是一体的。

艾欣（三通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行长，壹基金的启动和两次发展都是在四川地震的时候，一次是汶川地震，一次是雅安地震，都是因为重大的自然灾害。壹基金正在跟成都市政府合作，准备做一个地震知识博物馆，这个博物馆也是中国第一个关于普及地震知识、防灾救灾知

识的。是不是可以请这种国际有影响力的企业家，比如布兰森先生来加入壹基金的一些推广，增加英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双方在慈善领域的相互了解。

马蔚华：我们将来可以请一些在世界上有影响的高级国际顾问来做壹基金的高级顾问，使壹基金在全球更有影响力。我们将来也可以请布兰森先生做我们的顾问，指导我们。比如我们还可以在中国推广维珍可乐，每一个消费者买一瓶维珍可乐，让他可以自觉地捐一块钱。

灾害发生是被动的，在全球都是这样。但是救灾是被动之后我们必须做的，但是我们更应该重视防灾。所以壹基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预防灾害，减少人们对灾害不认识、被动的受害。所以我们在成都建一个预防灾害的一个地震公园。成都这个地带是一个地震频发区，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有地震。当地震发生的时候每个人都有对灾害的了解和自身防范本领的时候，增加自救的知识的时候，就可以减少灾害的发生。这个也应该在全国推广，我们也在通过电视节目，让全国更多的人知道怎么去防范类似自然灾害。

王伟斌（双全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神玉艺术馆馆长）：在内克岛，布兰森先生放了好多佛像。佛家讲有六度，从布施、忍辱、持戒、禅定、精进到智慧。佛教讲小布施是把钱捐给穷人，帮助穷人。大布施是解决人精神上的这种压力和痛苦，叫大布施、大慈善。因为社会的分化、环境的恶劣，国人整个精神压力是巨大的。壹基金在除了身体力行、救灾这方面，在解决国人精神或者是信仰这层面的慈善的举措有没有规划？

马蔚华：壹基金只是这个社会公益组织的一员、一部分，它除了救灾以外，更多的是宣传一种公益的理念。当然，我觉得光靠壹基金是远远不够的，壹基金会努力去做。你讲到的这个公益慈善事业，这个理念我觉得只要符合这个方面的，都应该提倡。比如说在中国，佛教我主张中国人要信佛教，佛教是不杀生，修来世，做善事。如果中国人每个人都用这种理念约束自己，老百姓都用这种理念约束自己，不去伤害野生动物，去保护生命，追求美好的东西，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公益，一种慈善。

来源：凤凰公益

地址：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4_08/06/37878368_3.shtml

[【返回目录】](#)

如果那些很牛的企业们不止是做 CSR，会发生什么？

“如果...会怎样？”是上周的可持续品牌大会上最流行的句式之一，几乎每一场研讨和陈述中都是它的身影。这场在加州圣迭戈持续三天的盛会分别以“重构（Reimagine）”“重设（Redesign）”“重造（Regenerate）”为每日主题，旨在唤起人们更多的创新性思考。有些人也许会想当然地认为，让受利益驱动的商家们转而从社会与环境角度来思考与行事，在现阶段不过是空中楼阁般的设想，然而统计数字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

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72%的标准普尔 500 强公司会把自身环境与社会方面的作为纳入绩效报告之中，同时三分之二的中型企业要么已开展企业社会责任（CSR）项目，要么正不断巩固它们的现有成果。另外，有 84%的消费者表示，亲眼见证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成果将迅速提升他们对该单位的信任度。据估计，到 2014 年底，商业机构在可持续发展事业上的投入将达到 600 亿美元。

梳理一下思路，这一切其实都颇为合乎逻辑：追求可持续发展之后，企业能提升效率、减少开销、增强客户忠诚度，在加强管控的情况下抵御风险，并在创新方面更上一层楼。嗯，不能忘了，可持续发展还能贡献不赖的投资回报率。一个可以信手拈来的例子是联合利华的可持续发展项目：2008 年，这一项目为该公司总计节约了 3.95 亿美元。联合利华集团负责可持续生计及企业传播方面的副总乔纳森·阿特伍德在一次演讲中表示，“有（社会）目标的品牌成长更为迅猛”。他演讲的背景是出席“阳光计划”项目，一项切实造福于客户以及他们荷包的行动。

Mission Measurement 公司的杰森·索尔所发布的社会价值指数（Social Value Index）是近年来社会领域最令人振奋的产物之一，与之前的晨星（译者：Morning Star，国际顶级评级机构）对社会部门的评测有异曲同工之处。这套指数将企业从社会与环境项目中获得的利益量化，识别出开展这些项目的主要驱动因素（如消费者），并按照企业所从事的行业进行分类。这项研究传播甚广，因此能让诸多企业（也许是）头一次了解到他们的 CSR 项目投资回报率究竟如何，以及他们在同行中居于什么地位。这样的评估，不仅对早已立志于通过开展可持续项目来提升投资回报的企业有益，也向那些仍在观望的企业提供了参考数据，让他们相信社会与环境项目同样有利可挖，从而扩大参与者的规模。

数据分析可不是只有一家在做，尼尔森咨询的迈克尔·史密斯（译者：这名字大概在中国就相当于“张伟”或者“王涛”吧...）也用数据展示该公司如果利用神经科学来测算某一个公司在可持续项目上的投入对其各个层面消费者人数的影响。

那边厢，旧金山的一家唤作 Quid 的公司正飞速成长，其主要业务便是利用可视化图像及分析工具来让客户理解大数据的潜在含义。Sprint 公司（译者：美国通讯业巨头）的企业责任部负责人达

伦·贝克对大数据时代的认识最为深刻，他解释道：“创新是走向成果的那扇门，但在开启它之前，你要证明门后的路在生意上行得通。” Micro-Documentaries（译者：一家线上文件处理服务提供商）的娜塔莎·德加内洛则对影响力评估的重要性有独到见解，她幽默地指出：“在采用社会化媒体时推广产品时，你可不能贴出一张小广告并不停祈祷就指望它见效。”

大会上讨论的热门话题还包括行业专用术语的转换，当前的热门趋势是用清晰的产出界定来替代过去“不那么糟糕”的目标表述，以使所有人在了解愿景之后都能充分行动起来。这方面的典型案例之一是用“环境效度（eco-effectiveness）”来替代“环境效率（eco-efficiency）”，以及将“可持续（sustainable）”替换为“净正向（net positive）”。还有不少人提出，应该尽量避免使用“消费者（consumer）”一词，因为它来源于“消费（consume）”的概念，意指“耗尽资源”——嗯，正是吾等美帝人士所长（译者：作着吐得一手好槽！）。有演讲者建议，可将消费者称为“盟友（allies）”，这可真让我听着脸红...不过我能理解改名当中蕴含的立场，也同意开展这场术语改革，毕竟我们正迎来一个更少层级、更为平等的经济体系，需要有合适的词汇来反映这种变化。也有演讲者不客气地指出，如今人们更多地通过相识者寻找所需的商品与服务，大型企业应该去积极适应此种变化。而弄明白如何应对变化，对企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不难理解为何 Jeremiah Owyang 创立了 Crowd Companies 协会，帮助会员们学习在变革中如何自处。

“自我发现”话题的出现让我很是兴奋，谷歌基于自我发现而培养情商与智商的著名项目“Search Inside Yourself”（译者：附上同名书籍豆瓣链接，供大家管中窥豹：<http://book.douban.com/subject/7155765/>）工作人员里奇·费尔南德斯鼓励大家，每当新的一天开始时可以思考一个新的问题，设置一个新的目标，或是将自己的某些想法具象化。卫报执行主编乔·康菲诺掷地有声地询问大家：“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情愿有所改变，凭什么要求别人去主动求变呢？”事实上，如果一个人内心有改变的冲动，并且能认识到自身所为远谈不上完美，那么他很可能会停下手头上所谓“正确的事”，而是努力寻找我们与他人的共同追求，直至创造出共赢的局面。正如费尔南德斯问听众的：“什么东西最容易点燃你，这份激情又能如何造福于大家呢？”另外一位提及此话题的是金宝汤公司（译者：Campbell Soup，知名罐头汤生产商）CEO 丹尼斯·莫里森。他说：“如果你真的秉持某种使命而活着，那么这份使命肯定会成为你决策时的取舍标准。”对于这句话，CVS 公司（译者：美国最大药品零售商）企业传播与社区关系部副总裁艾琳·霍华德·布恩势必感同身受。正是出于使命感，这家公司放弃了年收入 20 亿美元的烟草销售业务。

社会与环境问题历来复杂无比。有鉴于此，与会的发言者无不强调他们所力主的跨界伙伴关系产生的效果：为政府、企业和消费者搭建沟通平台，从而加强彼此间的合作，找出应对问题的最佳途径，并由各界协力解决问题。事实上，可持续品牌大会本身规模的扩大最能体现当下合作意识的

增长：2006年的首届会议仅有200人参加；到2014年，大会已经吸引了全球5000余人莅临现场。而每年访问大会官网和社交媒体页面的人数达到了100万之巨。另一方面，该大会在过去数年已先后在伦敦、伊斯坦布尔、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吉隆坡召开过，巴塞罗那和曼谷则将成为接下来的举办地。所有的这些进步都来自于组织内部的不断驱动，譬如大会发起人和现任CEO KoAnn Skrzyniarz（译者：有人读得出这个名字么...）便始终激情似火。他在今年的开幕仪式上致辞说：“我们更愿意将本机构看作一个社区，而非仅仅一场会议。”这样的论述为接下来一周的会议奠定了正面基调，也迅速打造了互信的氛围。

说到互信，信任也是大会的重要讨论主题。REX（译者：一家美国战略咨询思想库）的杰里·米夏尔斯基在讲述本机构的财务管理实操时说：“信任比管控更节约成本，同时能取得更多的产出。”大会上，各路与会者都被问到同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是在追逐消费者，还是在为他们服务？这个问题引人发笑，但其思考维度却是实际生活中一家企业能否建立信任与维持长期客户关系的分水岭所在。Chipotle（译者：墨西哥风味连锁快餐店）传播总监克里斯·阿诺德描述了他的公司是如何选择通过娱乐活动来吸引眼球，从而避免过于明显的品牌宣传。知名意见领袖及资深咨询师安德鲁·萨维茨一直关注可持续发展与人力资源两大领域的交集，他敏锐地指出：“没有人力资源（HR）策略的CSR只能算是简单的公关（PR）。”同样是关注怎样从组织内部制造变革的人士，《The Evolution of a Corporate Idealist》一书的作者克里斯汀·巴德尔则指出：“想做一名成功企业家，你的工作显然不该是布道或者维稳。”她强调倾听的重要性，指出企业家应通过个人层面的对话来凝聚人心。

在大家分享各自带来的食物之后，会议落下帷幕，这让我感到自己绝非唯一一个收获满满、饱受启发的人。但所有参加过大型会议的人都懂得，在闭会之后的那些天，你很难将所有的收获即刻消化并转向具体行动。幸运的是，我在翻看笔记时注意到了联合利华的乔纳森·阿特伍德的一番话，那简单直白的表述让我顿时从手忙脚乱中放松下来：“你在乎什么，就从哪里起步好了。”（译者/作者 臭猴子闹哪样）

来源：Medium

地址：<http://www.thinker360.com/page/4185>

[【返回目录】](#)

◎云南鲁甸地震专题报道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 有序做好支援鲁甸地震灾区抗震救灾工作

国务院办公厅5日发出关于有序做好支援云南鲁甸地震灾区抗震救灾工作的通知。

通知指出,8月3日,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发生6.5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立即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第一时间赴灾区指挥抗震救灾。受灾地区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奋起抗灾,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公安民警及专业救援队伍紧急开展抢险救援。社会各界给予大力支持,许多志愿组织和人员积极投入抗震救灾。

目前,灾区抢险救援、医疗救治、群众生活安置、基础设施抢修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由于地震灾区处于河谷地带,山高坡陡路险,道路损毁严重,地质灾害多发,交通通行不畅,伤员转运和救灾物资运输面临很大压力,加之灾区余震不断,大量房屋倒塌或受损,基本没有接待能力,如大量人员前往,不仅自身安全难以保障,也给当地救灾工作带来新的困难。应云南省的要求,为有力有序做好抗震抢险救灾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坚持属地为主、分级负责的抗灾救灾工作机制。考虑到此次地震灾害范围、规模和影响,中央已明确抗震救灾以地方为主形成统一指挥体系。云南省要加强统筹协调,建立高效工作机制,扎实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加强指导,及时帮助灾区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二、严格控制赴灾区工作人员。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各单位和社会团体,未经批准近期原则上暂不自行安排工作组和工作人员前往灾区。对于灾区确有需要的,国务院办公厅将统一作出安排。

三、加强对社会捐赠的统一组织管理。社会各界有捐赠意愿的,建议以捐赠资金为主,通过民政部规定的渠道,主要用于灾区重建和受灾群众长期安置需要。对于捐赠的物资和装备,由捐赠地民政部门与灾区民政部门协调后,统一安排接收并有组织地运往灾区。未经协调确认的,一律不得自行分散运送。

四、及时劝阻非紧急救援人员赴灾区。各有关方面要加强宣传引导,做好解释说明,及时劝阻非专业救援组织、志愿者、游客等近期尽量不要前往灾区,以支持灾区的抗震救灾工作。

来源:新华网

地址: 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4-08/06/c_126838048.htm

[【返回目录】](#)

民政部关于云南鲁甸 6.5 级地震抗震救灾捐赠活动的公告

第 323 号

8月3日，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发生6.5级地震，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抗震救灾工作，部分社会组织 and 单位自发开展了救灾募捐活动，支持灾区抗震救灾。为进一步规范救灾捐赠活动和志愿服务，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志愿服务。鉴于目前灾区尚处于紧急救援阶段，且交通、通信、住宿条件不便，加之余震不断，建议非专业救援的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在现阶段不要自行前往灾区。

二、捐赠渠道。对于社会各界有捐赠意愿的单位和个人，倡导通过依法登记、有救灾宗旨且有公募资格的社会组织和灾区民政部门进行捐赠（全国性的公募基金会登记事项可在“中国社会组织网”上查询），捐赠以资金为主。有意愿捐赠物资的捐赠人和社会组织，应提前与灾区有关机构确认需求后再实施，并应严格做好捐赠物资的质量、数量等把关工作，避免造成物资积压和资源浪费。

三、信息公开。开展募捐活动的社会组织应依法依规发布募捐公告，在接收和使用捐赠资金过程中应定期公布详细的收入和支出明细，包括捐赠收入、直接用于受助人的款物、与所开展的公益项目相关的各项直接运行费用等。信息发布以各自的网站作为主要渠道，并保证信息长期可查询。按照谁接收、谁反馈的原则，社会组织应主动向捐赠人反馈信息，并及时答复捐赠人的查询。

灾区有关机构在发放和使用救灾捐赠资金时，应向受益人明确告知资金的来源和性质；重建阶段应定期向社会公开所接收救灾捐赠资金的总额、拨付使用和重建项目进展等信息，主动接受捐赠人和社会的监督。

四、数据统计。按照谁接收、谁统计和在地统计原则，接收捐赠的社会组织应根据《救灾捐赠款物统计制度》，加强捐赠款物数据的统计和汇总，及时向同级民政部门报送统计数据，各级民政部门按要求逐级汇总上报数据、定期在门户网站公布同级社会组织的数据报送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接收捐赠的全国性社会组织应每日向民政部救灾司救灾捐赠处报送捐赠数据，民政部将每周在民政部网站上公布。

五、资金使用。社会组织应按照捐赠人的意愿、灾区应急救灾和恢复重建需求使用救灾捐赠资金。应急救灾阶段应主要用于抢险救援和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求；计划用于灾后恢复重建的，应在灾区恢复重建规划框架内，统筹灾区需求和捐赠人意愿，承建或认建重建项目，将资金投向困难多、需求大的重灾地区。

云南省已建立抗震救灾捐赠资金使用协调机制，指定云南省减灾中心为社会组织提供服务。联系电话：0871-65731920，65739940。

民政部

2014年8月4日

来源：民政部救灾司

地址：<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tzl/201408/20140800680118.shtml>[【返回目录】](#)

云南省民政厅设立云南鲁甸地震社会组织救援服务平台

云南省民政厅为更好地引导社会组织依法、有序、高效参与云南鲁甸地震的抗震救灾，推动救灾工作社会化，下发关于社会组织参与云南鲁甸地震抗震救灾工作相关要求的紧急通知：

一、在云南省民政厅救灾应急指挥部下设“社会组织参与救灾协调服务组”，同时建立“云南鲁甸地震社会组织救援服务平台”。

二、“社会组织参与救灾协调服务组”为常设社会组织参与救灾的工作协调机构。此次云南鲁甸地震通过“云南鲁甸地震社会组织救援服务平台”负责：（一）接受进入灾区社会组织的登记、备案工作，确保依法有序进入；（二）统一协调省内外社会组织进入灾区开展工作，加强社会组织间的协同意识、信息分享意识；（三）协调外界捐赠物资与灾区的对接、现场发放，提高救灾效率；（四）现场需求信息调查评估，确保发布准确有效的需求信息，使救援物资发挥最大效用，不产生浪费；（五）统筹协调志愿者，确保有序进入，避免拥堵；（六）提升相关社会组织参与救灾、重建工作的专业化水平，定期召集相关社会组织开展活动、邀请专家研讨会，实现信息共享。

三、请各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抗震救灾，准备为地震灾区捐款捐物、提供志愿服务的社会组织请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先向云南三方社会组织评估服务中心报告捐助情况，报告内容包括捐赠物资的名称及数量、志愿者的服务内容及人数、资金的金额等。

四、云南三方社会组织评估服务中心指定专人负责统计社会组织救灾物资、资金及志愿者数据，及时上报省减灾中心及民间组织管理局，并由省民政厅统一调配。

五、省民间组织管理局、云南三方社会组织评估服务中心、成都青羊三方调查评估中心将通过云南民政网、中国社会组织网、《中国社会组织》杂志、“社会组织动态”微信公众平台等多种渠道对参加抗震救灾的社会组织予以宣传。

联系人：

罗应月 138885682980871-65641554

徐兴淑 158878626620871-65641124 (传真)

陈晨 13669725737

王臻 15987110503

邮箱: pgzx201314@163.com

来源: 人民网

地址: <http://gongyi.people.com.cn/n/2014/0806/c151132-25417047.html>

[【返回目录】](#)

云南鲁甸地震见证应急救援新变化

每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都是一次考验。鲁甸地震应急救援，见证着新的进步。

地震后 3 分钟，公安消防部队救援力量已携带应急救援装备出发。冒着山体滑坡、岩石滚落的危险，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公安消防大队全体官兵清障开路、徒步疾行，2 个小时后到达震中，成为当地最早开展救援的一支队伍。

地震后 4 分钟，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正在办公室处理昆山爆炸事故救援工作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部长王平收到了中国地震台网的短信速报。他疾步走到地图前，用荧光笔将震中地带做上标记。“我们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收到了短信，迅速进入战时状态，各司其职，应急响应机制就启动了。”王平说。

速报短信的背后是灾害信息充分共享的机制。从中央到地方，从官方到民间，第一时间传来的灾情，成为各种应急响应机制启动的集结号——

中国地震局启动地震应急响应；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启动国家救灾应急响应；公安部启动抗震救灾应急机制；交通、卫生、军队……不到 1 小时，救灾指挥系统各相关部门全部到位。

各路救援力量以最快的速度从四面八方震中汇聚。

地震发生后，云南省第一时间启动地震应急预案，成立抗震救灾、医疗救护、查灾核灾、震情监测等工作组，党委、政府相关领导和武警、公安、医疗救援队伍等紧急赶赴灾区。

地震后 10 分钟，云南省民政厅向昭通市、鲁甸县、巧家县和曲靖市的救灾物资储备库同时发出调拨指令，各储备库工作人员立即开始装车。当晚，部分物资陆续运抵灾区。

4 日 11 时，国家减灾委将国家救灾应急响应等级提升至最高级别的 I 级，进一步支持鲁甸地震灾区做好救灾工作。

“从鲁甸地震救援行动看，应急管理体制机制越来越完善，救灾更加迅速、科学。”中国地震局应急救援司副司长尹光辉说。

5 日夜，中国地震局大楼灯火通明。地震系统鲁甸地震现场指挥部里，指挥人员正通过调度平台实时了解灾区一线的应急队员所处位置、行动路线轨迹、上报的灾情、地震烈度评定等信息。队员直接将灾情图片和烈度调查情况上传到平台，并响应指挥部的调度指令；队员之间也可以看到相互之间的轨迹。

“在鲁甸地震灾区，地震现场指挥调度平台首次大范围搭建使用。”中国地震局有关负责人说，从汶川地震到鲁甸地震，应急救援指挥系统的科技应用有了很大提升，强化了指挥部与应急队员之间的信息互通，工作效率显著提高。

6 日 8 时，鲁甸县成立的疾控中心指挥部，包括国家级专家、省级专家、昭通市级和县级防疫人员、成都军区、四川省宁南县在内的 249 名防疫人员全部到位。

科技成为抗震救灾的“千里眼”。截至 4 日 15 时 30 分，武警黄金部队先遣救援队的四旋翼无人机已 3 次起降，传回 25 分钟的灾区航拍影像资料，为合理分配力量、确定救灾重点、选择救援路线、畅通指挥系统、搜救转移受灾群众提供了高效准确的信息参考。

“消防官兵在搜寻确定被困人员时，采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多种方法快速定位，在不同的现场环境运用不同的搜救技术手段。发现被埋压的受伤人员不会贸然救出，而是由随队医生进行专业的急救处理后，再按程序搬运、转运伤员，医疗监督与现场急救始终贯穿救援全过程，避免了对被困人员造成二次伤害，大大提升了他们的生还率，降低了致残率，体现了科学施救理念和专业化救援水平。”曾多次参加大型地震救援实战经验丰富的公安部消防局作战专家说。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院长王天朝曾参加过多次地震等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他带领的医院 33 人先遣医疗应急队伍已经在巧家县震区接治 100 多名伤员。他认为，通过汶川、玉树等大地震，大型应急医疗救治有了多方面变化：首先是第一时间到灾区的先遣医疗队伍组织、搭配越来越高效。第二，对伤员的救治机制愈加完善。第三，医疗设备进一步升级。如此次他带领的医疗队携带野战手术车、移动 X 光机，能在手术车完成手术。第四，通过前方医疗队伍和后方医院无缝对接，开通绿色通道，重伤员转诊更加有效。

来源：新华网

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4-08/08/c_126848255.htm

[【返回目录】](#)

鲁甸地震 24 小时，17 家基金会积极投身抗震救灾

2014 年 8 月 3 日 16 点 30 分，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发生 6.5 级地震，这是 18 年来云南最严重地震。据国家民政部消息，截止到 2014 年 8 月 4 日 14 时，地震已致 398 人死亡，1801 人受伤。此次地震具有震级大、震源浅、灾区人口密集和灾区房屋抗震性能差四个特点，灾区情况不容乐观。灾害发生后基金会积极行动，广泛调配社会资源，积极开展地震救灾紧急救援工作。地震无情人有情，基金会作为地震救灾的民间力量，将会为地震紧急救援和后期的灾后重建贡献自身的力量。

截止到 2014 年 8 月 4 日 16 点 30 分，鲁甸地震已经过去 24 小时，据基金会中心网根据互联网已披露信息统计，全国范围内，已有包括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在内的 17 家基金会启动应急预案，积极投入到地震救灾工作中。

基金会中心网作为基金会行业专业的信息服务平台，已通过官方网站和微信同时建立基金会救灾动态信息展示专题，邀您共同关注基金会“抗击鲁甸地震”的实时进展。（网址链接：

<http://news.foundationcenter.org.cn/ynztdz/index.html>）

17 家基金会积极行动，抗震救灾动态概览：

基金会名称	基金会救灾行动
中国扶贫基金会	首期捐赠 200 万元用于地震紧急救援，委派人道救援网络成员紧急采购 100 件家庭保障包（内含洗漱用品、卫生用品、寝具等），紧急采购 100 顶救灾帐篷运往灾区，2000 箱蛋黄派从昆明运往灾区。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壹基金第一批救灾物资（412 件彩条布、100 顶帐篷、1500 个温暖包）已经抵达鲁甸县，建立联合救灾指挥部，并协调好中转仓库装卸物资。温暖包物资包含：儿童牙膏、牙刷、硫磺皂、指甲钳、花露水、美术套装、水杯、手电筒、无纺布袋 10 种物品。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紧急调动中华儿慈会救灾物资，向灾区发放 1000 个“童缘包”（儿童学习生活包），内含毛巾、肥皂、牙刷、手电、雨衣、创可贴及图书、文具等，由中华儿慈会 9958 儿童紧急救助中心联络云南志愿者团队，协调医疗救助资源，开展受灾儿童紧急救助，并开

	展其他救灾行动。
爱德基金会	第一批救灾资金投入为 300 万元，第一分队已于受灾严重的火德红镇展开救援工作。紧急救援队第二分队已从昆明赶往昭通。同时首批爱德紧急救援物资，包括饮用水、大米及食用油已采购完毕，预计下午将运往灾区。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中国青基会、云南青基会联合全国 37 家青基会共同启动“希望工程紧急救灾助学行动”。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第一时间启动救援一级响应机制，友成“援助力”救援组织工作站（支持救援组织）、工作包（救援人员基础需求）、爱心包（灾民必备版）等救灾产品正在紧急筹备运送灾区。友成救灾小组将于今天和明天奔赴灾区。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第一时间组织 1000 万元救灾物资投向灾区。首批物资，包括 1000 只赈济家庭箱以及由中国红基会幸福天使基金捐赠的价值 800 万元的奶粉、营养品等物资。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首批购置的 40 万元“母亲邮包”将完成装箱、物流配送，50 万元的妇女卫生用品也将随后运往地震灾区，10 万元的紧急救助资金将迅速通过云南省妇联用于灾区母亲。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接受的社会捐款，将通过当地的慈善组织，专门用于鲁甸地震灾区的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捐款 500 万元人民币给壹基金、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德基金会等公益组织用于紧急救灾等工作。

北京百度基金会	发动百度搜索、百度贴吧，百度钱包、百度地图等各项产品来支持抗震救灾工作，同时百度基金会向地震灾区捐赠 500 万元。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国土资源基金捐款 10 万，天福基金捐款 10 万，社区发展基金 5 万，长青基金 5 万，基金会本部非定向资金 20 万，另拨付 10 万购买救灾物资，共计 60 万元，作为第一批地震专款救灾资金拨付灾区。目前我会芒果 V 基金也已抵达灾区开展救灾工作。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思源工程 正在与民建云南省委沟通，评估灾情，将根据受灾情况开展救援救灾等工作。
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中国青基会、云南青基会联合全国 37 家青基会共同启动“希望工程紧急救灾助学行动”。益行公益志愿团队第一批志愿者现已赶赴现场等。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慈爱基金的第一批救灾物资，100 顶大救灾帐篷发往鲁甸灾区，首批志愿者也正赶往灾区。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黄晓明捐赠的 10 万元拨付前线，此笔善款将用于购买灾区亟需彩条布、大米、食用油等物资。
北京仁爱慈善基金会	成立前后方救灾指挥部，联络协调各方资源。仁爱救援队员已做好准备，随时出发。

以上信息采集自基金会官方网站、微博、微信等途径，数据截止时间为 2014 年 8 月 4 日 16 点 30 分。基金会正积极投身在紧急救援工作中，很多救灾动态还来不及对外公开，基金会中心网将继续关注基金会救灾情况，努力向公众全面的展示基金会的救灾情况。

来源：基金会中心网

地址：<http://news.foundationcenter.org.cn/html/2014-08/84474.html>

[【返回目录】](#)

鲁甸 6.5 级地震：民间救援迅速展开 行动趋于理性

8月3日16时30分，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北纬27.1度，东经103.3度)发生6.5级地震，震源深度12公里。据云南省民政厅报告，截至4日8时40分初步统计，地震造成昭通市鲁甸县、巧家县、昭阳区和曲靖市会泽县381人死亡(鲁甸县302人、巧家县66人、昭阳区1人、会泽县12人)、3人失踪(巧家县3人)、1801人受伤。

灾情发生后，公益组织迅速行动起来，了解灾区需求，调运救灾物资，并赶赴灾区现场进行救援。

灾情评估是第一位

迅速了解灾区情况，确认救灾需求成为参与救援的第一步。

在地震发生7分钟后，壹基金联合救灾的云南伙伴第一时间与当地取得联系了解灾情。

8月4日4时20分，卓明震援通讯社发布《8·3云南鲁甸-巧家地震 卓明救灾简报第二期》，对灾区的救灾进程、交通路况、救援难点、物资需求等进行了详细说明。简报强调，本次地震造成大量伤亡，因此挖掘救援方面需要大量人手；外伤药物和医疗人员也存在紧急需求。

8月4日5时，中国扶贫基金会救援人员抵达鲁甸后，第一时间赶赴县政府指挥中心，了解受灾详情和灾区需求。目前大量伤员由于道路不通没法运出，伤亡数字预计道路打通后还会有大幅度增长。灾区急需食品、帐篷、药品等物资。

随后，该基金会在鲁甸灾区建立人道救援行动网络前线紧急救援办公室，开展搜救、灾情需求评估、协调救灾物资发放等工作。

民间救援属地先行

本次地震灾区房屋多为土坯房或砖房，造成了很大的伤亡。紧急救援的需求强烈。在预判灾情后，各类社会组织纷纷组织救援力量进入灾区。而最先动员、集结的大多是靠近灾区的公益组织。

壹基金救援的第一梯队来自救援联盟在云贵川的5支救援队。第二梯队的壹基金救援联盟成员重庆队、壹基金雅安办公室也于3日晚连夜出发赶赴灾区。此外，壹基金联合救灾的云南和贵州伙伴也已行动。

中国福基金会蓝豹救援队四川队员已在集结；鉴于昭通周边民间救援力量较多，蓝豹将采用资助部分救援组织协作的方式前往震区开展救援工作。

中华救助基金会华夏救灾基金，联合授渔公益和平安星共同行动。目前两支队伍都已抵达灾区，开展一线信息采集工作。

中国扶贫基金会则委托人道救援网络成员润土互助公益志愿团队在昆明紧急采购100件家庭保

障包，内含洗漱用品、卫生用品、寝具等。其人道救援合作伙伴昆明蓝天救援队已赶往震中。

8月4日，共青团鲁甸县委招募地震救援志愿者，要求年龄18周岁以上，能自己负责人身安全，有工作单位和救援经验者优先。并特别强调：“志愿者请务必服从安排，不要擅自进入灾区。”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也发出倡议：每个人的热情和爱心都值得肯定，但你一腔热血的前往，可能不仅帮不到忙，还会为抗震救灾增添不必要的负担。为此，再次呼吁普通民众和志愿者们，不要盲目前往地震灾区，请给救援先遣队让出一条生命通道。

部分募捐物资已运入灾区

在派遣人员进入灾区的同时，公益组织筹集的救灾物资也已部分运入灾区。

8月3日下午，壹基金确定支援鲁甸县地震灾区的第一批救灾物资，包括412件彩条布、100顶帐篷、1500个温暖包，这些物资在昆明备灾仓库连夜装车起运至鲁甸县6.5级地震灾区。另外，壹基金企业联合救灾平台的可口可乐中国第一时间支持了7.2万瓶冰露水发往地震灾区。

云南省红十字会向灾区调运棉被毛毯各500床、帐篷100顶。中国红十字会也调拨2000床棉被、2000件夹克衫及200顶帐篷等。香港红十字会安排1000个救灾家庭包，澳门红十字会和四川省红十字会也各安排500个救灾家庭包支援地震灾区

中国扶贫基金会协调成都备灾仓库200顶帐篷运往灾区。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也已通过捐款500万元人民币给壹基金、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德基金会等公益组织用于紧急救灾等工作的方式参与灾区救援。

据《卓明救灾简报》判断，紧急的物资需求重点在于防雨保暖。目前已有多家基金会展开募捐行动。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http://www.gongyishibao.com/html/yaowen/6818.html>

[【返回目录】](#)

基金会中心网关于支持云南鲁甸地震社会组织救援服务平台的倡议书

8月3日16时30分，云南省昭通市发生6.5级地震，给当地人民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灾害发生后众多基金会积极行动，广泛调配社会资源，参考抗震救灾工作。根据基金会中心网统计，截至8月8日16时，已有包括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南都基金会和老牛基金会在内的50余家基金会参与地震救援，筹集款物总额达2.5亿元，向灾区运送药品、帐篷、衣服和食品等救援物资。

为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鲁甸地震救灾中的作用，促进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有效合作，8月7日云南省民政厅发布《云南省民政厅关于社会组织参与云南鲁甸地震抗震救灾工作的紧急通知》，同时由相关社会组织发起建立“社会组织救援服务平台”，用于引导社会公益组织依法、有序、高效地参与云南鲁甸地震救灾活动及其他应急救灾协调服务。平台的建立充分确保社会组织有序进入灾区开展救援工作，实现信息、物资以及人员等多方面的协调，提高救援效率。平台办公室设在云南三方社会组织评估服务中心。

基金会中心网作为基金会的行业平台，支持云南省政府社会组织救援服务平台的建立，同时倡议号召参与鲁甸地震救援的基金会予以积极支持和响应，充分完善救援组织之间的政社协同机制，为地震救援和重建鲁甸美好家园贡献力量！

基金会中心网

2014年8月8日

来源：基金会中心网

地址：<http://news.foundationcenter.org.cn/html/2014-08/84931.html>

[【返回目录】](#)

基金会救灾协调会云南鲁甸地震社会组织协同救灾倡议书

2014年8月3日云南鲁甸6.5级地震发生后，基金会救灾协调会7家成员第一时间做出响应并发出倡议书，呼吁各类社会组织伙伴协同救灾，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作为协调会相关信息的传播支持平台，将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各界通报相关情况。

以下为倡议书内容：

基金会救灾协调会云南鲁甸地震社会组织协同救灾倡议书

2014年8月3日发生的云南鲁甸6.5级地震带来巨大的社会影响冲击。截至8月5日14时30分，地震造成昭通市鲁甸县、巧家县、昭阳区、永善县和曲靖市会泽县108.84万人受灾，410人死亡、12人失踪、2373人受伤，22.97万人紧急转移安置。

基金会救灾协调会成员在第一时间迅速做出响应，各成员表示，将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协同其他社会组织伙伴共同传递社会关爱，积极参与紧急救援、人员转移安置、快速灾损与需求评估、物资递送，特别要关注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

为了及时高效、科学有序地参与抗震救灾，基金会救灾协调会呼吁参与救灾的各类社会组织伙伴们承诺：始终秉承公开透明、自律严谨的救灾准则，以灾区群众需求为本，结合自身专长合理安排资源，加强与当地政府合作，积极参与紧急救援，成为国家救灾体系的重要构成和政府应急管理职能的有力补充！

完善基金会之间以及基金会与其他社会组织间的协同机制，做好志愿者服务与管理工作，实现在信息分享、物资调度、人员协作等方面的有机融通！

在积极参与紧急救援的同时，充分发挥各自专业优势，重点关注受灾群众过渡安置，以及灾后重建阶段的社区重建和生计发展，为重建鲁甸美好家园贡献力量！

地震无情人有情，虽然人类在自然面前是渺小的，但我们中华民族血浓于水，相信众志成城、凤凰涅槃！期待继续并肩，为鲁甸加油！

2014年8月5日

基金会救灾协调会成员单位：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中国扶贫基金会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爱德基金会

南都公益基金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基金会救灾协调会

特邀监事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特邀传播支持:

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

来源: 安平酷

地址: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jAyNDY1Ng==&mid=200739469&idx=1&sn=9991012f1dc3008eb072f558bf155c9f&scene=1&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rd

[【返回目录】](#)

冯永锋: NGO, 你要不要救灾?

突然有朋友问我一个在五年前就考虑过的老问题, 这也是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回答更没有实证材料的问题: 公益组织到底应该如何参与救灾?

问题骤然提出, 确实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就像一场陈年旧疾, 患者虽然知道自己病在何处, 但总是找不到救治良方, 于是也就实现不了康复之梦。我想简单梳理一下灾难与 NGO 的关系, 可能很有必要。梳理清楚了, 也许答案也就慢慢地从字里行间钻将出来了。

NGO 到底是做什么的

有些灾难是人类在某一阶段共同遭遇的, 但有很大一部分灾难, 是来自人类自身的失衡。人类太多的互相掠夺和伤害的欲望, 导致了人类出现大量的苦难。整个社会无论处于何种状态, 都有当代“英雄”们纷纷制造的“时代欲望的牺牲品”。

于是很自然地, 问题就出现了, 公益组织们, 究竟在大千世界, 灾难层出不穷的时代, 该有何作为, 能有何作为?

依我原来的想法, 公益组织大体只有两个业务走向, 一个叫启蒙, 一个叫干预。

要启蒙, 自身就要有极强的探索尤其是在社会边缘探索的能力; 要启蒙, 就要有把发现的问题大胆地说出的能力; 要启蒙, 就要有对社会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高超的穿透力和理解力。

而要干预，或者说救治，就要有准确鉴别苦难的能力，就要有在接应难题时，依托现有资源马上动手尝试解决的能力。

在这里，“依托现有资源”是个关键词，很多人遇上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要么相隔十万八千里才可能做，要么是推迟四亿九千万年才可以做。本质上，这都是推卸责任的一种美妙易容术。每每听到这话我都马上心生鄙夷，很多人遇上问题，马上就说自己太弱小，太无能，太绝望，太空虚，面对如此强悍的困难，“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我对这样的话，也表示强烈的鄙夷。指望不存在的资源，其实就是推卸责任的常见手法。你可以推卸责任，当逃兵，假装不在你的业务范围内，假装你没准备好，假装苦难的真相尚未格致清晰，但你绝对不可以说出这些自泄元气、毁我三军勇略的话来。

最近又觉得，随着知识普及、财富普及以及行动力普及，公益组织的启蒙作用已经非常的稀微，绝大多数时候，已经不是公益组织在启蒙社会，而是社会和公众本身在启蒙公益组织。绝大多数时候，不是社会不了解公益组织，而是公益组织不了解社会。绝大多数时候，不是社会与公益组织中有隔阂，而是公益组织自己封上了与社会电源接通的那些插座。

于是公益组织能做的工作，就是干预。即使是启蒙，也是通过干预来进行启蒙，即使要教育，也是通过现实的干预案例来完成“教育”。如果一个公益组织，不敢干预现实中的苦难，那么，这家公益组织，可以休矣。

什么样的苦难需要干预

我们说政府是强大的，是因为政府是公益组织的早期类型。在人类的童年时代，人们觉得一群人需要选出一批人来对资源进行管理，于是，政府的各种形态就产生了。这些人的面目，可以是长者，可以是宗教领袖，可以是军官，可以是农民工，可以是贩夫走卒，可以是纯粹的阴谋家加政客加演员。

于是，在人类出现灾难的时候，人们往往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政府，以及政府能够调动的军队、警察、消防队等武装化的救灾能手。我想，无论是哪一个国家，出现无论是人为的灾难还是天地发作的灾难，政府永远是硬性救灾的第一主体。政府做得好不好是一回事，做得是虚假还是真实是一回事，但如果公益组织也把自己的救灾能量施放到政府救灾的轨道上，其结果必然就是“公益组织替政府募捐”，其结果就是“公益组织当政府的替补”。

在大灾面前，当然不能区分这么多，因为在灾难现场，只要你出现，哪怕你毫无任何的技能和经验，也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但反过来说，此时无论你是不是公益组织的成员，其实已经没有关系。你只是一个人人都可为的救灾志愿者。

这显然与公益组织在面对社会公众时所做的宣誓和承诺略有差异。公益是一种社会信托，当公

益人员以组织化的形态出现的时候，他的使命的能力应当与救灾志愿者是略有差异的。如果在政府能量已经能够通畅到达的地方，公益组织还在那逞能，那只能证明，这家公益组织并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定位。其结果甚至可能不是能量浪费，甚至有可能是制造新的灾难。

观察这几年的救灾格局，公益组织应当可做好多事情。一是当然要去救灾现场，但必须填补的是政府能量无法到达的区域。二是发挥专业特点，你是环保组织，就多从环保的角度参与，比如玉树地震之后，重建开始，新的灾难就是为了重建人类的家园，大量在通天河采砂，大量在草原上盖楼，以“生态城”的名义，严重地伤害着当地的环境。这时候，环保组织必须对此提出必要的警告和提醒，以监督生态城的建设不至于偏颇，以推进灾后重建真的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理解。三是软干预远大于硬干预。政府能做的多半是盖楼修路，以这些硬件设施的建设来安慰人心，重建新秩序，但一场灾难下来，人类的损失绝对不仅仅是硬件，心理变异、文化变异、社区关系毁坏、社会信任感丧失，可能都是值得“救助”“陪伴”“干预”的。

如果一个公益组织只像政府那样，一心一意只以为硬件的恢复就等于救灾成功，那么，公益组织也就可能忘记了自身存在的社会多样性的价值。从这些意义来说，从灾难中，“研究”出导致灾难本身的诸多因素，对那些过去被忽略的因素进行倡导或者说启蒙，或者说推动干预，可能是公益组织最需要做的业务。

勇猛投入是正道

无论是显性灾难还是隐性灾难，无论是楼宇倒塌还是“社会损失”，积极干预是公益组织当前的第一任务。

我上面所说的一切，都不是在评判过去，也没有想指点公益组织的江山，我只是想简单地梳理一下我们可做可为的事情。当然，我一向相信，公益组织的救灾能力，不是设计出来的，也不是指点出来的，而是结晶出来的。

在社会灾难如此普遍、政府救灾能力明显不足、政府和企业经常是诸多灾难的制造者的时代，公益组织如果真的想求助，可能确实没必要考虑太多，直接冲入灾难的现场，遇上什么就做什么，让动作指挥思想，让脚步引导头脑，可能在当前是最优选择，或者说，唯一的方式。

中国的社会确实很奇怪，过多的资源推送给政府之后，整个社会似乎丧失了公益的想像力。任何人遇上事情，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找政府，好像灾难完全由政府导致，所以要找政府算账似的。

在这样的时代，公益组织要想让得到足够的“社会信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组织，只要你看到了“你认定是灾难的灾难”，你就去努力施救好了。这中间可能会闹笑话，可能会导致一时的能量浪费，可能会引发一些公众的质疑，可能会内心茫然失措。但可惜，经验只能来自于经历，在中国如何救灾，只能干预了中国灾难的公益组织有可能慢慢地提炼出来。

换句话说，在当前，勇敢、急切、快速，或者说鲁莽，可能仍旧是救灾的座右铭。那些以为救灾能够靠理性、谋略和其他路径的人，很可能都是在推卸责任的人。在灾难面前，没有人有什么才华，只有体力。自古以来，诚实的劳动是一切真实情感的起源，诚实的劳动也是一切智慧的起源。面对灾难，我们固然要有所准备，但确实，也没什么可准备的，因为你永远不知道灾难何时发生。或者说，其实灾难每天都在发生。与其天天在那准备，不如在一场又场的救灾过程中，缓慢而坚定地提高技能。

来源：社会创业家

地址：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A0NjIwMw==&mid=200527267&idx=1&sn=b1c38c939db1a78e7b9fb6297602b7af&scene=1&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rd

[【返回目录】](#)

南都支持“民间公益组织鲁甸抗震救灾协作平台”大本营建设

2014年8月3日，云南鲁甸发生6.5级地震。据民政部门初步统计，截至8月6日10时30分，地震已造成108.84万人受灾，589人死亡，9人失踪。

地震发生后，南都公益基金会密切关注鲁甸灾情，并启动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基金。8月6日，我会审批通过了第一笔资助，支持“民间公益组织鲁甸抗震救灾协作平台”大本营运营行政费用，资助金额为8万元，主要包括平台的办公、志愿者培训等内容。希望通过推动民间力量在灾害应对中的协作，实现有序有效参与。

我会亦鼓励和建议已经到达的组织和志愿者先到营地报道，未受过专业训练的先接受相应培训，按照政府及平台的统一协调开展工作，发挥好拾遗补缺的作用。

目前，加入民间公益组织鲁甸抗震救灾协作平台的机构有20家民间组织。

附：

民间公益组织鲁甸抗震救灾协作平台联合倡议书

为了在紧急救援、紧急安置和恢复重建阶段加强协调，有序有效开展抗震救灾工作，参与鲁甸-巧家抗震救灾的首批20家机构联合发起“民间公益组织鲁甸抗震救灾协作平台”。

2014年8月5日，发起机构代表在鲁甸召开首次发起人联席会议，与会机构发出联合倡议：

我们动员社会资源，在鲁甸-巧家地震灾区抗震救灾。做到遵纪守法，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互

助协同，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部署下有序高效投入抗震救灾。发起机构承诺不以本平台名义筹集资源。

签名：河北张家口天行健救援队、华夏救灾基金、越野 e 族、滴水公益、阳光公益、成都高新区益众社区发展中心、广东省雏鹰助学促进会、禾川公益发展中心、成都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成都授渔公益发展中心、北京平安星减灾防灾教育中心、光耀爱心基金、壹基金救援联盟、云南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益行公益志愿团队、四川科技扶贫基金会、四川泸州福音医院、绵阳市青年社会组织孵化服务中心、绵阳市完美春天志愿者服务中心、成都高新区宝佑儿童、玉溪市义工联合会

来源：南都公益基金会

地址：<http://www.naradafoundation.org/html/2014-08/16997.html>

[【返回目录】](#)

鲁甸震区首个“公益组织灾区工作站”建成

在灾区服务的志愿者和公益机构最缺的是什么？如何及时提供灾区所需，有序高效地救灾，如何让社会力量更好的参与到灾后整体规划，友成基金会积极探索与政府及各界组织一起，搭建灾后救援力量的跨界资源协调平台。

在进入灾区 2 天后，大学生志愿者小红一头扎进刚搭好的工作站帐篷里，很快就进入了酣睡。她来自附近的盐津，本来是回家过暑假，没想到正赶上地震，就第一时间来到灾区做志愿者。“太累了，前两天就在路边睡几个小时，根本没有地方收留志愿者。每天夜里都下雨，好辛苦。”

2014 年 8 月 6 日，震后的鲁甸县火德红镇，由友成基金会捐赠的首个“援动力·公益组织灾区工作站”正式建成，并移交给火德红灾民安置点负责人鲁甸县政协副主席郑大琴女士，参加救灾的公益组织“滴水公益”将入驻工作站，提供后续的服务和管理。郑女士对工作站完备的设施与齐全的功能感到赞叹，表示这些设备精准的覆盖了安置阶段灾民典型的需求。

滴水公益有着丰富的救灾经验，对工作站所提供的支持还是表示惊喜，负责人王旭东对这个工作站的评价是——“相当给力、相当及时”，对救灾公益组织和志愿者来说，是一个“加油站”。小红也一再表示，来到火德红三天，感觉终于找到“组织”了。

火德红镇是重点灾区之一，受灾严重的是火得红社区和李家山村，截止 8 月 6 日 9 点 30 分初步统计，全乡死亡 52 人、失踪 7 人，受伤 196 人其中重伤 50 人，倒塌房屋超过 1 万间。

工作站就建设在火德红中学内，这里也是镇里最大的灾民安置点。这里有 700 多位重灾区的民

众，更有 100 名儿童，有着典型的安置点社区需求，急需社区陪伴、心理援助、儿童看护、社区构建等多种公益组织服务。在这里建立“援动力”公益组织的工作站，将成为公益组织服务灾区的一线阵地，对维护安置点稳定、帮助受灾群众度过难关有着重要的意义。

见证这一交接仪式的平安星负责人、也是刚成立的“民间公益组织鲁甸救灾联合平台”核心发起方的刘宝宗也表示，“援动力”公益组织灾区工作站包括的越野型推车、简单洗浴房、整套办公设备、十人住宿容量、139 种设备、37 种社区工作手册、社区儿童陪伴道具等各种高品质的设备，体现很高的专业性。

8 月 3 日，昭通鲁甸发生 6.5 级地震。友成基金会第一时间启动救援一级响应机制，依据汶川、彝良、雅安地震救灾积累下的六年专业民间救灾经验，友成将支持救灾公益组织和志愿者、提升民间救灾效率视为己任。

按照内部的救灾响应机制，友成基金会紧急派出了由副秘书长韩靖带领的 5 人救灾小组，马不停蹄奔赴鲁甸灾区。韩靖曾参加过汶川地震救援，还是当年“全国扶贫系统抗震救灾先进个人”，具有丰富的一线救援经验。

同时，友成倡议“精准救援”，坚持以支持公益组织和志愿者为核心，开放历时 7 个月研发新鲜出炉的“援动力?公益组织灾区工作站”。并通过民政系统、民间公益组织鲁甸救灾联合平台，将首套工作站捐赠给滴水公益。另外，紧急制作的另外首批 5 套工作站也正运往灾区，将捐赠给灾区的救灾公益机构。目前已经开展入驻机构公开招募工作。

工作站为公益组织在灾区一线工作提供强有力支持，包含 4 顶多功能帐篷及 139 种配套设施，满足包括生活保障必需品、应急装备、办公设备、专业技术等一线救灾需求，为 3-4 人的灾区公益组织团队提供 3 个月的工作生活场所，以保障志愿者团队安全及救灾行动的高效开展。

友成基金会理事长王平对救灾小组工作作出重要部署，希望发现救灾公益机构的迫切需求，把解决公益机构的燃眉之急作为工作重点；同时多方搜集信息、多方整合资源，为后续持续时间更长、公益组织更容易发挥作用的灾后重建阶段做好各项准备。

“援动力”救灾项目由友成基金会开发的创新型产品。目前包括针对公益机构的“援动力?公益组织灾区工作站”，针对专业志愿者的“援动力?工作包”，以及针对灾区民众的“援动力?爱心包”。该项目刚刚在第三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中获得“年度救灾创意大奖”。

“救援机构和志愿者，他们带着爱来到这里，‘援动力’就是要为他们提供更有力量、更专业、更贴心的支持和服务。让他们可以更好的帮助灾区民众。”韩靖解读援动力项目。

后续几天，按照调研结果及规划，友成基金会将以龙头山镇为中心，在小寨镇、火德红镇、东红镇、水磨镇黄泥寨村等地建设五个工作站，届时将覆盖整个受灾地区。目前，已有包商银行等爱

心企业为这个项目捐款，也希望有更多专业的公益组织能够入驻。

咨询请联系：傅天马 18511786606，王军 18515155763

来源：NGOCN

地址：<http://www.ngocn.net/?action-viewnews-itemid-90927>

[【返回目录】](#)

◎公益布告栏

南都基金会-鲁甸地震救灾策略

面对灾难，与大家一样期待为灾区做出贡献，但此时建议大家自束自控，在需求评估的基础上再进入灾区。已经到达前线的朋友们注意安全，请提供信息！为灾区祈福！！

南都公益基金会正密切关注鲁甸灾情，针对本次灾害，南都做出以下回应：

- 一、启动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基金，资助民间组织开展救灾工作。
- 二、在正面灾害观为核心的救灾策略指导下，重点支持工作方向：
 - 1、民间组织有序、有效、有爱参与救灾的平台建设和项目。
 - 2、以提高 NGO 能力为重点的行动学习网络，以及时梳理和总结民间参与救灾的经验。
 - 3、围绕正面灾害观的相关研究工作。

救灾项目请联系：fengyuan@nandu.org.cn,

电话：15810952734, 13810750156, 010-51656856-815

现阶段，南都已经开展如下工作：

- 一、呼吁民间力量理性参与救灾，建议非专业救援组织和志愿者暂时不要进入灾区。
- 二、支持“民间公益组织鲁甸抗震救灾协作平台”的工作，并建议已经到达的组织和志愿者先到营地报道，未受过专业训练的先接受相应培训，按照政府及平台的统一协调开展工作，发挥好拾遗补缺的作用。
- 三、呼吁后方的社会工作、心理咨询等方面的专业团队提前做好准备，以便在紧急救援后的物资发放、需求评估、心理援助、社区陪伴、灾后重建等民间组织擅长的领域开展工作。

附：什么是正面灾害观？

正面灾害观：“面对灾难，激发个人与社区的内生力量，重燃希望，重立生命方针，化害为利，构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美好、有爱家园。”

正面灾害观认为：

- 一、树立对灾害的正面认识，灾害是人类所需要面对的正常生存挑战之一，人类文明即是在回应包括灾害在内的各种挑战中构建起来的。灾害对于人类来说具有能力激活、沟通、醒世作用。
- 二、在对正面灾难观和其作用认识的基础上，民间组织需要重点关注非物质损失和非物质建设（非物质损失：灾害及不当救援和重建对社会资本、制度、文化、精神等造成的损失；非物质建设：是指的社会制度、文化、精神等关系重建）。

来源：南都公益基金会

地址: <http://www.naradafoundation.org/html/2014-08/16991.html>

[【返回目录】](#)

“公益同行·鲁甸地震社区陪伴计划”正式启动

2014年08月03日16时30分在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东经103.3度,北纬27.1度)发生6.5级地震,震源深度12千米,后伴有多次余震。鲁甸地震对灾区人们的社区生活、经济发展造成重大的破坏。地震发生后,来自全国各地的公益组织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参与救灾行动,为聚合社会组织的力量,提升民间救援的效率,同政府救援形成有效补充,中国扶贫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联合启动“公益同行·鲁甸地震社区陪伴计划”。

随着黄金72小时紧急救援行动的结束,灾区已进入过渡安置阶段,很多公益伙伴深入地震灾区,开展社区陪伴项目,协助恢复社区关系和社区正常生活。

“公益同行·鲁甸地震社区陪伴计划”支持公益伙伴参与3-6个月过渡安置阶段社区陪伴项目,包括关注灾区心理干预、儿童安置、生活陪伴等,快速、高效的介入受灾社区,及时接触灾后弱势群体,有效回应社区的需求。

该计划是中国扶贫基金会与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共同结合灾区实际需求,整合优势资源及项目经验探索支持公益伙伴快速、高效回应灾区过渡阶段需求的资助模式,其特点为:

紧急审批: 5人评审小组48小时审批;

快速响应: 72小时签约拨款;

小额资助: 原则上单体项目支持不超过6万元;

项目督导: 组建项目督导团队提供助力、分享沙龙、监测评估支持。

一、支持标准

资助标准: 小额资金支持,原则上单体项目支持不超过6万元;

资助数量: 支持10-15个社区服务项目;

实施区域: 项目实施地点须在云南鲁甸地震灾区;

项目周期: 3-6个月

“公益同行·鲁甸地震社区陪伴计划”将为公益伙伴提供工作站支持及社区陪伴助力支持。

二、资助方向

支持公益伙伴关注灾区弱势群体的需求,对地震中的弱势群体如老人、儿童、妇女等,开展社

区服务活动，帮助恢复社区关系、缓解受灾人群紧张情绪等，开展社区陪伴行动。

备注：公益同行·社区陪伴计划不支持大规模的物资采购项目。

三、申报条件

- 1、正规注册的公益机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具有独立财务账户，可提供正规的财税监制票据；
- 2、机构宗旨及使命符合公益慈善的理念；
- 3、机构已有工作人员进入云南鲁甸灾区一线，并将参与鲁甸灾区过渡安置及灾后社区重建工作；
- 4、有从事所申报项目的经验，并且擅长执行该领域的项目，有足够的工作人员开展项目。

四、申请流程

1、请下载附件1《项目申请书》模板；

2、填写《项目申请书》，[发送到 hezuo@fupin.org.cn](mailto:hezuo@fupin.org.cn)；并将邮件主题写明“鲁甸社区陪伴计划申请”；申报截止至8月17日，每收集到5个项目便召开一期现场评审会，直至项目资金资助总额达到援助总金额；

3、项目评审

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工作人员组织鲁甸救灾现场的公益伙伴负责人组成评审委员会，在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媒体的监督下，在鲁甸县城（具体地点待定）于晚上时间（一般在20:00之后）进行现场评审，并形成评审意见；

4、项目签约

项目工作人员与申请机构进行沟通，根据评审意见及财务意见，进行调整、修改，双方确认后签署项目援助协议；

5、资金拨付

协议签署后，合作伙伴将协议传真/电子扫描/拍照至项目组，中国扶贫基金会根据协议拨付首款。

6、项目进展信息的收集

合作伙伴将定期提供项目进展材料，同时，中国扶贫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将组织网友、媒体、志愿者、支持型机构赴项目点进行督导、监测及评估。

五、咨询方式

联系人：米女士 李先生

电话：010-82872688 转 609；13811608420（米）；15101577808（李）

邮箱：hezuo@fupin.org.cn

注：邮件主题请注明“鲁甸社区陪伴计划申请”

六、附件：

1、项目申请书

2、项目预算表

敬请关注“公益同行”“腾讯公益”“Hi 公益”微信订阅号，获取后续信息。

公益有您，更有力量！

来源：中国扶贫基金会

地址：

<http://www.cfpa.org.cn/newDetail.cn?articleId=00594c6e4dd14aeaa27da73b5ed0c349&p=1c626f8195104>

[【返回目录】](#)

正荣专项救灾基金开放申请

正荣专项救灾基金，是由正荣集团捐资在正荣公益基金会设立的救灾专项基金。该基金面向全国，通过小额项目资助，支持民间公益组织利用其自身的专业技能开展相关灾害服务项目。

2013 年 4 月，基金会接受正荣集团救灾捐赠 300 万元，成立“雅安专项救灾基金”，并得到了正荣集团员工和福州竹心园的支持。针对雅安地震，基金会与南都公益基金会合作开展灾后救援工作，并开通了“雅安微公益”申请平台。2013 年 6 月，基金会调整救灾思路，在征得捐赠方和理事会的同意下，改名为“正荣专项救灾基金”，取消了仅限雅安灾区使用的限制。

专项救灾基金常年开放申请，申请邮箱：zrjz@zhenro.com, 信息查询：

<http://www.zrgy.org/project.asp?cid=76>

来源：正荣公益

地址：<http://zrgy.org/project.asp?cid=71>

[【返回目录】](#)

【刊物简介】

公益慈善周刊由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董强策划编辑，旨在为 NGO 领导人以及政府民间组织管理负责人提供一周公益慈善新闻回顾，把握当前公益慈善领域中的热点问题，从而为 NGO 机构发展与地方民间组织政策推动发挥积极作用！

【主办机构简介】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开始关注并参与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人文与发展学院先后参与了世界银行中国发展市场、亚洲开发银行非政府组织参与村级扶贫规划试点项目、民政部民间组织局相关政策调研项目、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论坛基金会项目案例研究以及众多国际与国内 NGO 的项目评估与监测项目等。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在公益慈善领域主要关注的重点：

- 公民社会基础理论研究
- 公益组织发展咨询研究
- 公益项目开发、评估与监测
- 公益组织能力建设

【刊物订退阅】

如果您的同行或相关人士希望订阅此刊物，请发送您的姓名、工作单位、职位至 gycsweekly@gmail.com 即可。

如果您希望退订此刊物，也请直接回复上面邮箱告知。

主办机构：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主 编：董 强
编 辑：陈婉君、潘思佳、刘春霞
办公电话：010-62731470
电子信箱：gycsweekly@gmail.com